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2016年12月号

塞巴斯蒂安·马拉比

保罗·克鲁格曼

艾伦·布林德

……等其他人

金融与发展

全球化

局内者

局外者





《金融与发展》是IMF的季刊，
用英文、阿拉伯文、中文、法文、
俄文和西班牙文出版。

英文版刊号 ISSN 0015-1947

Camilla Lund Andersen

主编

Marina Primorac

责任编辑

Gita Bhatt

Natalie Ramirez-Djumena

Jacqueline Deslauriers

James L. Rowe, Jr.

Ismaila Dieng

Rani Vedurumudi

高级编辑

Marie Boursiquot

在线编辑

Eszter Balázs

Bruce Edwards

Nicole Braynen-Kimani

Nadya Saber

Maureen Burke

助理编辑

Lijun Li

印刷/网络产品专员

Robert Newman

编辑助理

Lucy Morales

文字编辑

Luisa Menjivar

创意主管

Michelle Martin

高级美术设计

编辑顾问

Bernardin Akitoby

James Gordon

Celine Allard

Thomas Helbling

Bas Bakker

Laura Kodres

Steven Barnett

Tommaso Mancini Griffoli

Nicoletta Batini

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

Helge Berger

Inci Otker-Robe

Paul Cashin

Laura Papi

Adrienne Cheasty

Uma Ramakrishnan

Luis Cubeddu

Abdelhak Senhadji

Alfredo Cuevas

Janet Stotsky

Marcello Esteveo

Alison Stuart

欲知广告事宜，请与IMF出版部联系。

地址：700 Nineteen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电话：(202)623-7430

传真：(202)623-7201

电子邮件：publications@imf.org

©版权所有，IMF，2016年。翻印本刊文章

应向主编提出申请。地址：

Finance &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电话：(202) 623-8300

传真：(202) 623-6149

网址：<http://www.imf.org/fandd>

本刊对非经济目的的翻印一般会迅速

免费予准。

本刊的文章及其他材料仅为作者本人观点，

并不反映IMF的政策。

中文版由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翻译出版。

地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知大厦

电话：88190916

传真：88190916

邮政编码：100142

网址：<http://www.cfeph.cn>

中文版刊号：ISSN 0256-2561



金融与发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季刊

2016年12月号·第53卷·第4期

特 辑

全球化：局内者、局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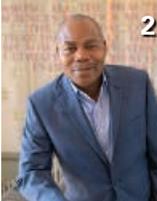
- 6 **全球化重置**
跨境资本流动和贸易的紧缩可能并不像预想的那
么严重
塞巴斯蒂安·马拉比
- 11 **对僵滞不前的局面听之任之**
贸易自由化进程停滞不前也无大碍
保罗·克鲁格曼
- 12 **让国际贸易走上正轨**
通过国际贸易收益再分配政策可以提升生产力
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
- 17 **双向车道**
政策制定者必须着手解决经济和政治问题，以加强全球化
大卫·利普顿
- 18 **新概念 旧现实**
全球化是近年才出现的新词，但市场、人
员、理念和文化的国际化并不新鲜
哈罗德·詹姆斯
- 22 **双刃剑**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强正在影响世界各地的
劳动者
- 28 **工人不能落在后面**
正确的政策意味着国内与国外都有好工作
弗朗西丝·奥格雷迪
- 30 **移民带来的好处多多**
高技能和低技能移民都能提高发达经济体的人均
收入，并能带来很多好处
弗洛朗斯·若默特、克谢尼娅·科洛斯科娃、斯韦
塔·萨克塞纳
- 33 **积极面和消极面**
美国的政策应承担起全球化的责任，将贸易的输家转变为净赢家
艾伦·S. 布林德
- 34 **无论富裕与贫穷**
国际贸易可能加剧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
尼娜·帕夫克尼克
- 37 **祖鲁寿司以及其他希望**
全球化带给非洲的好处微乎其微
库米·奈杜
- 40 **空洞化**
美国中等收入阶层正在不断萎缩，或晋身高收入阶层，或跌落低收入
阶层
阿里·阿里奇



本期还有

- 43 逃离优质商品
阿根廷葡萄酒出口情况表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葡萄酒消费转向低档产品
娜塔莉·陈、卢恰娜·尤韦纳尔
- 48 财政冲击
政府应该理解并管理财政支出及债务的风险
本尼迪克特·克莱门茨、泽维尔·德布兰、布莱恩·奥尔登、阿曼达·萨伊格
- 51 设定高层基调
与公司董事会一样，中央银行董事会同样也能从关键评审中获益
阿什拉夫·克汉
- 57 读者来信

其他内容

- 2 经济学人物
开拓先锋
伊斯迈拉·迪昂采访莱纳德·沃彻肯，一位以培养新一代非洲经济学家为目标的前政治活动家

- 38 图表释义
粮食的进化
提高农业效率和生产率对未来粮食安全而言至关重要
玛利亚·约瓦诺维奇

- 46 货币
现金之巅
瑞士因保留使用现金的传统而与全球趋势相背离
大卫·佩德罗萨

- 54 书评
《修复：国家如何在如今的衰退中生存与繁荣》，乔纳森·泰珀曼
《获利的货币：人民币的崛起》，埃斯瓦尔·S. 普拉萨德
《第四次工业革命》，克劳斯·施瓦布

插图：第38、39页，iStock。
摄影：封面、Martha Rial；第2、4页，Jim Graham；第6页，mf-guddyx/Getty Images；第8页，François Guillot/AFP/Getty Images；第11页，Paul Vallejos/El Comercio de Peru/Newscom；第12页，Luke Sharrett/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第17页，IMF photo；第18页，Bain News Service/Interim Archives/Getty Images；第20页，William England/Getty Images；第22页，Martha Rial；第23页，Anastasia Vishnevskaya；第24页，Anastasia Vishnevskaya、Tiego Tiemtoré；第25页，Courtesy of Convergys One；第26页，Alberto Niquen Guerra；第27页，Stefan de Vries；第28页，Jess Hurd/reportdigital.co.uk；第30页，iStock，Lee Besford/Fairfax Media/Getty Images；第33页，Wilford Harewood/The Hale Institute, Emory University；第35页，Andrew Holbrooke/Corbis via Getty Images；第37页，Green Peace；第40页，Kay Lee Davies/Getty Images；第43页，Daniel Garcia/AFP/Getty Images；第46页，Michele Linina/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第47页，Fabrice Coffrini/AFP/Getty Images，Swiss National Bank；第48页，Lisa Wiltse/Corbis via Getty Images；第51页，Ezra Bailey/Getty Images；第54—56页，IMF photo。

质疑被广泛接受的事实

2016年是政治动荡的一年，有关全球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并让数以百万计的人脱离贫困的这一被广泛接受的事实，在欧洲、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受到了选民的质疑。很多选民不再相信专家和精英，转而投向那些非主流观点和参选者，以此来对抗全球化带来的负面结果。

“我已经被五个地方拒绝，看来不得不提前退休了，”来自美国的约翰·鲍尔斯这样说道。他曾是一名机械维修工，本期杂志也以他作为封面。经过再培训，这位60岁的空军退伍老兵成为一名电气技师，每小时赚12美金，但他觉得自己能有一份工作已经非常幸运了。“有些人会抱怨。我告诉他们，‘制度只是做了它该做的事。它让你回到学校。没人再会向你保证什么了。他们能做的只有帮助你。’而且他们确实做到了。”

在本期杂志中，我们分析了全球化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塞巴斯蒂安·马拉比指出，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资本、商品和人员的跨境流动之后，仅有移民还在继续增加。资本流动已经崩溃，贸易也停滞不前。但这并非是倒退的信号，他认为可以重置贸易和金融，使其与继续发展的全球化一致，达到一个更可持续的水平。

IMF的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对贸易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虽然贸易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的稳定的全球化以及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长的持续放缓，已经让很多人和团体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他得出结论认为，“虽然全球化给所有人提供了潜在的经济收益，但是如果政府不采取行动对受到贸易全球化冲击的人提供帮助，这些潜在的经济收益并不一定能实现。”

如果说我们已经从中汲取教训，那就是我们需要聆听来自有关全球化辩论各方的不同声音，尤其是那些受到全球化负面影响的人的观点。诸如约翰·鲍尔斯这样的来自发达经济体的工人受到的冲击最大。英国工会联盟秘书长弗朗西丝·奥格雷迪提醒我们，贸易联盟能起到建设性的作用。南非人权活动家库米·奈度则真诚地恳求进行更加公平的财富分配。

然而，人们对全球化的良好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秘鲁的一名铜矿矿工沃尔特·阿斯科纳说，自由贸易和投资为其带来了巨大财富。“采矿业给我带来了良好的生活，”他告诉《金融与发展》。“我希望能继续在这里工作，因为这是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我个人还有一点想要表达，长期以来，为《金融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顾问团成员詹姆斯·戈登（James Gordon）在10月份去世了。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卡米拉·伦德·安德森(Camilla Lund Anderson)

主编

本刊在线阅读网址：www.imf.org/fandd

开拓先锋

伊斯迈拉·迪昂采访莱纳德·沃彻肯——一位以培养新一代非洲经济学家为目标的前政治活动家

越狱是一种得不偿失的冒险。越狱的犯人基本上都会在几小时内被抓捕归案，重新关进监狱。但在1986年莱纳德·沃彻肯 (Leonard Wantchekon) 从西非小国贝宁的时任总统马蒂厄·克雷库 (Mathieu Kérékou) 关押政敌的监狱中成功逃出，他的冒险得到了回报。30年前，这位年轻的激进主义分子从监狱逃脱，到邻国尼日利亚。10年后，当沃彻肯回国时，他已经取得了博士学位。后来，他到美国长春藤联盟大学执教，在重要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并被选入进美国最古老、最具名望的学术团体——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

沃彻肯的越狱非常勇敢，但毫无戏剧性可言。因大胆呼吁结束马蒂厄·克雷库独裁政权，沃彻肯被捕入狱。1986年12月的一天，他提出保外就医，称18个月狱中生活的折磨致使他患上关节炎。监狱长相信了这位30岁的左派学者；在此之前，沃彻肯也曾到同一位医生处就医两次。但这一次，想到未来漫长的囚禁之路，他再也不想返回监狱了。他安排了一辆汽车和一辆摩托车送他去尼日利亚。

沃彻肯目前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是少数在美国顶级高校任教的非洲经济学家之一。他致力于研究非洲经济发展的政治和历史根源，受到发展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他研究大西洋奴隶贸易对当代非洲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公民参与是如何能够减少任用亲信的问题，改善民主管理并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奠定基础。



“沃彻肯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经济发展视角。这些研究涵盖了广泛的重要主题，同时还使用了严谨的统计技术和经验方法，”来自哈佛大学的内森·纳恩(Nathan Nunn)如是说。纳恩是《发展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的编辑，也是沃彻肯著作的一个合著者。他还认为，“沃彻肯重点研究了政治学以及政治学在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填补了当前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巨大空白。”

回馈非洲大陆

沃彻肯在美国生活已有24年，他是克利夫兰骑士队的追随者，是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的超级粉丝。詹姆斯和沃彻肯一样，回馈故土是他们行动的动力。詹姆斯下定决心要为他的家乡俄亥俄州阿克朗市赢得NBA冠军；沃彻肯则渴望培养新一代的非洲经济学家。经过四年的筹划，沃彻肯于两年前创立了非洲经济学院，目的是为年轻的非洲经济学家提供一流的学术教育。在他的计划中，该学院将来会提供经济学、金融、管理、统计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本科课程。他的目标是通过必要的培训，应对非洲面临的最紧迫的发展问题，发挥非洲人的关键作用。

“生活在非洲最不可思议的就是，经济发展中最引人关注的挑战和困惑就在你的身边，”沃彻肯在接受《金融与发展》杂志采访时说道。难题比比皆是，但到目前为止，这些问题的详细分析仍主要在非洲这片大陆之外进行。非洲经济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研究，但极少有在非洲本土生长的研究者参与这类研究。

去年，哈佛大学一位赞比亚博士后研究员格里夫·希尔瓦(Grieve Chelwa)写了一篇博客“经济学的非洲式问题”，吸引了广泛的读者。她指出，在非洲经济发展问题上最具盛名和影响力的刊物——牛津大学的《非洲经济杂志》(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编辑委员会共有27位成员，其中只有一位非洲本土学者(自博客发表至今，增至两位)。而《发展经济学杂志》编委会的64名学者中无一人来自非洲。

沃彻肯认为，造成非洲代表稀少的因素有两个。其中一个因素是，大部分非洲国家的大学本科教育缺乏人文学科的培养。沃彻肯表示，“本科或高中阶段的教育过于专业化，而经济学领域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第二个因素是，“社会科学课程中的数学和统计学培养水平薄弱。”

沃彻肯认为，非洲经济学家数量稀少是这一职业的“损失”。对于非洲发展经济学研究来说，只有极少数“非洲人参与了最高层次的经济学研究”，“我们没意识到这样的危害有多大”。非洲本土经济学家能够提供对当地情况的理解和可以支撑研究成果的“内在动机”。

为说明他的观点，沃彻肯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2009年，他看到母亲生长的村庄比他上世纪70年代时更

加贫困，他震惊了。他开始不知疲倦地研究除了连接村庄与邻近村镇的桥梁倒塌以外的其他导致衰退的原因。他体内的经济学家血液促使他探究这种衰退的原因，由此他与博科尼大学的皮耶罗·斯坦尼格(Piero Staning)共同撰写了他的第一篇农业经济学论文，题为“肥沃土地的诅咒？非洲的土地肥力、道路和农村贫困”。沃彻肯和斯坦尼格发现，非常肥沃的土地与基础设施的缺乏造成了更严重的贫困。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你身处没有基础设施、土地贫瘠的穷乡僻壤，你会送孩子们去学校读书，因为土质太差，无法耕种。但如果土地肥沃，你可能会想多生几个孩子，让他们都去务农，”他说道。

“对人才进行培养时，你要允许他们将个人动机转向高级经济研究。”

“对人才进行培养时，你要允许他们将个人动机转向高级经济研究。非洲人可以利用他们的文化意识和内在动机，深入探究非洲所面临的困境的根源和真相，为经济学知识作出重要的贡献。”

不寻常的旅程

沃彻肯在贝宁中部一个小村庄出生和长大，一家人饱受贝宁政府的残酷虐待。1986年，他的父亲——一个以种地为生的农民——因未交人头税被逮捕、羞辱，并被扣留数日。当时的人头税是向每个收入达到其家庭货币总收入约80%的成年人征收的统一税款。

对这段经历笼罩着他的整个小学时代，1971年他加入了左翼学生运动，为民主而抗争，反对针对穷人的不公平征税。1976年，在上11年级的时候，他因在校报上发表了一篇批评政府的文章而被捕。次年，他人生第一次组织了罢课抗议活动。

沃彻肯曾梦想做一名代数老师。他非常擅长数学。但他的政治激进主义严重影响了学习，1979年进入贝宁大学后，他变得更加激进了。他组建了秘密校园组织，为自由和民主而战斗。然而，他的大学生活没持续多久。在第一次学生大罢课后，当局将他驱逐出校门，迫使他东躲西藏了五年。但是他仍然保持着与学校的联系，继续秘密地在校外组织学生活动。

20世纪80年代中期，处于压力之下的政府对人民的压制有所减弱。沃彻肯重新回到了校园，但他和朋友们并没有看到预期的政治变革。他们又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参与者包括大学生、中学生和公务员。在结束躲避生活的三个月后，沃彻肯再次被捕，此后他一直被困禁在贝宁的监狱中——直到1986年越狱。



许多有成就的学者在 30 岁出头就开始了执教生涯。但沃彻肯直到 32 岁才取得学士学位。逃出监狱后，他来到加拿大，成为政治难民，不久即被魁北克市的拉瓦尔大学录取。在学校里，虽然他没有经济学背景，但却绕过了多门本科课程，直接取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当时执教拉瓦尔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杰拉德·戈代（Gérard Gaudet）表示，“由于他坚定的决心，而且对本科段来说，他的年纪较大，所以学校决定给他一个机会证明自己：用一年时间完成精选的本科课程。他成功地修完了这些课程。”

“硕士其实是我拿到的第一个大学学位，”沃彻肯大笑着说。1992 年，他在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做了两年的研究生，然后去了距芝加哥不远的西北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1995 年他取得了西北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但这一切并非轻而易举。他用尽全力准备资格考试，结果成绩不佳，差点被博士培养课程除名。但幸运的是，考虑到他的妻子在产子时与死亡擦肩而过，而且他几乎完成了毕业论文，学校认为可以放宽对他的要求。但是，学业成绩不佳仍然限制了他的就业前景。后来，沃彻肯无意中看到《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刊登的一则广告：耶鲁大学正在招聘具有博弈论专业背景的政治学助理教授。这个职位的申请截止日期正好是第二天。他跑回家写好申请，当天就发给了耶鲁大学。之后，沃彻肯收到了面试通知。迫不得已，他向一位教授借了 2000 美元买了一套西装和一张机票，飞往耶鲁参加面试。面试非常顺利。不到一周，耶鲁大学就录用了他。1995—2001 年，他一直在耶鲁任教。随后，

他又在纽约大学执教了十年，直到 2011 年普林斯顿大学向他抛出橄榄枝。如今，他分别在新泽西的长春藤校园和贝宁两地任教，沃彻肯培养非洲经济学家的梦想将在贝宁变成现实。

培养环境尚未成熟

非洲经济学院的校址临时定在距离贝宁经济首都科托努不远的地方，目前提供数学、经济学、统计学和工商管理专业的硕士学位课程。另外，还提供经济学的博士学位课程。学院的第一位硕士学位学生将于 2016 年 12 月毕业。这所学院拥有 12 家学术合作伙伴，包括四年中为该学院提供部分资助的普林斯顿大学，以及为数学、经济学和统计学专业学生提供了大约 20 份奖学金的世界银行。

沃彻肯描述了他的发展规划，他想要建造一个占地 18.5 公顷的现代化校园，校园里有植物园、非洲艺术博物馆、体育场以及北美大学（如普林斯顿大学）拥有的所有设施。沃彻肯的构想是在东非（内罗比）和西非（阿比让）建立分校——最终吸收 15000 名学生。

沃彻肯已经对课程设置作出规划，确保学生能够与全球顶尖学子竞争。他在课程设置中极力侧重定量方法和研究技能。学生们还将学习非洲经济史的基础知识。“我们与其他几大洲不同的是，我们对自己的大陆不够了解。”他说道，比如几乎没人听说过亚马逊女战士——达荷美王国的一支女兵精英部队，这个非洲王国就位于现今的贝宁。这支部队由当时的国王胡艾马札（King Houegbadja）于 1645 年组建，直到 1849 年被法国殖民政府解散。

沃彻肯目前每年有四个月的时间待在自己的祖国。但随着学院的发展壮大，现年 60 岁的沃彻肯打算花更多时间待在贝宁。“我认为我在贝宁的作用是推动研究，而不是日常管理，”他说道。但同时他还想与普林斯顿及其他美国大学保持密切的联系。“即便退休后，在某种程度上我还是会想成为长春藤大学的一份子。这是对我所获得的机会的一种感恩。而且，与普林斯顿这样的大学保持联系，为本学科作出贡献是我想要不断做下去的事情，”他如是说。

博采众长的研究员

在 17 和 18 世纪，达荷美王国是欧洲奴隶贸易的主要奴隶供应商。大量非洲人在号称“奴隶海岸”的达荷美开始了其奴隶身份。沃彻肯称，奴隶制的遗产无处不在。他记得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朋友们时常开玩笑说“这人会卖了你”或者“让你从此消失”。这些倾向似乎显示出普遍的社会状况，令沃彻肯感到困惑：有时共同生活数十年的朋友、同事和邻居之间都缺乏信任。他直觉“这一定和奴隶贸易有关系”，后来他逐渐被这个想法所吸引。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不信任，他和哈佛大学的纳恩教授取得了联系。纳恩教授始终致力于研究奴隶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他们开始交流观点，并最终合作撰写了“奴隶贸易与非洲人际不信任的起源”，这可能是沃彻肯职业生涯中最具影响力的论文之一。这篇文章发表在2011年的《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

“教会学校在非洲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至今已被其他学术研究引用了700多次。纳恩和沃彻肯将当代调查数据与种族的奴隶运输的历史数据相结合，发现了祖先曾被大西洋和印度洋奴隶贩子猛烈袭击的非洲人与那些祖先逃脱袭击的非洲人相比，信任程度更低。“这项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证据，这些证据显示历史冲击会给社会的文化结构带来持久的影响。这一结果加深了我们对奴隶贸易损害效应的理解，”纳恩这样说道。“信任对经济交易来说至关重要，这篇论文为以奴隶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长期损害效应为基础的研究提供了证据。”

现场试验

沃彻肯对数学和逻辑推理很感兴趣，因此被经济学所吸引。但是，他对激进主义的热情又带他回到了最初热爱的领域——政治学。沃彻肯在西北大学的博士导师，曾获得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杰·梅尔森(Roger Myerson)敦促他的学生们锻炼设计社会制度所需的政治工程学分析技能。

沃彻肯非常重视导师的这项建议。梅尔森的理论著作启发沃彻肯“想像”能够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的制度性修正措施，并依据经验对这些措施进行试验。他在一篇论文中报告了保护性诉求或基于诉求的选举战略的实验结果，这在当时是第一个涉及真实选举中真实候选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随机化对照实验。

沃彻肯说服了参加2001年3月首轮贝宁总统大选的四位候选人，允许他的团队为每位候选人撰写竞选活动材料，并通过村民对这些材料进行实验。这个团队撰写了两种类型的材料。一种使用具体的机会主义的、有针对性的承诺——例如，为村子修路、修建学校和医务室。另一种罗列了以促进国家繁荣为目标的广泛的信息。投票的村民接收常规的竞选活动材料，参加实验的村民作为对照组接收事先准备好的精选实验材料。这次实验从经验上验证了保护性诉求，如承诺修路和建医务室与泛泛的公共政策诉求相比，更加有效。但是，这种庇护主义做法在候选人开展市民大会这样的竞选活动时，就不那么有吸引力了。

沃彻肯现在是一位折衷和混合发展经济学家，他顺利地引领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工作。沃彻肯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涉及经济和政治两门学科，这实属罕见。“能够自如地游走于两大领域并填补两者间的空白，这本身就是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我认为这也是对政治学的重要贡献，”沃彻肯在拉瓦尔大学的教授——现已退休的戈代先生如此说道。

“他是一个极具创造力的社会科学家，始终致力于最重要的发展问题，比如政治或教育。上世纪90年代，在落选者不接受失败时，他研究选举的运作原则。事实证明，这是非洲民主萌芽的核心问题，”哈佛大学的安德雷·施莱弗(Andrei Shleifer)表示。

目前，沃彻肯正在写一本有关经济发展和长期社会流动性的著作。他计划以家庭中的三代人为例，从中提取数据，记录贝宁从殖民地时期至今所取得的社会和经济进步。这些数据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末(达荷美王国于1904年沦为法国殖民地，1960年独立，建立贝宁共和国)。他的目的在于揭示教育和家庭以及政府的多种形式的投入对于发展成果的重要作用。

这本书是一项教育和社会流动性项目的接续。2015年，沃彻肯将该项目的研究成果撰写成文，发表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本文揭示了一百年前的教会学校是如何发展为培养未来精英的教育，并深刻地影响着独立后的贝宁社会和经济结构。“教会学校在非洲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我认为大家还没有意识到这类学校对于建设经济学家口中的‘上游’人力资本的重要意义，”施莱弗如此说道。

一个美好的六月天，在空旷的普林斯顿大学校园里，沃彻肯回想自己的人生旅程——从学生运动的活动家到培养非洲经济学家的学院创办人，他表示，“虽然一路艰辛，但结局是美好的。”

沃彻肯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他小心策划的尼日利亚逃亡计划在最后一刻险些遭遇滑铁卢。当他赶到边境通道时，发现值勤的是一位对他了如指掌的警官。我们的年轻活动家虽然吓得不轻，但多少也有一点贿赂的常识。他停下来，从衣袋里掏出一卷钞票塞到这位警官手中。警官收了钱，还催促司机快点开车。

行驶在离开贝宁的土路上，这最后的几分钟就如同一个世纪般漫长。最终，沃彻肯安全抵达尼日利亚。只是当时的他不会想到自己的行为竟会创造历史——成为有史以来最具经济价值的越狱。■

伊斯迈拉·迪昂(Ismaila Dieng)曾是《金融与发展》的工作人员，现任非洲开发银行传播和对外关系部主任。

全球化重置

跨境资本流动和贸易的紧缩可能并不像预想的那么严重

塞巴斯蒂安·马拉比

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人们都认为冷战结束之后的20年是全球化的时代。因为在此期间，资本、商品、人员的跨境流动稳步扩大。1989年，柏林墙倒塌。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在这两件大事之间，国际资本流动占全球GDP的比例从5%上升到21%；贸易占比从39%上升到59%；同时，生活在出生国之外的人口数量也增加了25%以上。

但是，今天的情况却变得更加复杂：跨境资本流动已经崩溃，贸易停滞不前，只有跨境人员流动仍在增长。

上述情况是否预示着新时代的来临？这个新时代是去全球化的时代吗？发生去全球化这样的逆转是有可能的，因为从历史上看，19世纪后期的快速全球化就曾导致20世纪早期的去全球化。但由于当前并没有出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类似的灾难性冲击，历史似乎不会重演。深入研究的结果表明，全球化只会变化，不会停滞，更不会逆转。

资本流动

首先来看跨境资本流动，因为这是去全球化论调中证据最有力的部分。麦肯锡全球研究院(Lund等人, 2013)的报告指出，2008年跨境资本流动下跌至全球总产出的4%，只有前一年峰值时的1/5(见图1)。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破产之后，国际金融市场处于非同寻常的冻结状态，上述跨境资本流动的下跌以及2009年降到更低水平的情况都反映了这一状态。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直到现在，金融全球化仍未恢复。因为根据麦肯锡最近更新的上述2013年报告的数据显示，2015年跨境资本流动进一步下跌至全球GDP的2.6%，而2011—2015年平均值仅为5.4%——只有2007年时的1/4。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首先，可以将跨境资本流动划分为四个类别来一窥端倪(见图2)。其中一类是跨境股票投资，即投资者在国外股票市场上购买的股票。2007年以来，以美元计算的跨境股票投资略有上升。而另外两类流动——跨境债券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都出现下降，但降幅不大。但第四类流动跨境银行贷款却出现了崩溃。其中，2015年跨境贷款净额实际上是负数，因为银行收回的跨境贷款多于借出的跨境贷款。通过合并这些数据，麦肯锡的计算结果显示，跨境银行贷款下跌占2007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下跌总量的3/4。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跨境贷款回收是一种健康的修正。因为，2007年以前，两股狂潮同时推动了跨境贷款的不可持续性的增长：欧洲银行大量购买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债券，以及北欧银行向地中海周边国家疯狂放贷。因此，跨境贷款下跌主要集中在欧

图1

资本崩溃

全球危机后，跨境资本流动占全球GDP的百分比急剧下跌，并且一直远低于21世纪之初的峰值。

(全球跨境流入资本，占全球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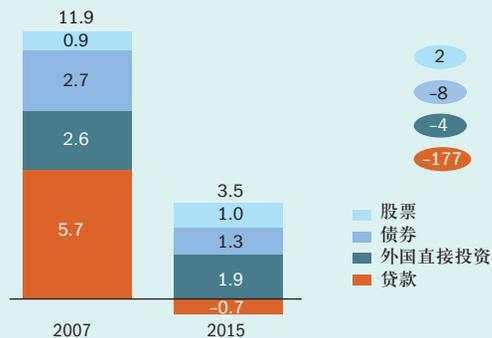
图2

银行贷款消失

2007—2015年，跨境债券投资与外国直接投资下降，而跨境股票投资略有上升。但跨境银行贷款崩溃。

(各类别跨境资本流入，万亿美元)

(2007—2015年复合年增长率，百分比)



资料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洲也就不令人感到惊讶了。而且，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后的八年中，欧元区银行每年减少1万亿美元的跨境贷款，远比其他地区严重。

选择正确的基准

由此看来，金融危机之前几年的情况并不能作为衡量金融全球化是否正常或可取的合适基准。因为当时的跨境资本流动达到高峰，占全球产出的21%，反映出当时的雄心勃勃与轻信交织的异常状态，特别是在欧洲银行。但是，如果2005—2007年情况不正常，那么哪个时间段才

是衡量金融全球化的合适基准呢？

首先，可以考虑2002—2004年这段时间。因为在21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灭（即所谓的网络公司崩溃），随后几年又出现了美国次级贷款热潮和欧元区银行贷款狂潮，而上述三年正好是处于两者之间的相对平稳期。这三年中，跨境资本流动平均占全球GDP的9.9%。根据这一基准，2011—2015年的新常态水平刚好是十年前老常态时的一半。所以，金融去全球化的观点可能是夸大其词。

但是，还有第二种答案。该观点认为，2002—2004年平稳时期的全球化需要程度甚至已被过分高估。自那时起，跨境资本流动已被重新评估。一方面，金融全球化理论上的优点仅仅是理论上的。例如，该理论一般认为，金融全球化可以让富裕国家的储蓄者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快速发展中获得丰厚的回报，从而减轻其国内支付养老金的压力，同时也给新兴市场经济体提供了外来资本，让它们能够扩大投资，可以更快地赶上发达国家。但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很多大型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是靠运用国内储蓄，向外出口资本，而不是进口资本。所以，教科书上的金融全球化案例只是纸上谈兵，脱离实际。

另一方面，如果说金融全球化的优点在现实中难以捕捉，但其缺点却已变得非常明显。首先，全球资本倾向于在繁荣时期涌入小型开放经济体，从而加重过度投资和泡沫风险；全球资本在萧条时期又蜂拥而出，则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衰退。这种现象导致中等收入国家试行资本控制政策。其次，跨国银行中有许多规模巨大、业务复杂、难以监管的贷款者，他们对社会构成了威胁，这一点在2008

年金融危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存在上述风险，发达国家的监管者开始劝阻其银行的对外贷款，此举可能会极大地加重金融去全球化的砝码。福布斯、莱因哈特、维拉德克(Forbes、Reinhardt和Wieladek, 2016)的研究表明，英国监管部门的劝阻相当有力，2012—2013年英国的银行减少了约30%的跨境贷款。

尽管不可否认当前的金融全球化程度比过去要低，但称之为“去全球化”是否最合适，这还值得商榷。因为“去全球化”意味着退缩，更积极的说法可以是“更稳健的全球管理”。最后，监管部门采取的新的限制措施至少部分是对跨境贷款风险的响应，这表明跨境资本流动的合理水平应该大大低于2002—2004年间的水平，当时的水平为全球产出的9.9%。假如最佳比率为5%，那么今天的金融全球化水平就正合适。

贸易萎缩

我们来看看全球化的第二种形式：贸易。毫无疑问，贸易从跨境活动中受益良多。比如，东亚国家发展取得巨大成功就是依靠出口。相反，非洲、拉丁美洲和南亚国家在贸易上偏好于自给自足，但这作为减贫措施来说，其表现并不理想。而且，根据经济学家加里·赫夫鲍尔与郑宜珍(Gary Hufbauer和Euijin Jung, 2016)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贸易稳步扩张，使得美国国民收入每年增加至少1万亿美元，而全球贸易总收益也相应地增长。所以，与技术进步一样，尽管贸易可能扭曲收入分配，但全球化对总体经济的好处要远远大于受进口影响导致的工人损失。因此，对贸易不平衡的正确应对不是保护主义，而是应该采取税收和支出政策将部分贸易总收益再分配给受到进口影响的群体。然而，到目前为止，这种再分配仍然不足，这主要是政策失误，而不是全球化的错。

因为贸易如此有益，可见当前的反贸易倾向是有害的。现在，世界贸易多哈回合谈判已告失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批准也面临不确定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关系协定已经停摆。而且，通过选择离开欧盟，英国选民表示了对



法国巴黎地铁里昂站的乘客。

欧洲单一市场利益不感兴趣，或者说至少他们不愿意以接受移民为代价而加入欧盟。另外，美国最近的总统竞选运动也显示出对国际贸易的支持力度已降低，其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承诺将对贸易伙伴征收惩罚性关税，而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也放弃了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支持。

当前的反贸易倾向也反映在贸易在 GDP 中所占比例的增长急剧减缓。具体来说，1990—2007 年全球贸易增速是全球产出增速的两倍；而 2008 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速却落后于全球产出增速。所以，与金融全球化一样，贸易倒退比雷曼兄弟破产危机的余波持续时间更长。从近期情况来看，2009 年贸易占全球 GDP 的比率急剧下滑，2010—2011 年又迅速恢复，但自 2012 年起开始停滞，最近又缓慢下降（见图 3）。

然而，与金融业一样，贸易减退对建设性全球化事业的打击并不像看起来那么严重。其实，贸易减缓中只有小部分是因为大量出现的微妙的贸易壁垒而造成的，用赫夫鲍尔和郑的术语来说就是“微型保护主义”。IMF 最近也研究了这种保护主义小幅抬头的现象，并认为其效果是“有限的”。所以，贸易减速主要还是由于统计要素的原因，这些统计要素其实并不应该解释为全球化的倒退，其中有些部分反映的一些变化反而证明了全球化的有效作用。

全球化只会变化，不会停滞，更不会逆转。

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2014—2015 年的变化情况。其间，贸易占全球 GDP 的比例从 60% 下降到 58%，相当于减少了 4.5 万亿美元。其实，该降幅的很大部分只是统计假象，即由于美元走强，大宗商品价格降低，因此以美元计价的贸易额下降。其中 2015 年最为明显，当时原油价格比 2014 年降低了 48%，虽然按桶计的原油贸易量实际上是增加的，但原油贸易额还是下降了 8910 亿美元（BP, 2016），仅此一项就造成了 2015 年贸易占 GDP 比例下降了 1/5。同时，铁矿石价格也下降了 43%，小麦价格下降了 24%。所以，虽然这些价格变化使贸易看起来似乎在缩水，但是实际上却无关全球化的健康状况。

另外，如果生产地离消费者更近，贸易也可能受到影响，甚至并非因为保护主义者对跨境商务的阻碍。例如，钻探技术的突破（“水力压裂技术”）就减少了美国对进口原油和天然气的需求。而且，亚洲制造供应链的成熟也有同样的效应。比如，中国过去要进口半导体等复杂元件来装配苹果手机等产品，而现在中国的技术越来越先进，可以在国内生产元件，因而减少了进口。因此，作为全球化的成功典范，中国以外贸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反而降低了其外贸依存度的某些方面，而且结果有些出人意料。

图3
世界贸易飘忽不定

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开始下降，随后恢复，最近又逐渐减少。

（世界贸易，全球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最后，还有两个理由可以证明贸易停滞不是全球化的重大倒退，至少现在还不是。首先，世界经济越来越发达，自然而然就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而服务业方面的贸易更少，部分原因是服务行业有更高的贸易保护壁垒。其次，当前的经常项目失衡在降低，尽管更小的失衡是全球化更健康的标志，但贸易也可能因此减速。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7 年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达到其 GDP 的 10%，这意味着其国内支出的不足需要中国创造相当于 1/10 总产出的净出口。但是，到 2015 年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已降至 3%。因为中国现在花费了更多收入，所以没有必要必须出口原来那么多的产品。当然，在理论上中国可以出口更多，同时避免贸易盈余。但是，储蓄失衡降低也可能是造成贸易不景气的原因。美国和地中海欧洲国家的储蓄赤字已经下降，甚至中国的储蓄盈余也在减少。

总之，贸易明显得益于全球化。只有贸易壁垒最少才可以让各国生产者都集中于自己比较有优势的领域，通过全球竞争来学习并获得规模经济。所以，当前反对国际贸易的政策令人担忧，因为开放不足、竞争性不足意味着生产力提高缓慢，这将进一步减少中产阶级的收入。而中产阶级收入减少却正是批评者对贸易感到失望的原因。虽然认为去全球化已经发生的人经常引用贸易数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但这些数据并没有证明存在令人沮丧的去全球化现象，至少现在还没有。

移民增加

全球化的第三种形式是跨境人员流动，而近年来这一流动持续增长。从历史上看，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移民占全球人口比例几乎没有增长：90 年代初，经济移民占世界人口的 2.5%，而 2000 年该比例为 2.6%（见图 4）。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移民的发展势头强劲，到 2015 年占世界人口的比例达到 3%。现在，有 2.22 亿



左右的人在其出生国之外的国家生活。这表明移居国外的吸引力胜过了根植本土的心理收益，后者是指靠近家庭和文化亲近感。

数字全球化对增长的影响力比商品贸易更大。

另外，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逃离战争和其他不稳定因素的难民潮的发展趋势与移民类似，这很可悲。虽然从1990年到2005年难民占全球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从0.37%降至0.20%。但是，自2005年起，情况发生逆转，2015年难民比例上升到0.29%——仍比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比例要低，因为当时有数百万人逃离战乱的前南斯拉夫地区，但是2015年的绝对数量比那时要大。2015年难民数量达2100万，高于1992年时2000万难民的峰值。而且，在国内无家可归的人更多。可见，战争和灾难等造成的迁移是全球性问题，且目前达到历史新高。

积极因素胜过消极因素

如果说全球化是跨境分享思想与资源的过程，那么本文的结论是积极的。虽然金融全球化已出现逆转，但其新常态可能更健康。其中，外国直接投资是最稳定的、知识密集的、富有成效的跨境资本流动，因为它让接受国的合作方直接参与经营活动。目前，外国直接投资占跨境资本流动的份额更大。对于贸易来说，反对的政治气候的确有害，但最近的贸易数据并不像表面上那样令人担忧。另外，跨境人员流动可能是全球化三个传统形式中最重要的，其增速一直超过人口增速。所以，如果说全球化的最终目的是让个人跨越国境寻找灵感和机会，或者甚至只是逃离国内的恶劣环境，那么全球化并没有减速

的迹象。

但是，最让人有理由对全球化感到乐观的却是别的东西。因为在过去15年中全球化的第四种形式异军突起，尽管在柏林墙倒塌时它还不为人知。今天，思想、数据、新闻、娱乐都在互联网上实现了全球共享，且规模远远超过传统的跨境互动形式。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anyika等人，2016)认为，今天数字全球化对增长的影响力比商品贸易更大。因为数百万在实体世界中不具备跨国经营规模的小企业，通过加入网络市场而转变为出口商。另外，有9亿左右的人使用社交媒体与境外的朋友和同事联系。数百万的学生也通过虚拟课堂进行学习，由位于世界另一端的老师授课。

从宏观角度看，全球化的进程靠两大力量推动：科技和政治，前者让旅行和沟通更加容易，后者维系着开放的世界。20世纪90年代最令人瞩目的事情就是这两大力量的协同效应：中国的对外开放以及贸易自由化的突破，让旅行和通讯更加低廉。其中，贸易自由化的突破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欧洲单一市场、全球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等。

不可否认，当前的世界已进入新时代：虽然科技仍在推动着整合，但政治上的阻力却在不断增强。目前，相对于科技的推力，政治上的阻力仍然较弱。所以，如果没有类似世界大战或大萧条的灾难性冲击发生，最好还是选择相信全球化会继续发展。■

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国际经济保罗·沃尔克高级研究员及作家。他的最新著作是《知者：格林斯潘传》(The Man Who Knew: The Life & Times of Alan Greenspan)。

参考文献：

- British Petroleum (BP), 2016,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London).
- Forbes, Kristin, Dennis Reinhardt, and Tomasz Wieladek, 2016, "The Spillovers, Interactions, and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Monetary and Regulatory Policies," NBER Working Paper 22307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Hufbauer, Gary, and Euijin Jung, 2016, "Why Has Trade Stopped Growing? Not Much Liberalization and Lots of Microprotection,"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report (Washington).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16,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ashington, October).
- Lund, Susan, Toos Daruvala, Richard Dobbs, Philipp Härle, Ju-Hon Kwek, and Ricardo Falcón, 2013,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Retreat or Reset? (Washington: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 Manyika, James, Susan Lund, Jacques Bughin, Jonathan Woetzel, Kalin Stamenov, and Dhruv Dhingra, 2016, Digital Globalization: The New Era of Global Flows (Washington: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对僵滞不前的局面听之任之

贸易自由化进程停滞不前也无大碍

保罗·克鲁格曼

全球化进程目前正遭受政治围攻，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者都对新近提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等协定大肆挞伐。这些政客的大部分观点都是无稽之谈。不过，在全球化进程步履维艰的表象之后存在某些深层次的原因，而对糟糕的经济进行谴责对于恢复既往的常态是不够的。

我认为，重要的一点是，在经济学家和精英人士夸夸其谈的自由贸易承诺以及经济模型实际传递出的讯息之间总是存在着重大的不一致。诚然，教科书上的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会使国家变得富裕，而限制贸易则会使国家变得贫穷。不过，教科书上也提到，如果不存在极端的贸易保护主义，那么任何东西的成本都是较为有限的，而且，贸易会对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产生很大的影响，进而产生赢家和输家。

那么，为什么贸易自由化获得了经济学家和政界精英之流的如此认可呢？我猜想，对于经济学家而言，根据保罗·萨缪尔森所提出的作为经济学最佳实例的著名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得出了一个真实但并非显而易见的结论，并在经济学家的心目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见本期《金融与发展》，“让国际贸易走上正轨”）。对于精英人士而言，我认为有一个因素很重要，那就是二战后的贸易体系成为国际合作绝无仅有的成功范例。这使得贸易自由化对于那些参加达沃斯峰会并侃侃而谈国际事务的人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

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贸易自由化的进展相当顺利。在贸易增长中失利的国家不太明显或者数量不是太多，这主要是因为这种增长的表现形式是相似国家之间行业内部的流动，这对于分配产生的影响是最小的。

但是，自1990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由于运输和通信成本降低（比如其间发生了集装箱船革命），发展中经济体集体改变进口替代政策等一系列原因，南北贸易（即发展水平迥然不同和工资差距巨大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出现大幅增长。这种贸易使贸易双方的实际收入都出现了上涨，但是与1950年至1980年期间的贸易增长相比，其对产业就业产生的影响更大，对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收入分配的影响可能也更为显著。中国的出口确实实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经济学特聘教授。

地取代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的工资停滞不前或出现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这不是唯一的原因。

正如布兰克·米兰诺维克（Branko Milanović）所言，贸易自由化的总体影响是，第三世界的中产阶层和全球最顶端的1%人口获得了大幅收益，而对代表发达经济体劳动阶层的人来说则意味着大萧条。从全球福祉的角度而言，这当然具有积极意义：数亿极端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这对于第一世界的劳动者而言则缺乏慰

藉，因为他们发现生活没有变得更加轻松，而是更加艰难。

鉴于这一事实，对全球化的强烈抵制迟迟未能出现，而其影响一直不温不火，这确实难免令人感到惊讶。很多人预测在经济大衰退之后将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而事实上，至少到目前为止，新的贸易限制并没有大规模出现。

数亿极端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事实上，朝向更加自由化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发展进程似乎已经止步不前。其实，早在衰退之前，这一发展进程就已经渐渐失去了势头，更别提唐纳德·特朗普了：多哈回合谈判处于僵持状态已经为时已久。

我们是否应该因多哈回合谈判这条道路的终结而感到不安呢？我认为没有必要。按照历史标准，贸易已经是相当自由了，而新近提出的诸如TPP等协定更多地是有关知识产权和争议解决的，而非贸易本身。如果这些协定未能付诸实施，也不是件坏事。

而对全球贸易战则另当别论，因为它将给依赖劳动密集型出口的贫穷国家带来毁灭性的影响。不过，如果我们能够避免此类下挫，最好的态度可能是将全球化作为一个几乎业已结束的项目，减少对这个话题的讨论。■

让国际贸易走上正轨

美国肯塔基州坎贝尔斯堡市附近，一列满载汽车的火车。

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

通过国际贸易收益再分配政策可以提升生产力

随着全球经济增长减速，发达经济体明显减少了对国际贸易进一步自由化的支持，美国尤其如此。尽管一些国家对贸易自由化的抵制由来已久，但二战以来都未能阻止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已给发达经济体带来增长，并且促进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收入趋同。

一直以来，反对国际贸易只是少数人的观点，因为大多数人都能从中获益，然而在今天，这种声音似乎越来越多。

虽然国际贸易能让国家更有效地运用资源，但高效率产生的成果并不能在国民中得到公平分配，因此有些人遭受了损害。其结果就可能扩大收入不平衡，影响到人们的生活。

过去 25 年来，由于国际贸易增长、技术进步、政治改革，全球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尽管国际贸易总体上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大多数政府并不能确保经济增长成果（包括国际贸易带来的部分）能够被广泛地分享。甚至在有些地方，总体收入增长乏力已使民众极度失望，从而引发动荡。

尽管国际贸易收益一直以来都不能被公平分享，但最近几年却愈发严重。而在当今经济低增长的大环境下，贸易收益显得更加重要。政府必须通过更加公平的再分配政策，来保护及扩大国际贸易收益。这也可以使经济体更能经受来自全球化以外的其他各种市场力量的考验。

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

二战以来，关税及配额等贸易壁垒逐步减少。而且，凡是贸易壁垒减少的地方，其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都得到了改善，因为它们可以用较低价格取得大量的各种商品。更重要的是，贸易也对生产力有很强的积极促进作用。生产力即运用全球资源制造经济产品的效率。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减速，因此获得这些国际贸易收益尤其重要。

国际贸易提高生产力的主要原因在于比较优势，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两个世纪前的解释那样。他指出，假如英



国和葡萄牙都能生产纺织品和葡萄酒，若具有较低葡萄酒国内机会成本的国家专门生产葡萄酒，另一个国家则专门生产纺织品，其结果是两种产品都能达到最大产量。这两个贸易伙伴都能因此从专业分工中获益。而且，即使某国同时生产两种产品的效率都高于另一国，即生产两种产品都有绝对的生产力优势，这种专业分工仍然有效。虽然国际贸易总能提高各参与国家的生产力，但当今的公开讨论中却经常忽略这一点。

虽然实证研究也支持了李嘉图关于国际贸易提高生产力的基本洞见。但是，贸易对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有利作用远远超出于此。因为，由于国际贸易，来自国外的竞争迫使国内生产者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而且，国际贸易也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半成品，让企业能以较低成本生产产品。最后，出口商能通过参与国际竞争学到更先进的技术，被迫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来争夺顾客（例如，Dabla-Norris 和 Duval，2016）。

在李嘉图的时代，国际贸易是一项崭新的先进技术，打开大门的所有国家都能同时获益，所有人也都能平等受益。

有些时候，国际贸易的确如此。但是，国际贸易的众多积极面并不能解释有些人极力反对它的原因。

其实，国际贸易的两个主要因素可以解释某些人反对它的原因。第一，自由贸易导致部分行业萎缩，需要重新配置经济资源，因此付出了短期代价。比如，由于纺织行业紧缩，其工人可能因无法很快学会葡萄酒酿造技术，而不能转向葡萄酒行业再就业。在现实世界中，这类代价与低效率可能会持续很久，有些甚至会变得很严重，让这些工人感到国际贸易能够带来长远的经济效益很抽象，并且与自己无关。

第二，即使没有就业调整的问题，国际贸易仍然会加剧国内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有些人的收入绝对值甚至会降低。因此，尽管国家整体上提高了生产力和收入，但有些人可能受益更大，而有些人却完全是遭受损失。损失者因此会觉得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见专栏）。

而且，这些所谓的再分配效应不仅体现在贸易全球化进程中，也体现在技术进步上，因为技术进步会让某些行业比其他行业获益更多。假如技术进步让纺织业的非熟练和熟练工人产出相同，而葡萄酒酿造技术却没有改善，其带来的结果几乎是一样的。因为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是相似的，所以技术进步造成的收入再分配与国际贸易类似，这也就不奇怪了。然而，尽管有不少人对国际贸易心存疑虑，但几乎没有人对更先进的生产力表示反对。

要研究贸易全球化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联系，主要挑战在于如何分离出其他因素（比如，技术变化）对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影响。而且，贸易全球化与技术进步之间有很强的相互作用——贸易全球化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是国际贸易收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让研究更加复杂。

为什么有些人会因国际贸易而遭受损失？

国际贸易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对某些人造成损失，但经济学家沃尔夫冈·斯托尔帕（Wolfgang Stolper）与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1941年的一篇文章中给出了其中最简单且最具影响力的一种理论解释。他们假设葡萄酒和纺织生产都雇佣熟练与非熟练工人，但葡萄酒行业需要更熟练的酿酒工人，而纺织行业雇佣的大部分都是非熟练工人。如果纺织行业由于国际贸易而紧缩，新失业的非熟练工人就不得不在日益扩张的葡萄酒行业寻找工作，尽管葡萄酒行业在扩张，但该行业需要的非熟练工人数量相对较少。因此，新失业的非熟练工人要想在葡萄酒行业再就业，就必须接受相对较低的工资，熟练工人的相对工资因而上升，因此葡萄酒行业的所有企业都有动机用非熟练工人来取代熟练工人——例如，通过让少数熟练工人来带领非熟练工人团队。

国家之间与国内的收入不平等

最近几十年来，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已有所下降，但多国的国内收入不平等现象却有所上升，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共同促进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全球趋同，但同时也改变了其国内的生产方式与收入分配机制。

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亚洲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显著降低，尤其是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达到了发达经济体水平，还有最近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印度的人均GDP从1991年的553美元（按2010年美元计）上升到2015年的1806美元；同时期，中国的增长更可观，从1991年的783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6416美元。鉴于两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国和印度的成功发展极大地降低了世界各国之间的收入不平等。但是，缓慢增长的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并没有很快减少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尽管其中不发达国家的贫困率已显著降低。

上述收入趋同和减贫方面取得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国际贸易和投资，即便不能归功于自由贸易政策，也要归功于外向型生产制造。

但是，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其发展成果并不总是能够很平等地分配。大体说来，亚洲和东欧的大多数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在恶化，而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尤其是巴西）收入不平等在降低，但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说仍然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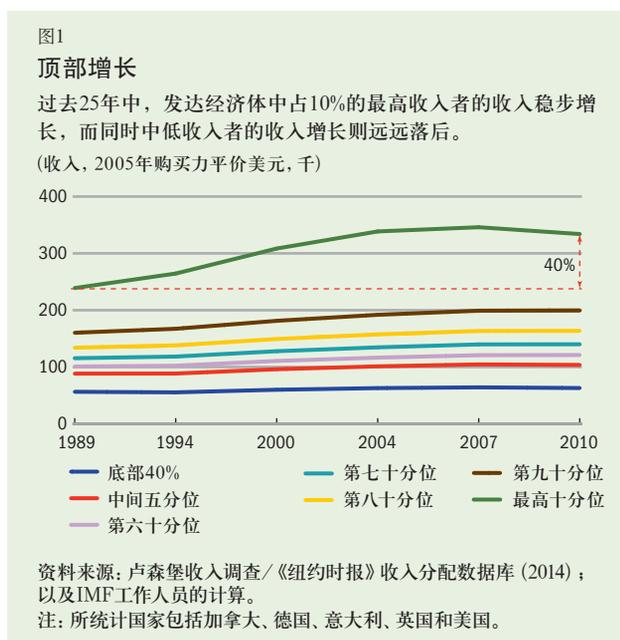
同时，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现象都在加剧，最近经济增长也在减速，从而导致家庭长期收入增长较为缓慢，但高收入者除外（见图1）。虽然经济减速的原因比较复杂，但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

美国的例子说明，由于二战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放缓，其包容性有所降低。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美国人均家庭收入中位数为53657美元，按实际价值计算（扣除通胀因素）的结果与1989年大致相同。作为对照，20世纪80年代末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比20世纪50年代早期几乎增长了一倍。而经过在一段时间快速增长且广泛分享增长成果之后，过去25年来至少有一半的美国家庭未能享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此后，在2015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突然上升了5.2%，但其持续性仍有待观察）。

在很大程度上，收入不平等的降低反映了特定国家政策的作用，比如累进所得税、高级管理人员收入限制、经济金融化。但贸易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仍然是可能的影响因素，因此量化其各自的作用就非常重要。如前所述，贸易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紧密关联。一方面，技术创新（如信息与通信技术）让更多的国际贸易成为可能，例如，银行与保险服务。另一方面，由于有机会进入国际市场，或者面临着进口商品的挑战，企业可能会创新升级其生产流程。而且，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国际贸易促使技术最佳实践跨境传播，技术最佳实践本身也影响了比较优势的模式。也就是说，贸易全球化本身有助于使技术成为国际经济因子。

全球性变化

过去25年间，虽然各种事件层出不穷，但毫无疑问国际贸易和技术进步在改变全球的生产和收入分配方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几件大事的发生共同促成了全球经济的变化。其中，前苏联剧变让其东欧和亚洲加盟国能够实行市场经济，开发国际贸易与投资。



与此同时，已从1978年开始接受市场经济的中国加快了发展步伐，尤其是准许更多企业开展国际贸易并降低了进出口限制。此外，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也对国际贸易更加开放，其中拉丁美洲国家摆脱了将近十年债务缠身的低经济增长，印度于1991年实施了大范围的改革。另外，很多国家对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其他资本流动的开放程度也在提高，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出口。

这些进展在当时广受欢迎，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们创造的全球贸易体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具包容性。这不仅促进了全球数十亿人的经济自由，改善了其中某些地方的政治环境，也通过提高全球收入与消费、增加投资、促进创新来推动经济更快的增长。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加速，但由于某些人比别人更能干，更能抓住新机遇而从中获益，因此也导致了国内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尽管如此，中国和印度等国首次出现了明显的中等收入阶层。

但是，这些全球性变化对收入分配的重要影响也很明显，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工人受到了急剧增长的全球劳动力供给冲击，其中更多的是低技能工人。例如，2000年前后，中国、印度、前苏联国家给世界经济贡献了将近15亿劳动力，让全球劳动力数量翻倍（Freeman, 2007）。而且，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的推论表明，全球劳动力-资本这一比率的增长会降低发达经济体的劳动报酬-资本收益这一比率。这也可能是北美、西欧、日本等国工资中位数长期增长乏力及其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下降的部分原因。而且，与此同时，工会运动衰落，企业向海外低工资地区转移生产基地意愿上升，也进一步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因此，按照斯托尔帕-萨缪尔森的逻辑，发展中国家低技能工人相对工资会上升，而发达国家的高技能人才将受益，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会降低，而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会加剧。但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高技能和低技能人员之间的工资差距一直都在扩大。而且，与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相矛盾的还有，同一行业内技能溢价也有扩大的趋势，同时，没有证据显示因为低技能人员相对工资下降，发达经济体各行业因而增加了其雇佣量。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截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技能溢价的全球演进主要是由于有利于高技能人才的技术的进步——例如，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这是另一种产生全球性影响的变化，其在20世纪90年代初迅速发展，并且赢得了广泛赞誉。但在这种情况下，扩大规模的国际贸易仍然可以发挥作用，由于行业内的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能够找到技能更高的劳动力，国际贸易因此扩大了对技能的需求。国际贸易的另一种可能的影响方式是外包：将低技能工作从发达经济体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可以提高双方的技能溢价（Feenstra和Hanson, 1996）。

自21世纪初以来，贸易全球化已加快步伐，其中包括中国全面融入世界贸易体系。新兴市场经济体加大教育投入，使更多常规制造业与常规服务业转移至海外成为可能；同时，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高科技产品出口迅速增长，在这方面中国尤为突出。在发达经济体，中等技能工作已消失，出现所谓的“工作两极化”现象。尽管某些工作两极化是由于国际贸易和制造业向海外转移造成的，但也有技术方面的原因，比如常规工作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Goos、Manning和Salomons, 2014)。

政府应采取更多的累进所得税和转移支付政策，让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收益得到分享。

仅在最近，才有足够的详细数据可信地证明，中国商品进口以及海外代工对发达经济体的进口竞争型行业、当地劳动力市场、工资等产生长期负面影响。一直以来，由于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生产力提高较快，其制造业从业人员比例已经逐步减少。但是，在21世纪头十年美国的制造业从业人员比例大幅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企业在海外(包括中国)投资建厂生产产品返销美国(见图2)。

如果美国制造业替换下来的工人能够全部再就业，他们就必须接受大幅下降的工资(Autor、Dorn和Hanson, 2016; Ebenstein、Harrison和McMillan, 即将发表)。而且，在包括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很多国家，因进口产品竞争而失业的工人要遭受长期工资损失和失业的困扰。虽然这也是长期存在的问题，但最近有加剧的倾向，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劳动力日益老龄化，以及与中国出口快速增长有关的大范围失调。

从“安全网”到“蹦床”

可见，上述全球性变化创造了新的全球经济，虽然未来似乎不太可能出现与其同等规模的更多冲击，但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后续影响仍然不小，类似的失调肯定还会出现，尽管规模较小。在新形势下，政府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来阻止保护主义政策，同时维护并扩大国际贸易的收益呢？

在其1989年的报告《就业调整走向成功》(Adjusting to Win)中，加拿大就业调整专家顾问委员会对比了“安全网”政策与“蹦床”政策——前者是指通过失业救济等措施给失业者提供保障，后者是给失业者提供再就业“跳板”(Trebilcock, 2014)。尽管两者都很重要，但“蹦床”政策包括就业咨询服务与再就业培训等积极措施，在经济冲击发生时可以帮助失业者更快调整，以减少长期失业，防止技能贬值和就业能力下降。虽然在很多发达经济体已

经有此类项目，但还值得进一步研究推广，让所有人都能从最佳实践中受益。

一方面，“蹦床”项目不仅对与国际贸易有关的变化有帮助，对各种变化都有帮助，而且也有必要。虽然很难识别与国际贸易有关的特定失业，但无论再就业是由于国际贸易还是其他经济变化引起的，政府介入以推动失业者再就业都值得关注。同时，帮助失业者调整的政策还包括加大教育投入(以创造更高适应能力的劳动力)、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加大医疗投资、增加住房供给、降低创业门槛、提供运行良好的金融市场等。这些政策还有促进经济增长的额外收益。

另一方面，“安全网”项目也有必要。因为开放程度更高的经济体可能要经受更多外来冲击，因此需要更多的社会“安全网”。例如，政府可以给再就业后工资降低的工人提供更多的工资保险(Kletzer和Litan, 2001)，并对雇佣失业工人的企业提供工资补贴。此外，类似美国所得收入抵免的政策值得推广，以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同时可以鼓励失业者再就业。政府还应该采取更多的累进所得税和转移支付政策，让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收益得到更广泛地分享。

由于跨境资本流动加剧了国际税收竞争，没有畸高的所得税或累退的消费税，政府难以负担社会“安全网”及再就业工程。因此，需要开展国际反避税协调行动，防止资本所有者从全球化收益中收获过大。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处理收入不平等，那么对国际贸易的政治支持会进一步减弱。

没有保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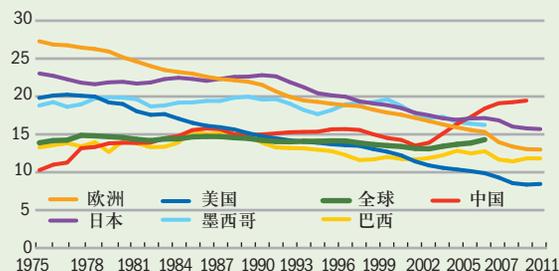
虽然贸易全球化给所有人提供了潜在的经济收益，但是如果政府不采取行动对受到贸易全球化冲击的人提供帮助，这些潜在的经济收益并不一定能实现。自20世纪90

图2

交换空间

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就业人员比例不断下降，原因在于制造业工作已转移到新兴经济体，以及技术进步造成人员过剩。

(制造业，占总就业人数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 EU-KLEMS; EUSTAT; GGDC 10-Sector; ILOSTAT;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OECD; and RIETI CIP.

年代初以来，全球性变化影响深远，外加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长持续的放缓，这已经让很多人和团体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因此，在许多发达经济体中，对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的反对浪潮日渐高涨。

但是，国际贸易与贸易政策并不是这些变化的唯一原因，甚至可能并不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它们也不是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技术进步以及特定国家的发展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没有分摊经济开放风险的明确政策框架，二战结束以来所秉持的推动国际贸易的政治共识可能会烟消云散；政府要确保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培养受到良好教育、适应能力强的劳动力；做好职位匹配；改善金融市场功能；采取直接措施处理收入不平等问题。此外，处理一系列其他经济变化也需要同样的政策框架，因为与国际贸易一样，这些经济变化也可能对有些人造成损害，所以需要在经济体内部进行调节。

国际贸易是唯一特殊的，这只是一种错觉，即认为当外部世界引起麻烦时，政府能够闭关锁国，以解决问题。但在 21 世纪，国家之间必须相互依存，别无选择。■

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Maurice Obstfeld）是 IMF 的经济顾问、IMF 研究部主任。

参考文献：

Autor, David H., David Dorn, and Gordon H. Hanson, 2016, “The China Shock: Learning from Labor Market Adjustment to Large Changes in Trade,” NBER Working Paper 21906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Dabla-Norris, Era, and Romain Duval, 2016, “How Lowering Trade Barriers Can Revive Global Productivity and Growth,” iMFDirect, posted June 20.

Ebenstein, Avraham, Ann Harrison, and Margaret McMillan, forthcoming, “Why Are American Workers Getting Poorer? China, Trade, and Offshoring,” in *The Factory-Free Economy*, ed. by Lionel Fontagné and Ann Harri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eenstra, Robert C., and Gordon H. Hanson, 1996, “Globalization, Outsourcing, and Wag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6, No. 2, pp. 240–45.

Freeman, Richard B., “The Great Doubling: The Challenge of the New Global Labor Market,” 2007, in *Ending Poverty in America: How to Restore the American Dream*, ed. by John Edwards, Marion Crain, and Arne L. Kalleberg (New York: New Press).

Goos, Maarten, Alan Manning, and Anna Salomons, 2014, “Explaining Job Polarization: Routine-Biased Technical Change and Offshor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4, No. 8, pp. 2509–26.

Kletzer, Lori G., and Robert E. Litan, 2001, “A Prescription to Relieve Worker Anxiety,” *Policy Brief 73*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Trebilcock, Michael J., 2014, *Dealing with Loser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Transi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LUMBIA | SIP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12-MONTH MPA PROGRAM IN ECONOMIC POLICY MANAGEMENT AT COLUMBIA

Designed for mid-career professionals, with tracks in

- Economic Policy Management
- Central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 Global Energy Management and Policy

Application Deadline for 2017–2018: January 5, 2017

- A rigorous graduate training in micro- and macroeconomics
- Faculty of world’s leading economists, policymakers, and expert practitioners
- Tailored seminar series on macroprudential policymaking,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financial crises

Contact us at pepm@sipa.columbia.edu | 212-854-6982 | sipa.columbia.edu/pepm



双向车道

政策制定者必须着手解决经济和政治问题，以加强全球化

大卫·利普顿

对全球化不断增多的疑虑和不满威胁着国际秩序的经济和政治基础。由于很多不满都围绕着贸易和开放性，因此我们可能面临着不得不放弃合作的风险，而正是这种合作曾帮助我们建立了一个有史以来最为繁荣的时代。

全球的领导者必须直面这个问题，并针对与当前争论相关的政治经济形势展开讨论。近期的英国脱欧公投以及美国大选是较为突出的情况，不过在许多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例子。自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增长放缓，失业率高企，收入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这些因素都助长了不满情绪的滋生。

这种情形为经济政策制定者以及我们IMF带来了独特的挑战。长久以来，我们的审议意见和决策未能将政治分歧因素全面考虑进去。

IMF能够帮助强化合作和政策。

现在我们将政治和经济视为一条双向车道。我们必须努力克服当前复杂的政治风险。但是，我们应对当今时代正在逼近的经济挑战——增长缓慢、收入和性别不平等、不断发展变化的技术以及人口的变化——所采取的方法将对未来的政治局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当前的风险包括：

- 来自内部的威胁，诸如现在辩论中最为突出的对全球秩序的不满。对收入增长、失业以及社会混乱的普遍不满已经以惊人的速度颠覆了许多发达经济体的政治。
- 腐败、徇私舞弊以及治理不善等陋习破坏了人们对民主化进程的信心，并使人们对政治和经济精英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
- 来自系统外部的威胁：恐怖主义、民族国家的分崩离析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难民潮；计算机黑客行为



大卫·利普顿（David Lipton）是IMF第一副总裁。

以及其他跨境犯罪。公司开始承担了重要的新职责。它们所编制的的数据已超过任何政府；它们的运营不仅仅跨越了边境，同时还使用云技术；它们通过数据来影响公众舆论和行为。

同时，地缘政治基础也在国际社会中转移。中国以及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等其他新兴经济强国在要求获得更多话语权，并采取行动建立多边机构，以更好地反映其在全球经济中不断提高的重要性。目前，包括IMF在内的机构正在根据当前出现的新情况作出调整。

现在不适合因循守旧，而是需要领导力和国际合作双管齐下。上述许多看似难以解决的问题都是跨越边境的，各国领导人要在没有此类合作的前提下满足其人民的期望的压力巨大。通过已成立的多边机构、G20和其他政治论坛，甚至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成立的机构，这些合作机制有助于实现全球化承诺并限制所产生的伤害。有效的合作将有助于领导人挫败其各自国家的民粹主义抵制。

我们在政府通过合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看到了领导力。领导者通过政策来平息国内的金融风波，并借助20国集团、IMF以及其他机构，从新的政府合作渠道中寻求力量。

通过应对当前的挑战，最终会形成正确的政策。我们必须首先强调实现更加强健的增长：要想每个人都能得到一块更大的蛋糕，那么就要求我们要把整个蛋糕做大。其次，更具有包容性的经济增长要求政策能够顾及到那些在金融危机、技术变革或全球化进程中输掉的人。否则，我们的政治问题只会陷入更深的泥潭。

IMF能够帮助强化合作和政策。我们能够确定各个国家所需要的经济政策变革以推动增长势头，或许也可以更好地了解一些政治分歧。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抵制分裂势力。鉴于我们所面临的威胁，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通过合作而受益。■



20世纪初期到达纽约埃利斯岛的移民。

新概念 旧现实

全球化是近年才出现的新词，但市场、人员、理念和文化的国际化并不新鲜

哈罗德·詹姆斯

全球化触发了不同寻常的响应措施。如今，几乎每个关注全球化的人都一致认为当前人们对全球化的反对方兴未艾，但许多人觉得全球化这个基本过程是不可避免且不可逆的。

真的是这样吗？回顾历史有助我们了解反对全球化——即金钱、商品、人员、观念、技术和文化在各国家间的流动——运动的发展动态。

当代意义上的“全球化”一词出自上世纪70年代，用于描述油价上涨后的市场国际化，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国际化，但是它反映的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实。近年来，全

球化似乎进入上升期，至少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是如此，但这种上升仅仅是散布于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众多时期和逆转之一。

全球经济危机教会我们，依靠对短期内的数据进行推断得出的经济“发展趋势”分析会导致错误的，甚至是危险的结论。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数据的特殊及异常程度，也没有意识到全球互联的复杂性。意外危机所带来的冲击，让我们开始关注在更较长时期内所形成的模式。成熟且持久的模式会突出缺陷，而这些缺陷有助于我们发现调整制度框架的方法，使全球化变得更加稳定、安



全——且更加公平。

过去的全球化

描述 19 世纪下半叶和 20 世纪初充满活力的全球贸易现已成为经济历史学家技能展现的一个标准配备 (O' Rourke 和 Williamson, 1999)。但是, 这一个时期并不是全球化的唯一插曲。考古学证据证实了罗马帝国的全球贸易影响力, 当时的罗马货币不仅在这个永恒之城流通, 还出现在了斯里兰卡和越南沿海地区。自此全球贸易和金融出现了众多的后续发展。在其中的很多发展过程中, 古典时代和罗马全球化时代 (和全球化规则) 观念复苏, 15 世纪末和 16 世纪初 (成为文艺复兴的经济背景) 以及 18 世纪出现经济反弹, 在此期间, 改良后的技术和更加快捷的沟通 (为英国和法国) 打开了全球化帝国的大门。

技术和全球化密切相关: 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一现象描述为“技术全球化”。蒸汽发动机推动了 19 世纪的全互联。在铁路机车中, 蒸汽发动机开启了新的大陆, 让农民可以为远离其家园的其他市场生产农产品。后来, 轮船将各大陆连接起来, 交通成本的急剧下降推动了市场的整合。交通的协调需要统一的信息, 而电报可以传递市场所需要的信息——当 1865 年第一条稳定的横跨大西洋的电缆铺设完成时, 跨越海洋发送电报成为现实。

由于印刷品和报纸等传播技术, 人们能够增加对其他国家的了解, 并将他们每日为生计而挣扎时所经历的严酷现实与富足、幸福的神话般的理想黄金国进行比较。因此, 他们已经做好准备承担巨大的艰辛, 来完成这危险的旅程。但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 他们通常认为, 希望之乡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可能不会变成现实, 但有可能在他们的下一代身上实现。

安全阀

而移民不仅仅是个人对更好生活状态的一种追求。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 移民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 释放了移民输出国的社会压力。移民为技术变革及贸易过程带来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技术变革及贸易过程使各类经济活动成为多余。通过移民, 个体创造了新的生活和新的机会。

在 19 世纪全球化的环境下, 人口从欧洲周边非常贫困的地区 (东欧、地中海欧洲国家和斯堪的那维亚) 流出, 提高了收入。特别是在斯堪的那维亚地区, 在经济繁荣期, 收入的提高非常可观。19 世纪中期和 20 世纪初有 3000 万移民离开欧洲来到美国; 约有 650 万人移民到阿根廷, 500 万人移民到加拿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 美国的境外出生人口份额比现在还高。

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 (Albert Hirschman) 捕

捉到移民的政治动态——毫无疑问, 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自己逃离纳粹德国的政治及种族迫害的经历 (Hirschman, 1970)。移居他国 (离开本国) 越容易, 对出生国的政治社会的承诺 (忠诚度) 就越低, 并且表达思想 (话语权) 的需要越不迫切。当移民被阻止时, 对话语权的需求就会提升。

移民接受国则表现出相反的动态。人口的移入不仅能提升忠诚度, 还能带来经济活力。美国强大的企业精神——正如已故的托马斯·麦克劳 (Thomas McCraw) 所强调的——就是移民创造能力的见证 (2012)。

有时, 安全阀会转变人口的流向并造成其他地方的人口泛滥, 致使人口迁移非常不得人心。对全球化的强烈抗议往往会攻击此前的移民安全阀, 如今很多国家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逆转

对全球化的强烈反对有以下几个历史性的原因。

首先是对陌生事物的简单心理反应。人们满足于彼此间的互动; 他们逃避外来事物, 在面对全球化的威胁和破坏时, 想要寻求保护。

远距离贸易这个话题往往会以对非必要奢侈品的谴责而告终。

远距离贸易这个话题往往会以对非必要奢侈品的谴责而告终。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他的中世纪基督教徒继任者托马斯·阿奎那都承认有些产品具有远距离交易的必要性, 但他们认为本国生产更加符合道德准则, 因为他们认为外国人会破坏公民生活 (Irwin, 1996)。罗马哲学家老普林尼 (Pliny the Elder) 曾抱怨罗马到处充斥着来自印度、中国和阿拉伯半岛的昂贵又毫无用处的进口奢侈品, 诗人塞克特斯·普罗佩提乌斯也曾抗议说“骄傲的罗马因财富而堕落”。新教改革的重要人物——神学家马丁·路德, 反对意大利奢侈品日益侵蚀德国本土的朴素的产品。美国独立战争的起因也是反全球化运动——反对英国税收和英国跨国公司的奢侈产品 (茶)。

对移民的强烈抵制还与本土主义有关。1882 年, 美国国会通过了阻止中国劳工入境的《排华法案》(并要求所有中国人在抵达美国时出示职业证明书)。此后, 国会对该法案进行了多次修订 (最终于 1943 年废除)。美国还通过了多项在更广泛意义上限制移民的法案——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逐一被总统否决。

历史为我们带来了第二个历史性原因: 经济危机期间全球化崩溃瓦解。金融是造成国际联系不稳定性的最大因素。全球化扩大了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经济史上的一项



加拿大安大略省克利夫顿站，大西部铁路上的19世纪的火车头和车厢。

研究发现，与二战后20年间的有限金融互联相比，19世纪金本位一体化时期有更多的资本在各国之间流动。但在金本位下，也出现了更多的银行业危机。特别是1907年和1929年后的大规模金融危机导致了新的民族主义热潮，于是人们把金融危机归咎于外国人和外来影响。

第三种假设是金融市场的动荡或崩溃推动了对国际运行制度的探讨以及对全球舞台权力动态更加敏感。1907年的经济危机提供了重要经验，帮助我们认识金融危机的影响及金融改变政治的方式。1871年后，世界金融体系主要以英国为中心，尤其是伦敦。1907年10月的大恐慌体现了快速发展的新工业力量（特别是德国和美国）以及对使用金融力量的渴望。这次危机起源于美国，由于对现金的大量需求导致利率飙升，增加了对黄金进口的需求。但这次危机也导致其他国家的利率飙升，给埃及、意大利、瑞典和德国的银行——几乎全世界的银行都造成了压力。

1907年的经历让一部分美国金融家确信纽约有必要制定商业贸易制度，就像成熟、兴旺的伦敦市场那样，以同样灵活的方式确保金融交易的安全（Broz, 1997；Eichengreen 和 Flandreau, 2010）。其中，保罗·沃伯格（Paul Warburg）就是推动美国承兑市场（短期金融工具的交易市场，常用于金融进出口业务）发展的核心人物。沃伯格是美国中央银行联邦储备系统设计的主要参与者。他的弟弟，麦克斯·沃伯格（Max Warburg）曾是德国独裁者德皇威廉二世的私人顾问、汉堡知名银行家，后也移民美国。沃伯格两兄弟都是银行家，他们分别在大西洋两岸大力推动德国和美国的机构发展，旨在打破英国主导的工业和金融垄断。他们确信德国和美国将逐年强大，而英国将逐渐衰弱。

第四，全球化改变了地缘政治的局面，从而引发政治紧张，因此战争爆发，破坏了全球互联性，同时全球联系也是应对缺陷和战略相互依存的对策。来源于法国法律思想家和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的传统思想将商业视为和平的

源头。19世纪伟大的英国自由贸易家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和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对于“和平理念”最著名的描述来自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的《大幻想》（The Great Illusion, 1931），即“无形的经济力量将武器的力量化为泡影”。安吉尔的目的是展示经济相互依赖给统治和帝国带来了怎样的变化。他从中看到了与罗马模式帝国主义的根本性区别，罗马模式依赖于对受统治人口的朝贡的榨取。“罗马不必建立市场，也不必为她的资本应用寻找一个领域。但我们需要。”

但是，相互依赖实现了一种可能，即将系统性破坏的威胁用作权力政策的工具（Lambert, 2012）。全球化世界中网络的复杂性及网络传播影响的方式使其成为权力斗争的理想工具。然而，利用网络权利的策略并不简单：破坏的威胁很容易反咬破坏者一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都曾实践过战略性破坏。英国对德国挑起战争，严密封锁海峡，1917年德国向英国发起了无限制潜艇战，但这两个国家的战略都适得其反。最终，两败俱伤。但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为时已晚。

全球化的经验

在全球化周期的每个阶段，我们往往依据当前的发展来进行推断，并认为这一特定的阶段会永久性持续下去——无论是信心满满的上升阶段，还是停滞不前及痛苦愤怒的衰退阶段。当上升趋势被打破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方向的迷失和幻灭。

在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余波中，一个与100年前相似的理由促使德国和美国银行家不仅产生了改革金融制度的想法，而且开始考虑世界金融及经济的新格局。虽然美国是2007—2008年金融危机的震源中心，但由于其金融体系深厚且成熟，因此美国比其他先进工业地区恢复得更好。美国的经验促使亚洲和欧洲就如何赶超美国制度的成熟和稳健展开了广泛讨论，就像1907年后德国和美国试图从伦敦和英格兰银行的模式中吸取经验一样。

正如一个世纪前一样，世界各地都在专注研究社会不稳定带给我们的各种经验教训。随着以人民币计价的对外贸易比例的快速增长，中国的政策制定者的工作重点是在贸易金融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上世纪初，美国爆发了以纽约代替伦敦作为贸易承兑中心的争论，当前的中国正在复制当时的历史。

标准化的债券需要欧盟内部的政治和宪法改革。

而欧洲人学到的经验是认识到他们需要更加安全的

资产和更健康的政府债券市场，并将与美国国债相似的标准欧洲证券设定为发展方向。这与百年前的1907年银行危机爆发时德国社会所作的探讨相似。当美国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统一国债为中心建造了新的共和国时，许多欧洲经济学家以及业外人士从中看到了美国早期经验的价值。但标准化的债券需要欧盟内部的政治和宪法改革，所以恐怕难以周全——正如20世纪初德国证券的全面发展，最终还需要实现更加广泛的宪法化。

零和博弈

对其他一些国家来说，从2008年危机中习得的主要经验就是这个世界本来就充满了冲突，各个大国在霸权主义斗争中进行零和博弈 (Rachman, 2011)。这场激烈的金融外交的目标是寻求美元的替代方案和国际化的金融体系，当然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2008年9月，为了对金融危机作出迅速响应，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索契发表演讲，明显重演了上世纪60年代法国对美元过度特权的批判——美元凭借其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不受其他货币所受到的市场约束。2008年后普京的立场可以说是他对2008年教训的反思，否则很难从其他角度对此立场作出解释。2014年，中俄天然气交易的主要特征就是销售额未以美元计价——这同时满足了美国希望提升人民币重要性及俄罗斯希望在国际商务中减少对美元依赖的目标。在金融危机、毁灭性的战争和冲突过后，移民数量也会出现增长。

希望的愿景

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会议开幕时，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部长亨利·摩根索 (Henry Morgenthau) 描述了他的愿景：

“我希望本次大会能够将焦点放在两个基本的经济公理上。第一个是：经济繁荣没有固定的界限。它不是会因分割而减少的有限物质。相反，其他国家越繁荣，每个国家所拥有的就越多……第二个公理是第一个公理的必然结果。繁荣，如同和平，是不可划分的。我们无法让它降临到一两个幸运的地方，或者把它建立在其他国家的痛苦之上。”

“Globaliser”一词在法语中的含义不同于其在英语中的意义。法国人提到全球化 (globalization) 时，他们一般会用“世界化” (mondialisation) 这个词。Globaliser的意思是在多个问题领域间建立连接：例如，证券和经济学，或更具普遍性的不同风险的评估之间的连接。二战结束时，为了创建新的和平秩序，联合国和跨国经济机构在审慎、均衡的原则下成立：五个最强大的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永久性成员国。这些国家在世界银行和IMF中享有五个最大配额和永久性席位。但是，由于

当时的苏联未能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整个政治和经济体系开始出现分裂，并且共产主义革命让小小的中华民国 (台湾) 首先占有了IMF的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到1980年才取得席位。

政治和经济区域之间的联结是1944—1945年间的唯一理想。但是，经济和政治竞技场的相继分裂使得问题变得更加难以解决，或者说变得无法解决。要实现这种联结，需要恢复二战结束时的精神和士气，制定一种制度方案——它既具备缓解经济危机冲击的技术工具，又能够将各国组织起来，就共同的行动方式达成普遍的共识。■

哈罗德·詹姆斯 (Harold James) 是IMF的一位新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和国际事务教授。

参考文献：

Angell, Norman, 1913, *The Great Illusion: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Military Power to National Advantage* (Toronto: McClelland and Goodchild).

Broz, J. Lawrence, 1997,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Eichengreen Barry, and Marc Flandreau, 2010, “The Federal Reserve, the Bank of England and the Rise of the Dollar as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1914–39,” *BIS Working Paper 328* (Basel: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Hirschman, Albert O., 1970,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rwin, Douglas A., 1996, *Against the Tide: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Free Trad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ambert, Nicholas, 2012, *Planning Armageddon: British Economic Warfare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cCraw, Thomas K., 2012, *The Founders and Finance: How Hamilton, Gallatin, and Other Immigrants Forged a New Econom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Rourke, Kevin H., and Jeffrey G. Williamson, 1999, *Globalization and History: The Evolution of a Nineteenth-Century Atlantic Econom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Rachman, Gideon, 2011, *Zero-Sum Future: American Power in an Age of Anxie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双刃剑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强正在影响世界各地的劳动者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莱斯兰丁的电气技师约翰·鲍尔斯因利用了政府的帮助失业工人计划而重新就业。

全球化以无数种方式塑造着我们的生活。以人口流动、资本、观念为驱动力，信息技术为辅助力，全球化为一部分人提供了改善生活的机会，也给另一些人带来了混乱与困难。

在本文中，《金融与发展》将为您讲述了来自五大洲的六个与全球化影响（或好或坏）有关的故事。

全球化导致一部分人陷入了困境。美国一位工人因外来竞争压力而丢掉了他在制造行业的工作，幸好有政府投资的再培训计划，他成功地找到了新工作。在瑞士，新技术和瑞士法郎的影响力给传统钟表匠带来了双重威胁——来自时尚智能手表和其邻国法国廉价劳动力的竞争。在非洲布基纳法索，棉农在全球棉花市场的发展能力刺激了经济的增长，但他的生计和布基纳法索的经济都受到了威胁，这些威胁来自有能力补贴生产的较发达国家。

全球化也让一些人受益——但各地情况通常存在细微的差别。在菲律宾，由于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以及拥有受过良好培训，能使用英语交流的劳动者，从而促进了外包公司的蓬勃发展。得益于中国庞大的金属需求，秘鲁从大幅上涨的国际铜价中得到了实惠。而在法国，生活在条件艰苦的巴黎郊区的失去公民权的劳动者们，由于专车服务应用程序（如优步）的传入而找到了工作。

职场新开始

约翰·鲍尔斯天不亮就起床，赶往离家 60 英里的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上班。在辛苦地安装电动门一整天后，

他有时到晚上九点都不能回家。这位 60 岁的空军老兵每小时只赚 12 美金——但他觉得自己能有一份工作已经非常幸运了。

“我已经被五个地方拒绝，看来不得不提前退休了，”鲍尔斯在不久前的一个周日说道，当时他正放松地坐在自己那个狭小的木隔板家里壁炉旁的扶手椅中，他的家在宾夕法尼亚州西南部小城莱斯兰丁。

世代以来，坐落在莫农加希拉河岸的莱斯兰丁和其他社区居民都在煤矿和钢铁厂，以及从设备供应商到电厂等支持这些企业的业务网络领域就业，薪水非常优渥。到上世纪 80 年代，海外竞争严重削弱了本地钢铁行业，这一形势发生了改变。

如今，鲍尔斯所在的格林县的失业率达 7.1%，是宾州各县中失业率最高的。宾州全州的失业率为 5.7%。

宾州莫纳卡炼锌厂就是最近海外竞争的受害者之一。鲍尔斯曾在这家工厂工作了 18 年，负责维修机器。铸造厂从炼钢厂电弧炉粉尘中还原锌，成为进口廉价镀锌钢的受害者。

2013 年，该工厂的所有者马头公司开始裁员，辞退了 500 多名员工，鲍尔斯便是其中的一员，隔年该公司关闭了工厂。为了与进口商竞争，马头公司在北卡罗莱那州建立了成本较低的冶炼厂，将氧化锌的生产搬到了加拿大的一家工厂进行。

“我被这个消息吓坏了，”鲍尔斯回忆道。“我将来该怎么办？我不是 25 岁的小伙子了。”

宾夕法尼亚州的劳工部顾问劝他利用联邦帮助失业工人的计划，这个计划旨在帮助因外来竞争而失业的劳动



者。尽管他对于接受政府资助的学费存有疑虑，但他还是去匹兹堡技术学院接受了电气技师培训。

重回学校上课并不容易。除了电子和物理学外，他还修了讲演、写作、数学课程。“我学得很辛苦，”他说道。“有些内容就是无法领会，我必须复习两三次。”最后，他决定努力学习。最终，他凭借完整的出勤记录和优异的成绩，在21个月内取得了大专文凭。

“毕业的时候我很骄傲，”鲍尔斯说，“我做到了自己想都没想过的事。”

鲍尔斯现在在一家安装栅栏的公司找到了工作，以前他曾经在这家公司当过学徒。但他的时薪只有在马头公司时的一半。

他说自己以前的很多朋友都没这么幸运。有些人失去了家。有一位曾经取笑过他回校读书的朋友现在在奶牛场做工，每小时赚10美元。

“现在薪水普遍都不高，”鲍尔斯说道。“在这里每小时赚15美元就是很高的了。但这个数只是以前钢铁厂的起薪。”

他从工作中找到了乐趣，但重体力劳动和辛苦的通勤影响了鲍尔斯的健康，最近他刚做了肩关节炎手术。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他申请了20多个离家较近的职位，但都没有成功，其中还包括一个市政污水处理厂维修部主管的职位。

因为家人的关系，他必须把眼光放远。他的父亲今年84岁，是退休的钢铁工人，仍然居住在附近的比弗县，那里是鲍尔斯出生的地方。而且鲍尔斯还订了婚，他的未婚妻艾丽莎·哈契是曾经鼓励他返校培训的州劳动部项目主管。

综合考虑所有因素，鲍尔斯认为自己是幸运的。“有些人会抱怨，”他说。“我告诉他们，‘制度只是做了它该做的事。它让你回到学校。没人再会向你保证什么了。他们能做的只有帮助你。’而且他们确实做到了。”

报道：克里斯·威尔利兹（Chris Wellisz）

摄影：玛莎·里亚尔（Martha Rial）

动荡时期

在过去40年中，手表业为莱昂内尔·帕门蒂尔和他的妻子带来了舒适的生活。他们的家毗邻瑞士著名的滑雪胜地、世界遗产葡萄酒产区和日内瓦湖。

钟表匠零售及维修店几乎是瑞士人依偎的舒适的经济安乐窝，M.帕门蒂尔（M.Parmentier）钟表店对帕门蒂尔和他的家庭来说意味着稳定、繁荣的四个十年。

但是，现在他所赖以生存的手表工业的情况并非如此。对他儿子来说，情况也是一样，他的儿子一直追随他的脚步，但现在也失业了。他说，找到合适工作的机会很渺茫。

1995—2012年，繁荣的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

对奢侈品的庞大需求为瑞士手表制造商创造了新的增长势头。但自2012年起，来自中国的需求明显下降，该行业的繁荣也随之消逝。2015年1月，制表商们再次遭到打击，瑞士国家银行允许瑞士法郎升值15%—20%。瑞士手表的海外销售价格显著提高——对这个产品出口高达95%的行业来说，这是极大的不利条件。

瑞士钟表联合会的报告显示，自2011年起，手表的出口下降了5.6%。更严重的是，2016年上半年的出口额比2015年上半年下降了12.4%。这一下滑致使卡地亚、江诗丹顿和伯爵等主要企业进行裁员。斯沃琪集团（旗下品牌包括欧米茄和天梭）报告显示，2016年上半年其营业利润下降了54%。

名牌手表业遭遇衰退，但其他经济领域的发展状况良好。瑞士的人均GDP为60500美元，比美国高出8%（基于购买力平价）。其他出口商品——特别是化学治品和药品——的出口额逐渐增长，而整体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消费的刺激，发展良好。薪资高，失业率低。外国顾客虽然不会购买瑞士手表，但仍然有大量本地消费者光顾M.帕门蒂尔钟表店。

但是，莱昂内尔的儿子拉斐尔在瑞士历峰集团（旗下品牌包括卡地亚和伯爵）最近一轮的裁员中丢掉了工作。



来自瑞士日内瓦的莱昂内尔·帕门蒂尔在他的钟表店里。



他曾经在刻度盘制造部门做了十年的项目经理。

“裁员公告让我们深受打击。当时我们刚搬进新的办公大楼，”拉斐尔说道。

和许多行业分析师一样，他对于制表商对中国市场的战略聚焦表示不满。“我觉得任何局外人都能明显感到这样做生意很危险，”他说道。“这样做让我们暴露在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之下。”

最初，作为两个年幼孩子的爸爸，拉斐尔对于自己能在本行业再找一份工作充满信心。但是，他很快发现整个行业都陷入了困境。

“我觉得应该用‘不可能’这个词来描述眼下本行业中找工作的情况。这些公司都不再招聘新员工了。”

拉斐尔将这种情况归咎于法国跨境上班族，他说这些法国人很乐意来瑞士做低薪工作。“在这些公司的停车场，放眼望去全是法国汽车牌照。瑞士人难以与之竞争。”

瑞士失业保险体系能够为失业求职者高达 18 个月的年轻的帕门蒂尔提供其原薪水的 80% 的工作。他调整了自己的职业目标，将目光转移到瑞士新兴的航天业，他认为自己的项目管理经验和技能可以让他在这一行业里游刃有余。

他的父亲并不打算放弃已经做了 40 年的老本行，即使奢侈品市场受到了智能手表的威胁——智能手表将计时和电脑功能相结合，正如手机将电话和电脑的功能相结合一样。他说，传统手表会一直存在。智能手表“不能称之为手表；它只是一块屏幕。它不具备传递给下一代的价值”。

报道：塞莱斯特·戈雷尔·安斯提斯 (Celeste Gorrell Anstiss)

摄影：阿纳斯塔西娅·维希内斯卡娅 (Anastasia Vishnevskaya)

白色黄金

棉花是非洲布基纳法索仅次于黄金的第二大出口商品，400 万种植者以此为生，中西部卡曼迪纳村的农民科霍恩·约罗西就是其中之一。

当地人把棉花称为“白色黄金”。2009 年前，棉花生产占布基纳法索 GDP 的 40%，占出口收入的近 60%。棉农是该国三大棉花公司——SOFITEX、Faso Coton 和 SOCOMA 的股东。

约罗西在烈日下指导拖拉机司机为遭遇寄生虫侵害的田地喷洒农药。村庄所在地区颇具农业优势，因此被称为国家粮仓。30 岁的约罗西共有耕种土地 30 公顷——2002 年起，其中的一半用于棉花种植。

平均而言，他每年的收入超过 7500 美元。

“有了收入，三年前我就买了一台装配齐全的拖拉机。我已经能够改善我的生活。之前，我们住在老房子里，而现在家人生活舒适，一切都不错，”他说。

但在 2008—2010 年间，约罗西的产量下降了近一半。由于受到价格降低的影响，一些农民（包括约罗西在内）放弃了棉花种植，改种谷类作物，而其他则缩减了种植面积。

自美国孟山都公司 (Monsanto) 进入该国后，另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是转基因或生物技术棉花的普遍转换。经



来自布基纳法索卡曼迪纳的科霍恩·约罗西反对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

过多年的实验，2009年生物技术棉籽在全国范围内播种。这种新的棉花品种对农药的需求量大大减少，给长期饱受寄生虫困扰的棉农们带来了巨大的希望。

“我们只是要求他们信守承诺，使非洲棉花成为数百万贫困人口发展的工具。”

但棉农们发现，转基因作物生产的棉花棉纤维较短、颜色更暗，与国际市场上传统棉花相比，缺乏吸引力，损坏了因质量上乘而久负盛名的布基纳法索(Burkinabè)棉花的声誉。

“说起转基因生物，我们曾经得到空口许诺，但最终结果却更加糟糕。”他解释说。

目前还存在更广泛的问题。布基纳法索对棉花的依赖不断增长，已将经济暴露在外部冲击之下，正如近年来国家所经历的干旱、洪水和国际棉花价格的下降一样。

为了支持棉花产业，政府将种子、化肥和其他投入品的价格控制在25美元/袋，并将一千克籽棉的政府支付价格从34美分提高到40美分。这让约罗西非常高兴。这次提价花费了布基纳法索政府约5300万美元，用于800000公顷的种植面积。

凭借来自政府的支持，约罗西得到了高品质投入品的及时供应和棉花收入的迅速支付，他希望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国家实现生产目标。

但他对全球竞争者持有意见。布基纳法索的棉花出口面临着来自大型生产商的激烈竞争，特别是那些来自提供补贴支持国家的生产商，比如美国。和许多同行一样，约罗西反对这样的补贴，他认为这种补贴破坏了当地生产。

我们已经取得了进展。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非洲“棉花四国”——贝宁、布基纳法索、乍得和马里——获得了协议的支持，该协议将抑制富裕国家出口补贴并为最贫困国家的棉花出口打开市场。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瑞士、美国和欧盟国家已经承诺为非洲棉花行业提供2.95亿美元发展援助——但截至2016年年中，已经支付的金额尚不足一半。

约罗西表示，“我们没有让他们停止帮助他们自己的棉农。我们只是要求他们信守承诺，使非洲棉花成为数百万贫困人口发展的工具。”

报道和摄影：蒂戈·蒂姆托雷(Tiego Tientoré)

良好开端

2001年，当从事酒店服务业的雷恩坦和他的同事们转行开始在刚刚起步的呼叫中心工作时，他没有想到这一行业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这个行业现在已经成为

菲律宾第二大外汇来源和雇佣员工人数最多的行业之一。

谭曾经是马尼拉文华东方酒店集团管理酒店预订业务团队的一员，在他加入呼叫中心eTelecare公司时，只是想尝试做点新鲜的、令人兴奋的工作。

“那时候，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机构，”谭说道。“我一直都喜欢不同寻常的时间工作。我想这个行业的人当时也不知道在哪儿能招聘到员工。酒店行业似乎是最适合我的，因为他们需要能够在晚上工作，并且具备客户服务技能和语言技能的人。”

当时只有24岁的谭坚信自己不但不会损失什么，反而会有所收获。“我想就算我错了，也能快速重新开始，”毕业于马尼拉德拉萨大学的营销管理专业的他这样说道。

结果，加入业务流程外包行业反而是他做过的最好的职业决策。

他继续企业晋升的阶梯上攀爬着，从代理人到组长，之后晋升为康沃吉斯(Convergys)菲律宾公司人力资源部副总裁。康沃吉斯菲律宾公司是菲律宾业务流程外包行业的先锋之一，也是全国最大的私营雇主。

最新的政府数据显示，该行业今年有望实现250亿美元的收益，而2006年该行业的收入仅有32亿美元。2016年，该公司雇佣了大约130万菲律宾人，而在2006年时该公司仅雇佣了240000人。这个不断增长的行业——涉及特定业务流程的业绩，如会计、薪酬支付或电话营销——占该国GDP的约8%；2006年时只占2.6%。

鉴于菲律宾在很多关键指标上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比如，菲律宾有经验丰富的人才库、与美国文化关系密切，是外包工作的最大来源之一，拥有数量庞大的大学毕业生，预计该行业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将进一步增长。

考虑到增长的前景依然看好，政府和行业官员表示，尽管新当选的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最近发表了反对美国的长篇演说，但业务流程外包公司仍然必须为下一波增长做好准备，谭说道。



来自菲律宾马尼拉的雷恩·谭已经找到了他的职业方向。

通过语音服务，如客户支持和产品及服务的销售，菲律宾必须提升价值链，以获取来自印度等其他国家的更大的非语音市场份额和更高附加值服务，包括数据分析和金融服务。

招聘足够的合格人才一直是个难题。除了必须在夜间工作和忍受愤怒客户的来电外，流利的英语及与客户沟通的能力也是基本要求。

在这种从一个中心跳到另一个中心逐渐成为一种规则而非例外的行业中，谭说他经常向他的员工强调他们为经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并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这些现实情况让谭留在了这个职位上。

“客户总是说我们提供的服务水平是他们体验过的最好的，”谭说。“我们诚恳地对待客户，这是我们的民族品牌。”他又补充说，但现在是菲律宾外包行业扩展新的业务领域的时候了，特别是那些员工薪水较高的企业。

谭表示，“在这个游戏中，先入行者往往会分得最大的一杯羹。所以，我们越早接触这个具有更高附加值和复杂化的工作，对我们越好，对国家也越好。”

报道：蒂娜·达姆拉奥（Tina Dumlao）

摄影：由Convergys One提供

钟情于铜业

在位于莫克瓜大区的伊洛市，南方铜业公司铜铸造厂的厂内和厂外，沃尔特·阿斯科纳都是一位导师，他总是鼓励年轻人大胆发表自己的看法。“不要害怕提问，因为不断提问总能学到东西，”他在回顾41年前年轻的自己刚到伊洛的经历时这样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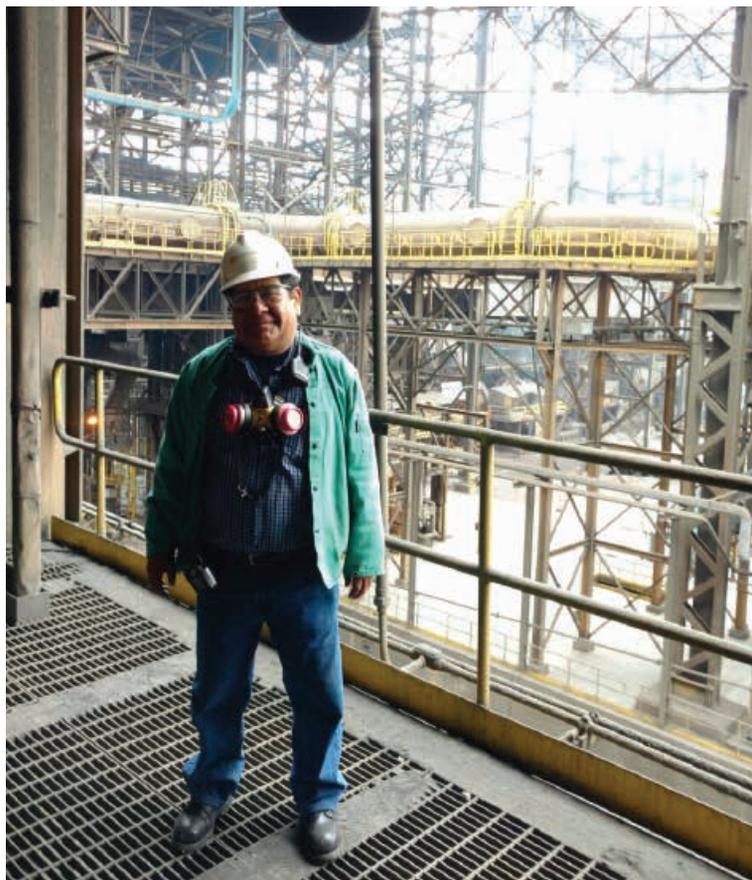
阿斯科纳在塔克纳大学机械工程研究专业读二年级时离开了学校，因为当时他即将成为一名父亲。他开始从事体力工作，然后快速地升职。现年63岁的阿斯科纳担任铸造厂流程团队的主管。

无论在铸造厂内还是厂外，阿斯科纳都是位备受尊敬的人。他曾连任三届帕克查区市长职务，同时下午和晚上从事矿业工作。他还在南方铜业曾担任了15年的工会主席，还是秘鲁普通工人工会的成员。

2010年，占秘鲁全国铜产量60%以上的南方铜业被全球最大的铜矿公司之一墨西哥集团收购。“在这里，我学到了一切：同事之情，朋友之情，如何提问，如何提出要求。我希望能继续在这里工作，因为这是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阿斯科纳说道。“采矿业给我带来了良好的生活。”

南方铜业不仅对阿斯科纳和他的同事们有益，还促进了伊洛、加工设备地点和附近托克帕拉矿产地的基础设施的发展。

和智利一样，由于国际铜价的上涨和铜出口到中国的



来自伊洛的沃尔特阿斯科纳经历了秘鲁对商品依赖的盛衰历程。

热潮，秘鲁迎来了强劲的经济增长。2008年年末到2010年年末，秘鲁证券市场规模增长到原来的三倍，2012年秘鲁成为全球第三大铜生产商。但金属的急速发展过后，亚洲经济崩溃，金属市场随之暴跌，给全球经济制造了混乱。

对秘鲁来说，全球化是必要的，但仍存在风险。

“2007年，工资开始上涨，我们的工人们——劳动者和雇员——的年收入在80000到100000索尔之间。我们从没想赚这么多钱。”阿斯科纳回忆道。“全球化还具有乘数效应，因为出租车司机、企业及其他一切都从中受益。但在经济崩溃时期，一切都衰落了。”

“我们是全球化经济的一部分，”他补充说。“我们经历了每磅铜从不到1美元上升到4美元。我们都从中获得了收益，我们的购买力提升了，能够自由地消费了；公司参与了社会福利工作，并做了相关投资。只是富矿带并不持久，现在每磅铜的价格刚刚超过2美元——我们必须谨慎。公司仍在赚钱，但赚得不多。我们也是。”

全球化是必要的，特别是对于像秘鲁这样的国家。但是全球化也同样存在风险。而阿斯科纳也了解这一点。不过，他认为秘鲁领导人应该致力于发展经济多样化，这样民众未来的生活才不至于过分依赖采矿业。

他主张，“铜价的暴跌突如其来，我们没有准备；我们需要经济替代方案和强大的政治意志。”

阿斯科纳还提醒人们注意另一个关键问题：环境保护。“我认为，秘鲁应该逐渐推动既能提供经济增长又能带来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更稳定的收入，减少对人和环境的有害影响，”他解释说。

阿斯科纳的三个孩子均已成年，他在家中六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在伊洛的大街小巷，人们总是亲切地与他打招呼。他的家人都希望他能退休，但他现在并不想考虑这个问题。无论他被分配到哪个班次，阿斯科纳总是把白色安全帽擦得干干净净，做好上班的准备。他不只是为南部铜业工作，也是为了秘鲁的发展而工作。

报道：阿尔贝托·尼奎恩·格拉（Alberto Niquen Guerra）、
卡拉·查曼（Karla Chaman）
摄影：阿尔贝托·尼奎恩·格拉（Alberto Niquen Guerra）

逃生路线

一条距“环城大道”走路仅有五分钟路程的环形公路将巴黎与居住在法国首都周边的数百万人分隔开来，让这里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奥贝维利埃，当前的失业率已超过 20%，这个拥有 80000 人口的小城曾经隶属于欧洲最大的工业区。许多居民都有外国血统，他们的收入微薄，仅能勉强为持生计。

在过去的 15 年中，奥贝维利埃城和法国政府已经投入数百万欧元进行城市重建。从前的工厂已经被改建成高档写字楼和购物中心。2016 年 9 月，美国运输公司优步（Uber）的服务中心在那里开幕，原因只有一个：大部分司机都住在这附近的塞纳 - 圣但尼省。

虽然优步仍在政府的监督之下，并且遭遇了传统出租车司机的严厉批判，但仍然在巴黎大获成功。2015 年，仅塞纳 - 圣但尼省就有 2700 名司机加入了这家加州新兴企业，而且几乎达到了法国司机总数的 80%。其中，有 40% 是先前的失业人员。

优步中心的成功几乎是立竿见影：入口处每天都排着长队。有些来访者想申请做司机，还有一些来访者需要会计方面的建议及优步选定的合作伙伴提供的其他服务。还有一些人来到这里是为免费蹭课的。

法拉·阿卜杜拉就是其中的一个来访者。他是摩洛哥移民，现年 50 多岁。他曾在纺织印染行业担任生产主管 23 年，收入一直很高。大约两年前，他的雇主 Finishtex 公司破产，阿卜杜拉失业了。现在，优步公司为他提供了一条



来自法国奥贝维利埃的法拉阿卜杜拉（左）和他的司机同事哈卜卜看到了在优步就业的好处。

全新的职业路线。“做独立司机是我转换职业道路的一个好方法。而且这家公司具有国际声誉，所以我看不出有什么坏处。”

对很多法国人来说，“优步化”（ubérisation）是一个恶劣的字眼。它代表着在人人都是独立承包人、在没人享有保障的世界里做着低薪工作。但是，大部分围着优步服务中心打转的人都抱积极的想法。“我想开自己的公司，这一直是我的梦想，”阿卜杜拉说。“我更想成为一名企业家。我会继续在我的专业领域中寻找工作。”

在他做司机的第一天，阿卜杜拉进行了一番权衡。“这份工作和我想象的的不同。在车里坐一整天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表示。“做司机可能是一个临时解决方案，但至少我又有工作了。”

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在巴黎做优步司机还有社会因素。“在加入优步前，我们的许多司机从来没进过巴黎城。现在他们走出了糟糕的社区，和拥有不同背景的巴黎人进行交流。这给他们带来了不同的视角，让他们更有自信：他们意识到自己是有可能离开郊区生活的，”该中心的一位雇员说道。

优步可能是塞纳 - 圣但尼省最大的就业机会创造者之一。虽然政府已经作出了承诺，但却仍未能解决当地的失业问题。“现在，这家私营企业正在做政府该做的事，”阿卜杜拉解释说。

郊区居民喜欢为优步工作还有另一个更加敏感的原因。该地区的邮政编码是 93，而这个数字意味着粗砂石住房、暴力和贫困。“你在这认识的很多人都找了很久的工作。因为当用人企业一看到简历上的‘93’字样，就把我们的简历扔进垃圾桶，即便我们的资质完全合格，”阿卜杜拉生气地说道。“但优步不会这样做。”

报道和摄影：斯特凡·德·弗里斯（Stefan de Vries）

工人不能落在后面

正确的政策意味着国内与国外都有好工作

弗朗西丝·奥格雷迪

最近，英国公投退出欧盟事件被广泛解读为是全球化进程的倒退。虽然旧的政治共识是全球化对所有人都有利，但不可否认，这一共识目前面临着压力，英国退出欧盟事件就是其结果之一。而且，尽管英国退出欧盟公投之前的争议集中在移民问题，公投结果却引发了对全球化两大支柱——商品与资本的跨境流动——的广泛质疑。过去30年来，英国某些地区制造业的就业已经消失，这些地区在投票中以压倒性的优势选择退出欧盟，而除了繁华的伦敦和东南部地区之外，不足1/7的选民选择留在欧盟。

在大西洋的对岸，国际贸易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也成为美国总统大选辩论中的重要内容。因此，尽管有些人仍对反全球化浪潮的兴起感到困惑，但更应该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对全球化的赢家与输家的争论相对较少，以及能否对全球化进行改造，让普通人也能受益。

工会组织在这些争论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工会生来就是国际主义者，有支持公平国际贸易和跨国合作的悠久传统。我们的价值观也让我们基于其对工薪阶层的就业、工资、权益的影响来评估任何思想、政策、趋势的优点。

要评估全球化，首先要对它进行定义。过去30年，全球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全球化贸易量增长显著，其中1988—2008年被视为“全球贸易一体化的全盛时期”，国际贸易由于冷战结束、中国加入全球市场、全球贸易壁垒减少等原因而加速增长（Corlett, 2016）。

但是，在这段时间，不仅跨国商品和服务贸易量增长，



弗朗西丝·奥格雷迪（Frances O'Grady）是英国工会联盟的秘书长。

跨国资本流动也大幅上升。很多国家减少或停止了对资本流入与流出的控制，因为他们相信这会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尽管很多人认为全球贸易量的增长不可避免——至少在中国加入世界市场之后是如此——但却认为跨境资本流动明显是政策选择的结果。

那么，随着跨境商品和资本流动的大幅增长，工薪阶层的处境如何呢？在这段时间，很多较为贫穷的国家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得每天收入低于1.90美元的人口数量在1981—2012年间减少了至少10亿。正如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

（Branko Milanović）所指出的，很多较为贫穷国家的人口的收入都大幅增长。

可喜可贺的是绝对贫困已大为减少，但作为工会组织，我们还追求更大的公平。而在公平方面，尽管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情况已有所缓解，但全球各国的国内收入不平等却在加剧。

例如，尽管英国目前的就业率创历史新高，但受制造业就业减少的影响，很多社区经济不景气、就业前景渺茫，高失业率还是留下很深的伤痕，其中1980—1988年之间平均失业率高达11%。1980年，英国就业人口中，制造业占了1/4，而今天却不足1/10（ONS, 2016）。

当前，很多制造业工人仍然面临着全球竞争的压力，其中包括英国钢铁行业。尽管对中国开放市场降低了英国消费品价格，但在那些与中国有竞争关系的行业工作的工人则要遭受长期失业和低工资的影响，其中工资最低的工



人受到的影响最大 (Pessoa, 2016)。

因为从高技能、高工资岗位(包括制造业岗位)转移至低工资的服务行业,英国工薪阶层的工资一直增长乏力。但在最近几年,主要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除了希腊之外,英国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平均工资降幅最大的国家。在《金融与发展》2016年6月号刊登的“新自由主义:被高估了吗?”一文中指出,认为金融开放会促使经济更加稳健增长的观点似乎是言过其实,因为资本项目自由化会加剧经济波动与收入不平等。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私人债务不可持续地增长,英国、爱尔兰、西班牙等国也是如此,而全球金融体系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一旦危机爆发,很快便会传遍全球。

但是,因此就认为过去30年间工人就业情况恶化与工资降低全是全球化惹的祸,这会让一些国家的政府逃脱责任。国内政治家通常给公众一种印象,即以为他们对全球趋势无能为力。但是,他们的政策选择其实对工薪阶层的就业和工资前景产生了重大影响。

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收入不平等情况迅速恶化(见图),高层收入急剧增长,中层收入增长缓慢,而底层收入没有增长。虽然贸易与金融全球化是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之一,但主要原因在于当时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税收和福利新政策。虽然21世纪头十年的收入再分配政策防止了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但并不能缩小收入差距。

其中,对工会组织影响最大的是集体谈判权遭到打击,逐步削弱了工会对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制衡作用。在集体谈判协议覆盖面广的国家,其工资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无论是高技能与低技能工人之间、男女之间,还是正式工与临时工之间收入差距都较小(ILO, 2016)。

因此,作为工会组织,在全球化争论中,我们的首要作用是要提醒自己的政府:政府是有能力改善工人生活的。政府应该鼓励能扩大高技能就业(目前已经消失)的投资,促进并鼓励工会继续发挥维护工人权益和工资方面的关键

作用。由于全球工资趋同,工会也因此有机会开展跨国合作,确保经济收益能更公平地分享,对任何对待工人不公平的现象发挥其影响力。

尽管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已有所缓解,但全球各国的国内收入不平等却在加剧。

在国际层面,我们需要基于对工薪阶层的就业、权益、生活水平的影响对任何提议——无论是提高贸易开放水平,还是加强税收合作——进行判断。英国工会联盟坚决反对《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因为该协定会以下方面产生负面影响:国际贸易增长收益的平等分配,公共服务领域(很多工薪阶层在此领域就业),以及民选政府对消费者、环境和劳动保护进行管理和规范的政策空间。但是,我们仍然坚持认为应在社会层面和市场准入方面对欧盟单一市场保持开放,一旦英国退出欧盟,这就是让英国人保留住好工作的最佳办法。

我们也坚持认为,一旦延伸到国际层面,事情就会不同。广受欢迎的对资本项目自由化和财政整顿的重新审视已经让以下问题成为关注焦点,即国际金融如何能够更好地支持生产型经济,以及新型国际化的可行性,这种新型国际化允许政府发展国内的生产型经济。二战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改革就是在追求这一目标,当时工薪阶层生活水平大幅上升。历史上,工会组织在达成布雷顿森林体系共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们的目标是在创造有利于工薪阶层的全球化进程中再一次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Corlett, Adam, 2016, "Examining an Elephant" (London: Resolution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ILO), 2016, "If You Want to Tackle Inequality, Shore Up Collective Bargaining," blog, March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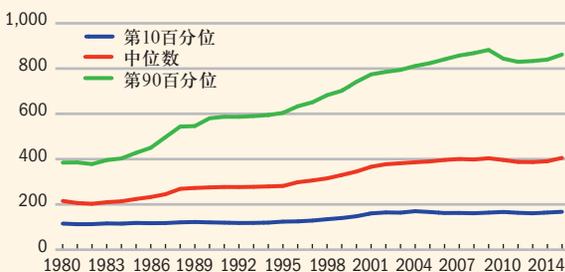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Labour Market Statistics, September 2016.

Pessoa, João Paulo, 2016,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Labor Market Adjustment," Centre for Economic EP Discussion Paper 1411 (London).

富人增长更多

英国最富裕10%家庭的收入迅速增长,而最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却几乎没有增长。

(英国实际家庭周收入,英镑,按2013/2014年价格计)



资料来源:英国IFS收入数据,可从以下网址获得: https://www.ifs.org.uk/tools_and_resources/incomes_in_uk

注:家庭花费按无子女夫妇花费计,即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修改后的同等标准计算。

移民带来的 好处多多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西
霍斯顿市中心，儿童保育
助理正在与孩子们玩耍。

弗洛朗斯·若默特、克谢尼娅·科洛斯科娃、斯韦塔·萨克塞纳

高技能和低技能移民都能提高发达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并能带来很多好处

关于移民的传说：公元8世纪左右，在被阿拉伯征服后，帕尔西人逃离伊朗，前往印度寻找避难所。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当地统治者拿出一只装满牛奶的杯子，表示当地人已经够多了，无法再容纳更多的人。作为回应，帕尔西人首领将一汤匙糖倒入那杯牛奶，表示他们可以为当地社会创造财富，而不是取而代之，就像糖能溶进牛奶一样，他们也能融入当地社会，让当地人的生活更加甜蜜，而不惹事生非(NPR)。

如今移民的现实：移民已成为全球热点问题，至少最近的难民潮引起了大家对移民的关注。尽管报纸上充斥着大量难民逃离家园的照片，但很多移民已在发达经济体安家落户，而且其数量持续增长(见图1)。从图中可以看出，在一些发达经济体，成年移民占了适龄工作人口的15%—20%，而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一些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这一比例甚至高达25%以上。1990—2015年成年移民占到这些发达经济体适龄工作人口增长量的一半；据联合国的预计，未来十年，对于这些发达经济体中的大多数而言，如果没有更多的

移民，老龄化会进一步降低其工作人口的比例。

但是，这么多世纪过去了，问题依然相同：移民到底是造福于当地，还是带来了麻烦？

成本与收益

发达经济体的民众对移民的反感情绪比对贸易的更大，这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因为他们往往认为移民是个零和博弈：他们害怕因此失去工作或减少薪水。但是，多数研究发现，移民对当地人的平均工资或就业的影响非常有限(有关调查，见Peri, 2014)。不过，有些研究发现，低技能工人工资的确受到移民的影响(例如，Borjas, 2003; Card, 2001)。第二，由于移民难以融入当地社会，当地人因此害怕失去文化认同。调查显示，在欧洲，人们觉得人的因素要比经济因素更重要，前者包括移民的组合效应(如语言和文化)等因素，后者包括工作机会等因素(Card, Dustmann 和 Preston, 2012)。语言和文化



方面的障碍、得不到承认的外国学历与工作经验——以及有时会遇到隐性歧视——都可能阻碍移民融入当地社会。所以，不可否认在短期内移民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但是，一项新的研究发现，移民可以提高当地的人均收入，从而提高其生活水平，因此给接受国带来可观的长期利益。所以，付出短期代价，帮助移民融入当地就业市场和社会，是十分值得做的事。

赞同移民的标准说法是，移民提高了适龄工作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因为移民一般比当地人更年轻，尤其是在人口老龄化的国家。因此，移民可以创造出更多收入，让全体成员分享，包括通过税收和再分配政策。这是移民产生影响的第一条途径，通过它移民可以提高当地的人均收入，但这还不是最有效的途径。

第二条途径在于移民对当地的人均产出的影响，人均产出就是劳动生产率，移民以多种方式对它产生了影响。

- 首先，移民可能降低劳动生产率，至少刚开始是如此，因为新劳动者的加入会降低人均有形资本。但是，有证据表明，一直以来，存量资本总是通过增加投资而与劳动力同步扩大。

- 其次，有一种观点认为，移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低于当地人，从而降低了劳动生产率。但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移民具有中高级技能，在许多国家，移民的高技能人才比例甚至于超过了当地人的高技能人才比例。

- 最后，研究表明，通过很多方法，高技能移民和低技能移民都对总体劳动生产率产生积极作用。例如，高技能移民提高了创新能力，因而促进了当地高技能人才的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低技能移民也能提高经济的总体效率。因为他们可以参与到一些在当地紧缺劳动力的工作中，如农业和护理等（技能互补性）。而且，他们的存在还可以促进当地人进修升造，以便能承担更高技能的工作（技能升级），特别是那些需要语言和沟通技能的工作，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有比较优势（例如，D' Amuri 和 Peri, 2014）。互补性的最好例证就是“保姆”效应：由于低技

能移民提供了更多的家政和托儿服务，当地妇女，尤其是高技能妇女，因此能够更多地外出工作（例如，Cortés 和 Tessada, 2011）。

但问题是，这些效应的强度是否足够大，是否能对接受国的总体劳动生产率产生明显的影响。两项大范围的跨国研究发现，移民对接受国的人均收入和生产率都有很大的影响（Ortega 和 Peri, 2014；Alesina、Harnoss 和 Rapoport, 2016）。我们也研究了这一问题，但只专注于发达经济体，因为发达经济体的移民占当地人口比例比较大，而且其移民问题也引起了争议。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接受移民的发达经济体存在一些重要的长期移民效应：

- 首先，从长期看，移民主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显著地提高了接受国的人均收入水平。
- 其次，除了高技能移民的劳动生产率带来效益外，低技能移民也能带来类似的效益，虽然方式不同。
- 最后，移民产生的效益是由全体民众广泛分享的。

新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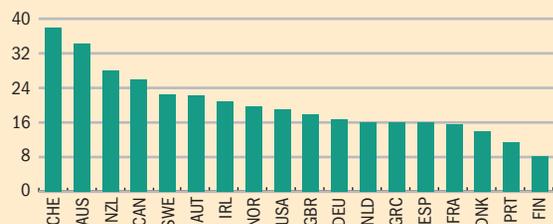
为开展上述研究，我们运用了新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按来源与教育程度，以五年为间隔，追踪统计了 18 个发达经济体在 1980 年到 2010 年的移民数量。我们运用经济计量方法，通过控制接受国收入水平的其他决定因素，研究了移民数量（总体及按教育程度划分）对人均 GDP 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上述其他决定因素包括科技水平、教育水平、人口年龄结构、贸易开放程度、国家与时间的固定效应（即特定国家在特定时间人均收入决定因素的代理变量）等。

但是，研究宏观层面的移民效应面临挑战。因为很难将移民对人均收入的直接影响与可能存在的人均收入对移民的反向影响区分开来。例如，发达经济体的高收入对移民产生吸引力，或者高收入国家可能对移民控制得更紧。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仅基于独立于接受国的收入水平的决定因素来构造移民代理变量（计量经济学术语为“工具变量”）。上述决定因素包括移民来源国的“推动”因素（例如，经济和政治环境不佳）和移民成本。其中，移民成本由来源国和接受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决定。

运用上述方法，研究发现，移民的确提高了发达经济体的人均收入，主要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的。尽管程度比之前估计的要低，但这种效应仍会对接受国的经济产生显著影响：从长期来看，移民占成年人口的比例每提高 1%，就能够使人均 GDP 提高 2%。而且，高技能移民和低技能移民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高技能移民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才能和专长，而低技能移民的贡献可能在于提高了与当地人的技能的互补性。例如，我们发现，当更多的低技能移民进入某个国家时，当地妇女的就业会增加，可能是因为她能够获得更多的家政和托儿服务。

图1
巨大的份额

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移民占人口的比例很大。
(占25—64岁的适龄工作人口的百分比，2015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全球移民数据库；以及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国家代码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的代码。

但是，仍然有必要对上述研究结果保持清醒的认识。一方面，由于以上估算结果是各国的平均值，因此，对于某个特定国家而言，结果可能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移民种类（经济移民或难民）、劳动力市场的组织、移民与当地入之间的互补性等。另一方面，从短期来看，上述移民效应可能是负面的或者影响很小，因为经济与存量资本都要根据就业的移民数量进行调整。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这些移民效益如何在所有民众中分配，尽管这个问题超出了移民对当地人均收入影响的范围。但是，如果所有收益都由资本所有者和公司高级经理占有，那么广大普通老百姓可能无法获益，而且可能受到实际损害。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分析表明，虽然某些行业的人员可能在开始时遭受损失，但移民效益还是广泛地由全体民众分享的（见图2）。从图中可以看出，对于占工薪阶层90%的中低收入者和占10%的高收入者而言，移民都提高了他们的人均收入，尽管高技能移民对高收入者的贡献更大，这可能是因为高技能移民与当地高技能人才之间产生了很强的协同效应。而且，没有证据表明移民会加剧占工薪阶层90%的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不平等。

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虽然接受移民在开始时要付出代价：因为移民融入当地社会可能非常缓慢，而且某些当地人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移民能带来长期的总体经济效益，并且这些效益是广泛分享的。管理好这些效益的关键是要确保当地劳动力市场充分接纳移民（Aiyar 等人，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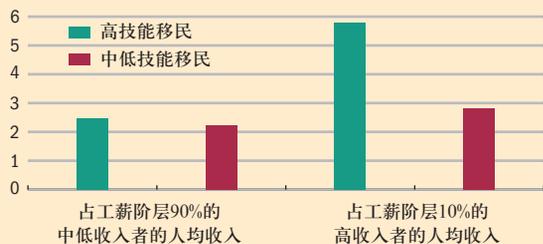
另外，政府还可以采取很多政策来帮助移民，包括语言培训和求职支持、承认移民的学历和工作经验、为移民创业提供便利等。同时，政府也需要采取缓解政策来帮助当地人进行调整。缓解政策包括，如帮助当地人提高其技能，或者减少他们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方面可能遇到的

图2

有用之手

移民提高了接受国的人均收入，无论是对占工薪阶层10%高收入者，还是对占工薪阶层90%的中低收入者。

（移民比例每提高1%引起的人均收入的变化百分比）



资料来源：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样本包括18个发达经济体在1980—2010年间的数据。

障碍。

移民主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显著地提高了接受国的人均收入水平。

日本就是移民效益的很好例证。由于语言和文化障碍，日本一直都是典型的低移民国家。然而，由于适龄工作人口不断下降，导致劳动力短缺，最近日本开始增加临时移民数量，并由企业对移民进行培训。

总而言之，移民的现实经济效益可能会胜过其文化阻力，从而带来很多好处，就像加了糖的牛奶会变甜。■

弗洛朗斯·若默特（Florence Jaumotte）和斯韦塔·萨克塞纳（Sweta Saxena）是IMF研究部的高级经济学家，克谢尼娅·科洛斯科娃（Ksenia Koloskova）是该部经济学家。

本文基于作者所著的2016年IMF Spillover Note “Impact of Migration on Income Levels in Advanced Economies”。

参考文献：

- Aiyar, Shekhar, Bergljot Barkbu, Nicoletta Batini, Helge Berger, Enrica Detragiache, Allan Dizioli, Christian Ebeke, Huidan Lin, Linda Kaltani, Sebastian Sosa, Antonio Spilimbergo, and Petia Topalova, 2016, The Refugee Surge in Europe: Economic Challenges,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6/02*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Alesina, Alberto, Johann Harnoss, and Hillel Rapoport, 2016, “Birthplace Diversity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21, No. 2, pp. 101–38.
- Borjas, George J., 2003, “The Labor Demand Curve Is Downward Sloping: Reexamining the Impact of Immigration on the Labor Marke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8, No. 4, pp. 1335–74.
- Card, David, 2001, “Immigrant Inflows, Native Outflows, and the Local Market Impacts of Higher Immigration,”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Vol. 19, No. 1, pp. 22–64.
- , Christian Dustmann, and Ian Preston, 2012, “Immigration, Wages, and Compositional Amenitie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10, No. 1, pp. 78–119.
- Cortés, Patricia, and José Tessada, 2011, “Low-Skilled Immigration and the Labor Supply of Highly Skilled Wome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Vol. 3, No. 3, pp. 88–123.
- D’Amuri, Francesco, and Giovanni Peri, 2014, “Immigration, Jobs, and Employment Protection: Evidence from Europe before and during the Great Recession,”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12, No. 2, pp. 432–64.
- Ortega, Francesc, and Giovanni Peri, 2014, “Openness and Income: The Role of Trade and Migr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92, No. 2, pp. 231–51.
- Peri, Giovanni, 2014, “Do Immigrant Workers Depress the Wages of Native Workers?” *IZA World of Labor*, 2014:42.



积极面和消极面

美国的政策应承担起全球化的责任，将贸易的输家转变为净赢家

艾伦·S·布林德

对待全球化，你是持支持态度还是反对态度？这确实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就像问你对每天的日出是持支持意见还是反对意见一样。总之，无论如何太阳都是会升起的。而你需要作出的选择是，尽量利用日出，享受阳光和绿茵，还是强调其消极的一面，比如说晒伤斑和毒葛。或者，你可以制造属于你自己的幻象，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遮严窗帘，就假装太阳根本没有升起。

有些人似乎看好最后一个选择。不过，民族国家没有这项选择。自从大萧条和二战曾暂时性但又无反顾地逆转全球化这一潮流之后，历史力量和技术力量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一直在推进着全球化。而且这些力量还会持续下去，这意味着各个国家必须决定如何实现全球化积极面的最大化，同时将其消极的一面最小化，因为这两面同时存在着。

当然，这也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自从19世纪早期的大卫·李嘉图开始，经济学家们就已经懂得，作为全球化典范的国际贸易既会产生赢家也会产生输家。那些国际贸易中的输家一直在抗击全球化，甚至在“全球化”这一概念尚未得名时就开始了。他们目前依然在抗击全球化，但是这样做早已不合时宜，因为经济学家们已经不太在意他们的抱怨，正如我们钟爱贸易为我们所带来的收益一样。他们可能是特别的申诉人，而丧失工作机会则是他们所着力申诉的内容。他们可能希望暗中布局，让自己方得利，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技术和贸易可能就会对他们产生不利影响。

现在，世界日益被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凭借才能、秉性或者可能单纯靠运气就获得了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而另一阵营则被抛在后面，什么也没有。弥合，或者更精确地说，缩小这一差距可能是我们当今所面临的经济问题。

经济学家们强调说，贸易是一种正和博弈：赢家的收益超过输家的损失。这就是我们都支持贸易进一步自由化的基本原因。国家（实际上是所有国家）所获得的净收益，使从赢家到输家的补偿转移成为可能。从算术上看，这样做是可能的，在原则上，让所有人都成为净赢家。但在实践中，这样的事情并不会发生。转移以及其他缓冲措施的力度很少能够将贸易的输家变为净赢家，即便是在社会保障优越的西欧国家也是如此。美国几乎从来都不这样做。

而且，补偿不足会产生两大主要后果。首先，贸易开放可能会加剧收入不平等。那些具有高技能和高收入的工

作者比低技能工作者更加支持自由贸易。这并非偶然：那些条件优越的人从全球化中的获益程度要高于条件较差的人。其次，贸易协定中的输家经常反对贸易协定，因为他们预计不会从中获益。

因此，在为贸易的输家提供更多帮助方面，就存在公平做法（不平等程度较低）和政治经济做法（更重视贸易）这两种做法。怎样实现呢？具体的答案因国家而异。那些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比如，通过更为牢靠的社会保障体系、活跃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广泛且有效的工作再培训计划以及高压力的劳动力市场等——来帮助其劳动者应对经济变革的国家，可能并不需要专门为帮助贸易受害者而制定计划。不过其他国家可能需要。

国家所获得的净收益，使从赢家到输家的补偿转移成为可能。

美国恰恰是属于后一种类型。贸易调整援助计划（TAA）于1962年推出，其目的是为那些由于国际贸易而失去工作的人提供专门的安全保障。但是，只有非常少的失业工人从中受益。同时，该计划也旨在帮助劳动者重返工作岗位，如通过在再培训和向其他地方迁移方面提供帮助。不过TAA在援助和调整之间似乎更倾向于援助。而其他想法，如工资保险等，已经讨论了数十年之久，但依然尚未被采纳。

美国近期在总统选举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全球化的强烈反对不但是一个重要迹象，也非常具有反讽意义。说其重要，是因为美国在几乎所有方面都依然保持着全球领导者的地位。如果美国不承担责任，谁会去承担呢？其反讽意义在于，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似乎特别容易获得巨额收益。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提供全球的储备货币呢？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比肩美国的市场灵活性、国内竞争力、经济创造性、创业热情以及勤勤恳恳对普通岗位的敬业态度？

从上述特征以及其他特征，基本上就可以确定美国是全球化的赢家。为了缓冲对输家的打击所制定的更好的机制，可以帮助整个国家获得这些收益。■

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及公共事务教授，也是布鲁斯金学会的客座研究员。

无论富裕与贫穷

国际贸易可能加剧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

尼娜·帕夫克尼克

过去30年来，发展中国家更多地融入了世界市场。由于贸易壁垒减少，加上通讯与交通更加便利，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可以在海外建立并管理生产基地，雇用发展中国家相对廉价的劳动力。

由于导致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加剧，以及制造业就业萎缩，上述这一变化经常遭到指责，并演变为当前对国际贸易的反对浪潮。

然而，过去30年来，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在上升，尤其是在亚洲。例如，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巴西、中国、印度、越南等新兴市场经济体80%到96%的受访者认为收入不平等是其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但在这些国家中，仅有1%到13%的受访者认为国际贸易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这一调查结果与戈尔德贝格和帕夫克尼克 (Goldberg 和 Pavcnik, 2007) 在其学术文献中提到的证据相吻合。该文献发现，国际贸易是造成发展中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不断上升的原因之一，但并不是主要原因。

国际贸易对国内不平等的影响是复杂的，因为国际贸易影响居民工资与消费的方式多种多样，并且其影响随着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变化。贸易一体化的程度；劳动力和资本跨越企业、行业、国境流动的难易程度；以及受影响者在其国内收入分布中所处的位置等都是影响因素。因此，本文根据对几个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不平等效应的近期研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工资不平等

如果国家能够实现专业化生产，而且国际贸易使得工人从进口竞争行业向出口导向行业转移，那么通常可以从国际贸易中获益。这导致进口竞争行业工人的工资下降，但同时提高了出口导向行业工人的工资，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

国际贸易的工资不平等效应还体现在其他方面。

国际贸易可能提高行业中不同企业的同等水平员工的工资差距。企业的绩效各不相同，经营良好的企业更可能从事出口业务。近期对阿根廷和墨西哥的两项研究发现，成功的企业能从新的出口机会中受益，其员工也

因而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 (Verhoogen, 2008 ; Brambilla, Lederman 和 Porto, 2012)。

发展中国家还不具备处理不断恶化的收入与机会不平等的良好条件。

此外，在向高收入国家出口的公司中，相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员工来说，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员工还能获得额外的收益。原因何在？因为高收入国家的消费者通常比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要求更高。而优质产品的生产与营销需要素质更高、工作更努力的员工，因此同一企业的高、低技能员工之间的工资差距被拉大。

更重要的是，几项研究发现，国际贸易还会影响整个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不平等。

越南就是很好的例证。2001年，越南与美国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美国对越南出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平均降低了23个百分点。但各行业关税下降的幅度并不相同。由于越南各省有自己擅长的行业，其中某些省份的就业集中在受益于关税降低的行业，而另外一些则很少有人从事这些行业。因此，出口成本降低对各省工人的影响则不尽相同。

还有一项研究发现，某些行业由于出口成本的降幅更大，使其所在省份受益更多，从而使这些省份的贫困水平下降的幅度也更大 (McCaig, 2011)。贫困水平的降低是由于产品出口至美国市场使得对当地工人的需求迅速增长，从而提高了其工资水平，特别是那些只受过初等教育工人的工资水平。而这些省份本来就比较富裕，因此，随着国际贸易的增长，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进一步扩大。

对越南的研究表明，国际贸易扩大了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另外几项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由于各地区生产的产品不同，一些地区比另一些地区更易受到国际贸易的影响。

由于工人和资本不能自由流动，加上地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机制不完善，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可能会长期存在，



越南胡志明市的服装工人。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因此，国际贸易对工人的影响差异的大小取决于其对当地经济的影响。

印度的例子

我们再来看看印度的经历。1991年刚开始施行贸易自由化时，印度的贫困人口占全球贫困人口 $\frac{1}{3}$ 。通过改革，减少了对国际贸易的大量限制，平均进口关税从1991年的87%下降到1996年的37%。佩蒂亚·托帕洛娃(Petia Topalova, 2010)研究了印度某些地区受进口关税下降的影响，这些地区因进口关税的降低而增加了其海外竞争压力。

研究发现，在这段时间，印度全国总体贫困水平下降。但是，研究也发现，印度某些农村地区受进口竞争的冲击较大，其贫困水平降幅也因而较小。由于进口关税降低导致当地劳动力需求减少，工业和农业工资水平因而降低，对贫困家庭的伤害特别严重，因此导致相对贫困加剧。其中，处于收入分布百分位底部第10位和第20位的家庭，其人均消费水平下降幅度最大。

一般来说，由于劳动力可以从受进口竞争冲击的地区流动到更高工资的地区，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区间的工资差距可能会消失。但是，印度不是这样。劳动力流动并没有因某些地区受到贸易改革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实际上，贸易改革之后十年间，印度只有不到0.5%的农

村居民和4%的城市居民由于经济原因流动到其他地区。其中，文盲和贫困家庭的地域流动比率尤其低。

那么，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员流动呢？

因为人员流动成本很高，而且也不可能借到钱搬家。在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家庭和种姓等级制度和机制是非正式的社会保险，这更进一步阻碍了人员的流动。有时人员不流动仅仅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别处有更好的就业机会。此外，由于受进口竞争影响，这些劳动力的技能和经验并不符合其他地区扩张行业的需要。

结果表明，进口竞争对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恶化。20世纪90年代初，巴西降低了进口税，最近的一项研究考察了此后20年巴西劳动力调整情况(Dix-Carneiro和Kovak, 2015)。与印度相同，巴西的改革也导致某些地区进口竞争压力加大，降低了其劳动力工资水平。但是，与印度不同的是，巴西各地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因此有所降低，因为受进口竞争影响的地区本来就比较富裕。

令人惊奇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贸易对地区工资的负面影响反而会越来越大，原因何在呢？

在资产贬值之后，为应对进口竞争的压力，企业主缩小经营规模，甚至关闭当地工厂，造成劳动力需求慢慢减少，因此当地工资水平越来越低。而服务需求也随之减少，更是让当地劳动力市场雪上加霜。与印度类似，劳动力也没有迁移出受进口竞争冲击的地区，其中很多人最终在非正

式行业寻找工作。

上述例子表明，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是引发国际贸易不平等效应的原因之一。因此，有必要对此开展进一步研究，更深入地探究劳动力流动的关键障碍，包括企业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流动的障碍，因为这些障碍阻止了受进口竞争冲击的劳动力在扩张行业再就业。

消费：穷人和富人

由于能够买到更多物美价廉的进口商品，发展中国家消费者因融入全球市场而受益。而且，他们也因此能够买到外国企业生产的商品，包括药品和手机。其中，有些好处体现在消费之外。例如，肯尼亚的农户不仅使用手机与朋友联系，还能使用手机银行，获悉国际市场上经济作物的价格等信息。

同时，国际贸易带来的消费收益也是不平等的，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差距相当大。穷人通常在食品、衣服等贸易品上的花费比在住房、教育等非贸易品上的花费更多。最近一项研究考察了包括12个发展中国家在内的40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国际贸易一体化给穷人带来的消费收益更大，因为贸易品的国际价格平均降幅比非贸易品更大，而富人消费了更多的非贸易品(Fajgelbaum和Khandelwal, 2016)。

但是，还存在其他影响因素。

国际贸易对消费的影响可能取决于贸易自由化的类型和不同收入阶层家庭的购物模式。例如，墨西哥和阿根廷等中等收入和转型经济体最近开放其零售行业，允许国外零售连锁店进入本国市场，而此类政策在印度就遭到了强烈反对。墨西哥的经验表明，尽管穷人能从外资零售连锁店受益，但其受益程度比富人的小。

一项即将发表的研究发现，墨西哥各收入阶层消费者都能因外资零售连锁店的进入而受益，因为这些连锁店商品价格更低、商品品种更多、购物设施（如选址与停车场）更好(Atkin、Faber和Gonzalez-Navarro)。但是，在墨西哥收入分布中，顶部20%家庭的消费收益比底部20%家庭的消费收益更大，因为富裕家庭更有可能在外资连锁店购物。

另外，虽然国际贸易降低了边境地区商品价格，但并不表示偏远地区市场价格也能随之降低。因为国内基础设施条件较差，以及发展中国家国内批发和零售行业竞争强度很小，所以国际贸易带来的消费收益在国内的分配并不平等。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利亚的偏远地区的消费者并不能因进口商品而受益，因为其国内的交通成本和垄断中间商瓜分了潜在的消费者收益(Atkin和Donaldson, 2015)。

总之，尽管消费者能够因国际贸易而受益，但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消费收益分配并不平等。由于发展中国家的

穷人在贸易品上花费了大部分收入，因此上述不平等不容忽视。

确保机会均等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民意调查，巴西、中国、印度、越南等国民众致力于实现更自由化的国际贸易。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忽视国际贸易的各种不平等效应和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无论这是否是由国际贸易引起的。当前，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出现的反对国际贸易的浪潮就具有警示性。同时，发展中国家还不具备处理不断恶化的收入与机会不平等的良好条件。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入较低，社会保障机制不够健全，民众获得公共产品的机会并不平等。其中，有限的受教育机会尤其令人担忧。而在今天全球经济时代，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才供不应求，并且这些人对劳动力市场的负面冲击也有更强的适应能力。

因此，政策争论应该聚焦于充分发挥国内体制的作用，确保机会均等，特别是要提高教育水平和促进地域流动，以让目前落后的群体能够分享到更多的国际贸易收益。■

尼娜·帕夫克尼克(Nina Pavcnik)是达特茅斯学院尼豪斯家族国际关系学教授和经济学教授。

参考文献：

- Atkin, David, and Dave Donaldson, 2015, "Who's Getting Globalized? The Size and Implications of Intranational Trade Costs," NBER Working Paper 21439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Atkin, David, Ben Faber, and Marco Gonzalez-Navarro, forthcoming, "Retail Globalization and Household Welfare: Evidence from Mexico,"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Brambilla, Irene, Daniel Lederman, and Guido Porto, 2012, "Exports, Export Destinations, and Skill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2, No. 7, pp. 3406-38.
- Dix-Carneiro, Rafael, and Brian Kovak, 2015,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Regional Dynamics," unpublished (D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 Fajgelbaum, Pablo, and Amit Khandelwal, 2016, "Measuring the Unequal Gains from Trad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31, No. 3, pp. 1113-80.
- Goldberg, Pinelopi, and Nina Pavcnik, 2007,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5, No. 1, pp. 39-82.
- McCaig, Brian, 2011, "Exporting out of Poverty: Provincial Poverty in Vietnam and U.S. Market Acces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85, No. 1, pp. 102-13.
- Topalova, Petia, 2010, "Factor Immobility and Regional Impact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Evidence on Poverty from India,"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Vol. 2, No. 4, pp. 1-41.
- Verhoogen, Eric, 2008, "Trade, Quality Upgrading, and Wage Inequality in the Mexican Manufacturing Sector,"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3, No. 2, pp. 489-530.



祖鲁寿司以及其他希望

全球化带给非洲的好处微乎其微

库米·奈杜

作为一个非洲人，我无法反对全球化，因为全球化为我们带来了寿司。南非将寿司与本国钟爱的生牛排结合在一起，推出了新品，并将其骄傲地冠以“祖鲁寿司”的名号。从理念上讲，我们希望非洲实现全球化：在经济、技术，甚至烹调方面实现整合，并应用到全球各地。这可能意味着为提高全人类的福祉而共同承担责任。

不过，我们在非洲所看到的全球化情景却并非如此。在非洲，全球化使少数人受益，却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在当前的非洲，国外利益正在侵蚀着国内的统治。

不平等的规则

起初，年轻的非洲国家寄希望于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希望它能够提供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机会。然而，经济精英支持那些有利于发达经济体的规则，并向非洲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施压，使其服从这些规则 (Kumar, 2002)。由最富裕国家倡导的双边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协议强化了其主导地位，并形成了一个不平等的谈判环境。

规则的实施对我们不利，从来都是如此。

30 年之后的今天，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依然尚未变得更具包容性，以及支持可持续增长。去年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就体现了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失衡 (Keating, 2015)。大多数规则制定者均为工业化国家，他们所制定的政策都是为工业化国家提供有利条件，这使得他们能够发展壮大成为今天的巨人。不过，这些经济体需要持续的资源输送——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如中国——它们目前在寻求获得非洲的资源 and 市场。

对非洲的资源需求推动了非洲大陆的经济增长：在过去的 10 年间，非洲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 5%。不过，这也刺激了国外政府和跨国公司的不正当金融资本外流——在 1970 年至 2008 年期间，非法金融资本外流金额达 8500 亿美元 (UNECA, 2015)。

这种增长虽然受人欢迎，但其背后的政策却加深了不平等和贫困。在过去十年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总产出增加，各国的不平等程度也提高了 (Ortiz 和 Cummins, 2011)。全球市场上工人们为获得工作机会而竞争，这造成了工资下降，而各个国家之间的竞争可能意味着社会支出缩减和累进税率的实施。



尽管官方的全球贫困数据显示在过去的 50 年间贫困情况有所改善，但非洲目前依然有 48.5% 的人口生活在每天 1.25 美元的贫困线以下。半个非洲大陆、5 亿非洲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2/3 人口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 4 美元，90% 人口的生活水平低于中产阶层——即每天生活费用在 10 美元至 20 美元之间。

收入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非洲人的生活水平如此之低的唯一原因是，至少有 2/3 的非洲人仅依赖农业谋生，而没有其他改变命运的方法。而危险就在门外。从全球范围来看，超过 1.15 亿英亩的农田被外国人收购，而这些农田大部分位于非洲 (Kachika, 2011)。如此大规模的土地攫取已经造成数百万人口无家可归或者在其自己的土地上受到奴役，这对最贫困的非洲人的食品安全和生计造成了威胁。

数以十亿计的输家

所以，我们的全球化造就了极少数的赢家，而输家则多达数十亿。全球化中充斥着各种不公平的合作伙伴、不平等、受到抑制的发展以及持续的剥削和排斥。规则的实施对我们不利，从来都是如此。但是，非洲各国的政府没有质疑这一体系的勇气，因为担心会使其经济体的财务状况受到损害。

非洲人必须奋起并夺回属于我们的东西——要求我们的政府首先对我们负责，揭露腐败、消除贫困、减少不平等，并同时抗击气候变化，为我们美丽、富饶和宽容的非洲大陆带来荣光。■

库米·奈杜 (Kumi Naidoo) 是“非洲崛起”的启动负责人，曾担任绿色和平组织总干事和全球公民社会组织 (CIVICUS) 秘书长。

参考文献：

Kachika, Tinyade, 2011, *Land Grabbing in Africa: A Review of the Impacts and Possible Policy Responses* (London: Oxfam International).

Keating, William E., 2015, "The Doha Round and Globalization: A Failure of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CUNY Academic Works).

Kumar, Pranav, 2002, "Impact of the Uruguay Round on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in *The Reality of Trade: The WTO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Ottawa: North South Institute).

Ortiz, Isabel, and Matthew Cummins, 2011, *Global Inequality: Beyond the Bottom Billion—A Rapid Review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141 Countries* (New York: UNICEF).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UNECA), 2015, "Illicit Financial Flows: Report of the High level Panel on Illicit Financial Outflows from Africa" (Addis Ababa).

粮食的进化

提高农业效率和生产率对未来粮食安全而言至关重要

全世界超过7.5亿农业劳动者生产的粮食养活着全球74亿人口。

虽然全球生产的粮食可以养活所有人，但在很多地方，粮食安全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由于生产的粮食基本都是在各国国内被消费掉的，因此市场和分配受各国不同因素的影响，诸如天气情况、落后的基础设施以及贫困。粮食在全球总贸易中的占比很小，但是长期以来粮食主权和保护本国农民的问题是贸易磋商中的关键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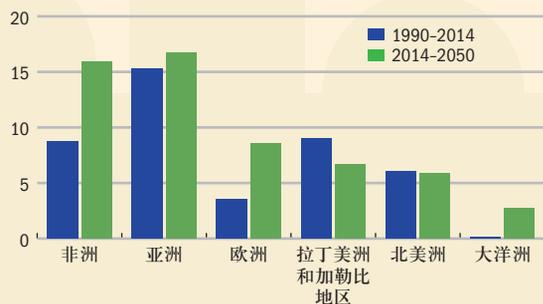
在很多国家，人口的迅速增长，尤其是城市人口的增长，已超过其国内粮食产量的增长，导致其越来越依赖于

粮食进口。自1990年以来，27个国家从粮食净出口国转变成成为粮食净进口国。这对于富裕国家来说并非是个问题，但对于贫穷国家而言，它们不得不想尽办法为这一新增的进口而融资。此外，新增的粮食进口需求以及非粮食商品价格的上涨，导致发展中国家出口收入减少，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这些经济体的困境。

将面临粮食安全问题的国家显然会越来越多。如果当前所有可用的农业用地在2050年时都用于农业耕作，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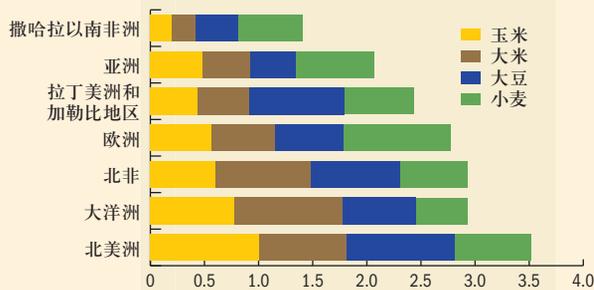
城市化程度的不断增长将导致一国越来越依赖于贸易，尤其是在非洲、亚洲和欧洲；一些低收入国家则可能不得不想办法为其进口粮食来融资。

(占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变化)



撒哈拉以南非洲在通过提升其已耕作土地生产率来提高粮食供应方面的潜力很大。

(农业产量，与产量最高地区的比率)



7.5亿劳动者养活着其余66.5亿人口。



全球劳动者中有

30%

从事农业



撒哈拉以南非洲劳动者

中有 **60%**

从事农业

么最多也仅能养活 90 亿人，而预计届时的人口将达到 97 亿。这一估计忽略了大规模土地使用膨胀的不利一面：砍伐森林、生物多样性的消失、土壤退化以及碳排放量的增加——所有这些都对气候变化造成影响，并对粮食产量和牲畜生产力带来损害。未来粮食供给的增加必须要依赖于现有已耕作土地生产率的提高。

科技可以帮助农民持续且有效地提高其营养作物的产量。例如，转基因 C4 大米能更有效地利用水和氮，其产量比普通大米高出至少 50%。但是，全世界大多数人都对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表示担忧。

粮食需求将随全球人口的增加而持续上升，并且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依赖于贸易来满足粮食需求问题。收入的增加将会刺激对肉类、奶制品和生鲜农产品的需求。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长期办法是减少过度消费和粮食浪费，消除贸易壁垒以及提高生产率。而低收入国家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以吸引资金并将其投入农业部门。

尽管还有扩大耕地面积的空间，但出于各种环境和社会方面的考虑，将所有可用农业用地用于耕作是不现实的。

(已使用和未使用的可用农业用地，百分比)



每年所生产的供人类消费所有粮食中有33%
(13亿吨)
被浪费掉。

本文由玛利亚·约瓦诺维奇 (Maria Jovanović) 撰写。文中所涉及内容和图表基于 IMF 于 10 月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的“商品特性”。



2015年，
85%
的粮食在其生产本国被消费……

……因此，粮食在全球贸易中的
份额仅占

8%



咖啡生产大国

巴西	越南	哥伦比亚	印度尼西亚	埃塞俄比亚

咖啡消费大国

欧盟	美国	巴西	日本	加拿大

空洞化

阿里·阿里奇

美国中等收入阶层正在不断萎缩，或晋身高收入阶层，或跌落低收入阶层

在美国，税前家庭实际收入处于全美中位数的 50% 至 150% 之间的中等收入阶层正在不断萎缩。1970—2014 年美国中等收入家庭数量占全美家庭总数的比例下降了 11 个百分点，从 58% 下降到 47%。也就是说，美国收入分配正在两极化，即空洞化，中等收入家庭要么变得更富裕了，要么变得更贫穷了（见图 1）。

1970—2000 年，这种两极化主要是向有利的方向发展，因为升至高收入阶层的家庭（实际收入或扣除通胀因素后的收入高于中位数的 150%）比跌入低收入阶层（实际收入低于中位数的 50%）的家庭要多。但是，自 2000 年以来，情况完全逆转。跌入低收入阶层的家庭比升至高收入阶层的家庭要多。

跌入低收入阶层对家庭造成了不利影响，特别是在平均实际收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的情况下。近年来，空洞化阻碍了消费，从而损害了经济，因为消费是美国的主要增长引擎。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美

国更低的消费也给它的贸易伙伴带来了损害，同时还影响了其他许多通过全球生产链和金融链而与美国经济有间接联系的国家。

中等收入阶层的发展趋势

强有力的经济需要强劲的消费和投资拉动，才能运转良好。低收入家庭消费能力有限，储蓄很少。虽然高收入家庭储蓄很多，但相对于其收入来说，消费得太少。中等收入阶层才是社会消费及储蓄的主力军。在美国，中等收入阶层不仅占消费的大头，也提供了大部分的人力资本，还拥有大多数有形资产，比如房屋和轿车。因此，中等收入阶层的萎缩损害了经济。

1970 年以来，发生变化的中等收入家庭数量占美国家庭总数的 11 个百分点，这些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经济的发展；因为其中有一半左右的家庭升至高收入阶层，而另一半则跌入低收入阶层。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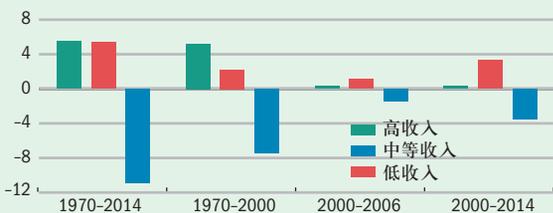


图1

空洞化

1970年以来，美国中等收入家庭所占份额一直在萎缩。

(收入阶层的份额变化，占家庭数量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当前人口调查》。

注：中等收入家庭是指根据家庭规模调整的年收入位于全美中位数的50%至150%之间的家庭。位于该区间之上的属于高收入家庭，位于该区间之下的属于低收入家庭。

自世纪之交以来，变化的长期趋势显示出恶化的迹象。尽管1970年至2000年间大多数家庭从中等收入阶层升入了高收入阶层，但2000年以来，仅有0.25%的家庭升入高收入阶层，而跌入低收入阶层的家庭则有3.25%。

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代表着其在整个经济中的相对权重。在上述期间，中等收入阶层日益空洞化，其在全美总收入中的份额正在萎缩。1970年，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占美国总收入的比例为47%左右，而2014年则为35%。中等收入家庭收入减少的份额与高收入家庭收入增加的份额大致相当。而低收入家庭收入份额在整个期间保持不变，占全美总收入的5%左右。近年来的工资低增长也是造成这些趋势的原因之一，工资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复苏缓慢，同时还因为人们没有变换工作(Danninger, 2016)。

不平等与两极化

尽管经济学家对收入不平等不断扩大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收入两极化现象还没有引起广泛关注。收入两极化是衡量收入从收入分配的中部向两极移动的程度。收入不平等是衡量收入分配两极之间收入差异的大小，即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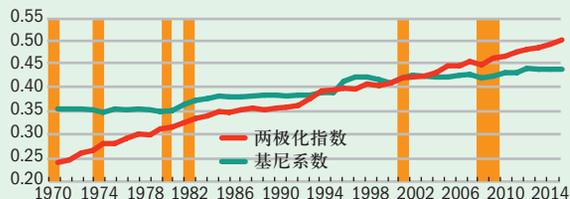
收入不平等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基尼系数是测算家庭收入分配的统计离差。而用来衡量收入两极化的类似指数远没有基尼系数那样广为人知。这种两极化指数主要是估算那些收入靠近分配两极的家庭的相对比重。两极化指数数值在0到1之间。当所有家庭收入都相同时，该指数为0。当收入向两极靠近的家庭数量增加时，指数也将增大。如果一些家庭没有收入，而其余家庭收入相同（非0），则指数为1。图2显示，对基尼系数和两极化指数进行比较的结果表明，1970年以来收入两极化比不平等程度增长更快。而且，2000年以来，基尼系数基本保持稳定，而两极化指数则持续增长，这表明近年来在社会和经济上，

图2

快速两极化

尽管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已趋于稳定，但美国的收入两极化程度在持续上升。

(基尼系数和两极化指数数值)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当前人口调查》；以及作者的计算。

注：基尼系数是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衡量指标。基尼系数为0时，每个家庭收入相同。两极化指数是收入从中等向两极移动的衡量指标。所有家庭收入相同时，该指标为0；一些家庭没有收入，而其余家庭收入相同（非0）时，该指标为1。收入数据根据家庭规模调整。阴影区域表示经济衰退。

中等收入阶层的空洞化可能比收入不平等甚至更加令人担忧。

广泛空洞化

虽然我们定义中等收入阶层的家庭实际收入位于全美中位数的50%到150%之间，但实际上对于中等收入阶层的构成并没有普遍认同的定义。我们的研究显示，中等收入阶层空洞化现象在其他合理假设下仍会出现：假设以全美收入中位数为基准设定中等收入阶层收入的上下限，如全美收入中位数的60%至225%，或75%至125%。

我们采用中等收入阶层的相对定义，其中每年的家庭收入以该年全美收入中位数为基准进行比较。还可以用绝对美元工资临界值来定义中等收入阶层，这就不需要收入中位数。用绝对数值定义的统计结果也显示出了类似的空洞化趋势。

此外，如果排除收入分配上收入最高的1%家庭，或者不区分年龄、种族、教育程度来估算，其结果都类似：过去40年来，收入两极化程度大幅上升。唯一的例外是户主为女性地家庭；1970年以来，这类家庭的收入两极化程度下降，但最近几年也呈现出上升趋势。

拖累经济

最近，向收入分配低端移动的家庭过多，这可能产生负面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向下移动也可能被视为不公平，这也理所当然。

两极化还可能对总体经济造成严重后果。1998年以来，大部分的两极化表现为中等收入家庭成为低收入阶层。对总体经济而言，这种向下移动减少了收入，导致消费损失。根据估算，1999—2013年两极化已造成相当于半年

图3
损失一年

1999年以来，收入两极化与消费对收入增长响应下降，这两者的联合效应已使消费减少了相当于全美国一年的消费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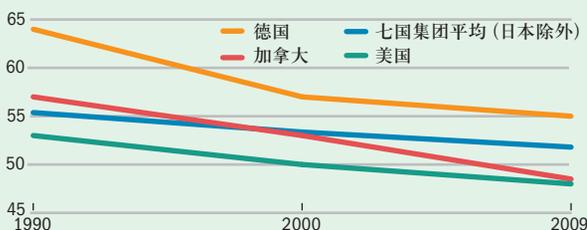
(消费损失，百分点)



资料来源：密歇根大学，收入动态专门小组研究；以及作者的计算。

图4
两极分化

美国之外其他发达经济体的中等收入阶层正在空洞化。
(收入位于中位数的75%到150%之间的人口百分比)



资料来源：Bigot等人(2012)。

注：七国集团是指七个发达经济体集团：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七国集团合计数据中不包括日本。

消费增长的损失，总消费因此累计损失了1.75个百分点(见图3)。

雪上加霜的是，最近的证据表明，所有家庭类似的收入增长并不能带来消费的同增长，而在不久之前，收入增长通常会引发消费增长。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就是，尽管经济学家预测多数低收入家庭会随着收入增长而增加消费，但经济的消费边际倾向已降低。这对消费施加了更多的下行压力。1999年至2013年间，消费对收入增长的响应较慢，而由此造成的总消费损失估计也有1.75个百分点，相当于另一个半年期的消费增长。

我们只能假设造成两极化程度上升的原因，及其对总体经济的不利影响。其中一些涉及税收和移民政策。技术进步、工会化程度下降以及经济衰退也可能是影响因素。有必要对这些方面以及其他可能的原因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理解造成收入两极化的原因，能够帮助当局制定政策，以突破这一困境，让大多数人看到自己的生活水平一直在提高，也有利于处理向收入分配低端极化所带来的社会及经济影响。

全球现象

尽管本文专注于美国的收入两极化，但是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空洞化现象(见图4)。例如，在加拿大和德国，近几十年来两极化现象似乎比美国更突出，而在法国、意大利、英国等国家，两极化现象则已减速或减轻(Bigot等人，2012)。

有关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数据很少，但世界银行会定期计算很多国家的两极化指数，其结果也显示空洞化一直在上升。例如，IMF(2006)使用世界银行数据的研究发现，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前十年中期，所分析的九个亚洲国家中有八个的两极化程度呈上升趋势。其中，两极化指数上升幅度最大的是中国，最小的是斯里兰

卡。在此期间，只有泰国的两极化指数出现下降。

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空洞化现象。

我们研究的美国的数据截止到2014年。但最近公布的收入数据显示，2015年家庭收入中位数大幅增长5.25%，贫困率下降，这令人印象深刻。但是，这一优异表现不可能持续到2016年。首先，大部分的收入增长是非劳动所得，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平价医保法案”而直接和间接获得的更多补贴，该法案增加了健康保险的可获得性。这些政策导致了一次性的收入猛增，但除非政策变化，否则这些收入增加不可能持续。其次，2015年新增就业可观。但随着美国经济接近满负荷运转，新增就业预计会减速。2016年上半年，按月付薪的新增就业较2015年已显著降低，平均实际工资增长也在减缓。■

阿里·阿里奇(Ali Alich)是IMF西半球部高级经济学家。

本文基于2016年IMF工作论文16/121“Income Polar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Ali Alich、Kory Kantenga和Juan Solé著。

参考文献：

Bigot, Régis, Patricia Crouette, Jörg Muller, and Guillaume Osier, 2012, “The Middle Classes in Europe: Evidence from the LIS Data,” LIS Working Paper Series 580 (Luxembourg Income Study).

Danninger, Stephan, 2016, “What’s Up with U.S. Wage Growth and Job Mobility?” IMF Working Paper 16/122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06, “Rising Inequality and Polarization in Asia,” in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Asia and Pacific* (Washington, September).



逃离优质商品

阿根廷门多萨普里奥，正在照看酒庄的人。

娜塔莉·陈、卢恰娜·尤韦纳尔

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贸易崩溃，其名义值在2009年第二季度至2008年第三季度间下滑了30%。即使扣除通胀因素，仍然大幅下降18%。

若用世界贸易额与GDP的比值来衡量，也呈现出类似的巨幅下降。这是因为金融危机极大地影响了耐用消费品和投资品贸易，这两类商品占了世界贸易额的很大部分，但对于全球GDP来说，却只占很小的份额。

因消费者购买得更少，从而促使全球进出口额下降，但情况还不止如此。仅以阿根廷葡萄酒出口为例，我们有证据表明，消费者购买了更多的低质低价产品，来取代原来的优质高价产品，这也是造成世界贸易额名义值（扣除通胀因素前）下降的原因之一。

经济衰退之痛

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期间，收入通常都会下降，家庭消费也随之减少。由于消费品中包括进口商品，进口商品也因而减少，也就是对外国产品的需求减少。但是，消费紧缩不仅影响消费数量，还

影响消费品的种类，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因为相对于低质商品而言，优质商品的消费通常对收入变化更敏感，收入骤然减少（用经济学术语来说，是不利收入冲击）可能引发“逃离优质商品”现象，即遭受经济危机冲击的国家的家庭不仅减少了消费数量，也降低了消费商品的质量。优质商品市场的萎缩也就因而比低质商品市场更严重。我们对全球金融危机是否引发贸易商品领域的逃离优质商品现象进行了研究。就阿根廷葡萄酒而言，答案是肯定的。

衡量商品质量是个难题，因为不存在适用于不同种类商品的单一可比指标。我们仅在葡萄酒行业找到了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因为葡萄酒行业有知名专家会定期评估产品质量。我们将这些评分作为直接衡量商品质量的依据，结合丰富的阿根廷葡萄酒生产商数据——包括厂商层面的、出口到具体目的地的各种葡萄酒的价值和数量等信息——发现存在明显的逃离优质商品现象。另外，研究结果还表明，在经济危机期间，阿根廷葡萄酒贸易额下降中高达9个百分点是由于其产品质量构成的变化造成的。

阿根廷葡萄酒出口情况表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葡萄酒消费转向低档产品

可观的增长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阿根廷葡萄酒产业高速发展。到21世纪头几年，阿根廷已成为全球第五大葡萄酒生产国、第八大葡萄酒出口国，出于研究目的，我们使用了阿根廷海关的数据。每批出口的葡萄酒，我们都可以找到出口商的名称、出口目的地国、装运日期、商品价值（以美元计）和数量（以升计）等信息。这些数据非常丰富，还包括了每批出口的葡萄酒的名称（品牌）、原料葡萄品种（比如，霞多丽或马尔白克）、种类（白、红、玫瑰红）、酿造年份等信息。为了评估各种葡萄酒的质量，我们还依靠两大知名的专业资源，即《葡萄酒观察家》杂志（Wine Spectator）和葡萄酒评定专家罗伯特·M. 帕克（Robert M. Parker）。双方都对各种葡萄酒的质量进行评分，评分范围在为50到100之间，分数越高代表质量越优（见表）。

通过逐月比较阿根廷总出口额及其葡萄酒出口额（名义值，未经通胀因素调整，以美元计），可以确定贸易崩溃的时间表。其总出口额及葡萄酒出口额都从2008年9月的高峰一直下滑，到2009年1月，此后至2009年年底都在缓慢恢复。因此，可以确定经济危机开始于2008年10月，结束于2009年9月，为期一年（见图）。

经济危机导致的总需求下降是引发逃离优质商品的根本原因。

我们接下来研究了在危机期间，优质葡萄酒出口的下降幅度是否比低档葡萄酒更剧烈。研究发现，在危机之前，优质葡萄酒出口增速比低档葡萄酒更快，但在危机期间，情况发生逆转，优质葡萄酒出口下降的幅度比低档葡萄酒严重得多。平均而言，危机期间葡萄酒质量等级每上升一级，其出口增长下降2个百分点。研究还发现，优质葡萄酒的出口额名义值下降基本是由于出口数量下降造成的，而不是由于出口价格下降造成的，这表明经济危机主要影响了实体经济。我们考虑了葡萄酒供求的各种影响因素，包括总体经济情况和厂商层面的问题，前者对所有葡萄酒出口的影响相同，后者包括了生产力、信贷约束等因素。

专家评价

葡萄酒质量的两大重要评价者（《葡萄酒观察家》杂志和罗伯特·帕克）进行评价，评分范围为50到100。

《葡萄酒观察家》		罗伯特·帕克	
95-100	最佳	96-100	最佳
90-94	卓越	90-95	卓越
85-89	优秀	80-89	优秀
80-84	一般	70-79	一般
75-79	平庸	60-69	平庸
50-74	不推荐	50-59	不接受

资料来源：IMF，2016。

增长中断

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8年年底，阿根廷总出口额及其葡萄酒出口额都高速增长。随后，在2009年开始恢复。



资料来源：IMF，《国际金融统计》；以及Nosis。

研究还分析了具体出口目的地国这一因素，包括其GDP的增长情况、贸易保护措施、双边汇率等。

对造成优质葡萄酒出口急剧下降的原因有多种说法。首先，我们发现，经济危机导致的总需求下降是引发逃离优质商品的根本原因。对受危机影响更严重的目的地国家，比如美国和英国，阿根廷的优质葡萄酒出口下降幅度更大。其次，我们还发现逃离优质商品现象在法国和意大利更加严重，因为这些国家的消费者可以用自制葡萄酒替代进口葡萄酒。而且，小公司出口受逃离优质商品现象影响更为严重，因为这些小公司是专门生产优质葡萄酒的利基型生产商，当家庭收入下降时它们受到的冲击更大。

最后，我们发现，在危机之后，一旦世界经济开始从衰退中恢复，优质葡萄酒出口增长将恢复得更快。这表明，经济危机的贸易效应只是暂时的。

替代性情形

为研究质量对葡萄酒出口的影响程度，我们假设了两种情形，以评估阿根廷葡萄酒出口在危机期间的表现。情形一，假设在危机期间，所有出口葡萄酒的质量都提高到研究数据集里的最高水平（即96分）。情形二，假设了另一种极端情况，即所有出口葡萄酒的评分都降至研究数据集里的最低水平（即68分）。这两种反事实情形呈现了危机期间假设贸易额估计值的上下限，此贸易额随着葡萄酒出口质量的变化而变化。

我们对运送至各目的地国家的各种葡萄酒出口增长预测值进行估算，并与这两种情形下估算的预测值进行比较。如果出现情形一，即假设所有葡萄酒质量评分都为96分，估计阿根廷总出口额会下降38.94%，比实际的36.53%多降了约2.5个百分点。与此相反，如果出现情形二，出口下降的幅度更小，只下降30%。因此，两种相反情形的预测出口额相差了9个百分点，这不容忽视。结果表明，专

门生产优质产品与专门生产低档产品的国家之间出口表现可能相差很大。

尽管使用厂商层面的商品贸易数据研究表明存在逃离优质商品现象，与实证研究一致，但我们的分析仍受到很多限制。首先，由于我们只专注于阿根廷葡萄酒出口，所以就无法分析受危机影响国家的消费者从更昂贵的传统葡萄酒转向消费较便宜的阿根廷葡萄酒的可能性，而这一因素可能最终避免了阿根廷的出口下降幅度更大。

其次，因为本研究集中于一个国家的特定行业，所以我们不能确定其结论是否可以普遍适用。但是，虽然使用不同的数据集，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一些研究（比如 Bems 和 di Giovanni，即将出版；以及 Burstein、Eichenbaum 和 Rebelo，2005）得出的结论仍然与本研究一致。这表明，我们的调查结果可能也适用于其他行业和国家，从而可以从本研究中得出一些初步的宏观经济启示。

首先，通过证明显示贸易构成决定了应对经济衰退的贸易流通方式，本研究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了解不同国家的出口在经济衰退期间具体会如何表现。尤其是，由于富裕国家倾向于生产优质产品，因此其出口在经济衰退期间可能遭受更大冲击（Berthou 和 Emlinger，2010，证明专门生产优质产品的国家在全球市场动荡期间遭受的贸易损失更大）。其次，金融危机对葡萄酒出口数量的影响大于对其价格的影响，说明了金融危机主要的实

质性后果。最后，本研究还对理解金融危机的分配效应有所启发：由不利收入冲击引发的逃离优质商品现象可能损害消费者福利。更准确地说，如果消费者喜好多样性，但同时也注重质量，那么其所消费产品质量的下降会减少其福利。■

娜塔莉·陈（Natalie Chen）是华威大学经济学副教授，曾是IMF能力发展学院的访问学者。卢恰娜·尤韦纳尔（Luciana Juvenal）是IMF能力发展学院的经济学家。

本文基于作者所著的2016年IMF工作论文No. 16/30 “Quality and the Great Trade Collapse”。

参考文献：

Bems, Rudolfs, and Julian di Giovanni, forthcoming, “Income-Induced Expenditure Switch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Berthou, Antoine, and Charlotte Emlinger, 2010, “Crises and the Collapse of World Trade: The Shift to Lower Quality,” *CEPII Working Paper 2010-07 (Paris: Centre d’Etudes Prospectives et d’Informations Internationales)*.

Burstein, Ariel, Martin Eichenbaum, and Sergio Rebelo, 2005, “Large Devaluations and the Real Exchange Rat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3, No. 4, pp. 742-84.



通过聆听 了解世界

收听IMF播客，了解有关经济和发展领域最出色的观点。

登录IMF.org或者你最喜欢使用的播客APP。

现金之巅

瑞士因保留使用现金的传统而与全球趋势相背离

大卫·佩德罗萨

瑞士人很少迟到。但是，新版瑞士纸币从2010年起才开始酝酿。直到今年早些时候，随着新的50瑞士法郎纸币的推出，这一全新版本的货币系列才即将与大家见面。

新推出的瑞士货币作为支付的替代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大受欢迎。而现金，尤其是大面额现金钞票，正受到严密的监控，以防止伪造和犯罪。

然而，在瑞士，传统战胜了趋势。现金仍是人们偏爱的支付方式，并且这一情况不会在短期内改变。事实上，流通中的货币的面值从2007年的400亿瑞士法郎上升至2015年的650多亿瑞士法郎。



Fünfzig Franken
Schuncanta Francs

新版50瑞士法郎纸币的正面和背面。

今年早些时候，瑞士国家银行行长托马斯·乔丹 (Thomas Jordan) 说：“尽管支付领域的科技发展迅猛，现金有望被取代；然而，在瑞士现金仍被广泛使用，并且是人们非常喜欢的一种支付方式。”

国际清算银行最近的一项研究证实了这一趋势：信用卡支付总量占 GDP 的比率在瑞士仅为 10%，而这一比率在瑞典为 25%，英国为 34%。

一千个理由

其他国家出于对支持犯罪和逃税的考虑，正逐步取消大额现金货币，如 10000 新加坡币和 500 欧元。但是，乔丹说：“我们并没有取消 1000 瑞士法郎纸币的打算。因为它在瑞士的使用很广泛，是很重要的支付载体。”事实上，对 1000 瑞士法郎纸币这个全球价值第二高的货币（位于第一的是文莱的 10000 元纸币）的需求在 2015 年 12 月飙升，当时瑞士的利率进入负时代。根据瑞士国家银行的数据，2015 年 12 月流通中的 1000 瑞士法郎纸币的面值高达 452 亿瑞士法郎，而前一年仅为 405 亿瑞士法郎。这次推出的新版货币中将仍有面值 1000 瑞士法郎的纸币。

瑞士法郎在全世界货币交易中排名第六，面临着巨大的伪造风险。即使如此，它仍是全球最安全的货币之一。

现金仍是人们偏爱的支付方式。

瑞士国家银行在其 2015 年年度报告中说，查封的假币仅有 2400 张，也就是流通中的货币数量的百万分之六。

即便如此，瑞士人也不愿意冒任何风险。他们依靠先进的科技来保护其使用现金以及大额纸币的传统。

新版 50 瑞士法郎纸币就包含了 15 项防伪特征，以防止货币伪造。将其按照一定的角度倾斜，可呈现出彩虹色的瑞士阿尔卑斯山的轮廓。从特殊的角度看，还能看见瑞士国旗上的十字图案。

在国际趋势方面，这套新版瑞士法郎赶上了国际潮流，那就是新版货币的两层棉纸之间增加了一层聚合物夹层。预计这一版本的货币将可使用至少 15 年。

设计方面的考虑

瑞士人可能并不着急改变他们使用货币的习惯，但在设计货币方面则是另一番景象。这套新版货币抛弃了描绘众所周知的瑞士形象，而选用了更为细致和抽象的概念。



现在正在使用的 1000 瑞士法郎纸币的正面，以及新版 50 瑞士法郎纸币的设计草稿。

在“多面的瑞士”这一主题之下，新版货币的每一种都展现了瑞士不同的一面。根据央行的资料，“每个主题都通过动作、瑞士地标以及各种生动的图形元素予以呈现。”

旧版 50 瑞士法郎纸币上印有描绘得栩栩如生的达达主义艺术家索菲·托伊伯 (Sophie Taeuber-Arp) 的肖像（这是旧版八张货币当中唯一的印有女性肖像的），而新版则是采用风为主要元素来展现瑞士丰富的财富和经验。新版 50 瑞士法郎的正面印有蒲公英和地球的图案，背面则印着随风飞翔穿越阿尔卑斯山的滑翔伞。而其他面额的纸币将包含时间、水、物质及语言等元素。

这一新版货币还有供视力有障碍的人使用的标记，以便于其能够分辨不同面额的货币。

虽然这一版货币的最终设计还未公布——预计 2017 年将推出新版 20 瑞士法郎纸币——但是瑞士仍将继续以不同的方式行动起来，以保留他们的传统。■

大卫·佩德罗萨 (David Pedroza) 是 IMF 信息交流部的信息交流官员。

财政冲击

政府应该理解并管理财政支出及债务的风险

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被地震损坏的房屋。

本尼迪克特·克莱门茨、泽维尔·德布兰、布莱恩·奥尔登、阿曼达·萨伊格

管理公共财政的关键是要预测政府收入、支出、预算赤字、公共债务等随时间变化的情况。掌握了这些，政策制定者就可以决定是否需要改变税收及支出政策，以保持总体经济稳定。

但是，最近的实践表明，公共财政经常会有意外发生。不利的意外事件常导致财政赤字比预期更高，公共债务比预期更大。因此，公共财政受制于“财政风险”——指那些可能导致财政支出偏离预期的事件。这些事件或者由于出人意料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比如经济减速）引发，或者由于“或有负债”变成的现实债务。“或有负债”是由不确定事件触发的债务，既可能是明确的债务，性质上合法（比如，农作物减产时，提供给农户的政府贷款担保），也可能是不明确的，如公众对政府的期望，这并没有法律规定（例如，金融危机后的银行纾困资金）。

如果政府希望避免公共债务大量意外地增加，从而导致财政政策偏离正轨，更好地理解财政风险及其管理方法就非常关键。

财政风险

为研究政府财政风险的规模和性质，IMF 开展了一项全面调查项目（2016），调查过去 25 年来 80 个国家的债务情况，找寻政府债务的财政“冲击”——即真正发生财政风险并影响公共财政的因素。该调查结果证实了财政冲击不仅规模大，而且很频繁。平均而言，这些国家每 12 年要经历一次耗费 GDP 6% 的不利冲击，每 18 年要经历一次大型冲击，耗费 GDP 的 9% 以上（见图）。上述数据仅仅是平均值，各国之间的财政风险规模和发生频率差异很大。

造成财政冲击的原因有很多，其中经济增长急剧减速（宏观经济冲击）和为金融行业纾困造成的破坏性最大，平均每次事件将耗费 GDP 的 9%。但是，对政府的合法索赔、为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纾困，以及地方政府（如省、州、市级政府）的索赔也增加了很大的财政负担，分别平均耗费 GDP 的 8% 和 3.5%。而自然灾害平均每次耗

费 GDP 的 1.5%，这类事件发生越频繁，对灾难易发国家的影响就越大。在某些情况下，财政支出要比平均值高得多，比如 2010 年新西兰坎特伯雷地震耗费了其 GDP 的 5%，2011 年东日本大地震耗费了其 GDP 的 4%。除宏观经济冲击外，大多数财政冲击来自于隐含的或有负债，而不是明确的债务。

尽管财政风险发生频率高、支出大，但政府对它们了解得很少，并且管理水平很低。例如，受调查的国家中仅有 1/4 会发布财政资产负债表（该表详细列明各项资产与负债），而且其中多数不完整。不到 1/3 的受调查国家会发布关键宏观经济变量变化对公共财政影响的定量分析报告，这些变量包括外汇汇率或通货膨胀率。不足 1/5 的受调查国家会发布或有负债的定量报告。

最佳实践

政府应对自身的财政风险敞口有更完整的认识，制定更全面的管理战略。其中包括四个阶段流程，即识别财政风险来源并评估其对公共财政的潜在影响；评估是否需要采取措施，以降低财政风险敞口；决定是否对无法降低的风险编制预算；决定是否需要更大的安全边际（即更低的公共债务）来应对全部或部分不能编制预算的风险或不能降低的风险。更高的安全边际能让政府能够吸收大多数公共财政的负面冲击，而无须举债至畸高的水平。

识别并量化财政风险：包括对其严重程度的评分及估算发生的可能性（如果有可能的话）。例如，智利、哥伦比亚、秘鲁政府运用模拟方法估算或有负债，这些或有负债来自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协议对私人承包商的最低收入保证。瑞典政府根据市场和期权定价数据，用模拟方法估算价格担保的规模。如果量化太困难，仍可以根据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将其分类（比如分成很可能、可能、

极小可能等）。

降低财政风险：潜在冲击的多样性意味着没有一种灵丹妙药可以包治所有公共财政问题，而是需要采用一系列的工具。工具的选择要根据风险的性质、降低风险与包容风险之间的成本效益权衡、制度能力等来决定。风险缓解措施包括对财政风险敞口的直接控制或限制财政风险敞口。例如，冰岛政府限制自治地方政府的累计债务规模，匈牙利政府限制发放新担保。风险缓解措施还包括通过法规或激励机制来降低风险（例如，很多国家要求银行建立应对损失的资本缓冲；瑞典对政府担保的受益者征收风险费用等）。在某些时候，还可以将风险转移给第三方，例如，通过购买保险（土耳其政府就购买了自然灾害保险）。对于那些国家收入依靠大宗商品的政府，还可以采用套期保值工具来提前锁定销售价格，让商品不受价格下跌而造成损失。墨西哥政府发行的巨灾债券是向投资者转移某些自然灾害风险的另一种方法。如果指定自然灾害发生，投资者将免除墨西哥政府的债务。如果指定自然灾害没有发生，政府继续支付本金和利息，如同普通债券一样。

在有些情况下，消除所有风险并不可行。

编制预算：政策制定者应该将很可能发生风险的预期费用纳入预算（例如，美国政府的信贷担保预算和澳大利亚政府的学生贷款违约预算）；对可能发生的风险编制应急费用预算（例如，菲律宾政府的自然灾害应急预算）；考虑预留资金防备更大风险发生（例如，智利的稳定基金，即在铜产品出口收入很高时留存的部分资金）。

包容剩余风险：有些风险规模很大，以致无法处理，而降低风险的费用太高，或者根本无法详细了解具体情况。例如，有些极小可能风险（比如，数百年才发生一次的自然灾害）的保证费用太高，以及对于有大规模风险敞口的国家来说，要冲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全部风险，市场流动性不足或深度不够。制订政府债务长期目标时，政府应考虑此类风险，留出安全边际，同时保持其债务水平符合财政制度的规定。为了确定所需安全边际的大小，分析哪种宏观经济和财政变量的潜在波动将会影响公共债务的变化趋势是很有帮助的。因为这些变量不确定、不可预测，政府可以考虑采用概率方法来预测公共债务变化趋势，并将其纳入财政风险管理系统（见专栏）。

除此之外，政府也必须开发更先进的综合方法来分析财政风险。政府可以运用传统风险分析工具，定期对公共财政进行压力测试，就如同评估银行系统稳定性的压力测试那样。这些传统工具专注于真正的离散冲击。压力测试让政府能够评估关键宏观经济变量（利率、汇率、房价等）的各种冲击后果。政府还应该考虑这些冲击间的相互

现实的风险

耗费巨资的财政冲击事件时常发生，比如自然灾害、经济减速、为金融行业纾困等。

（十年间财政冲击事件的发生概率，百分比）



资料来源：Bova等人（2016）；以及作者的计算。

注：PP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公司是指私营非金融企业。地方政府是指比国家级低一级的政府，包括州、省、市政府。数据包含1990—2014年间80个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的数据。

不确定时代的预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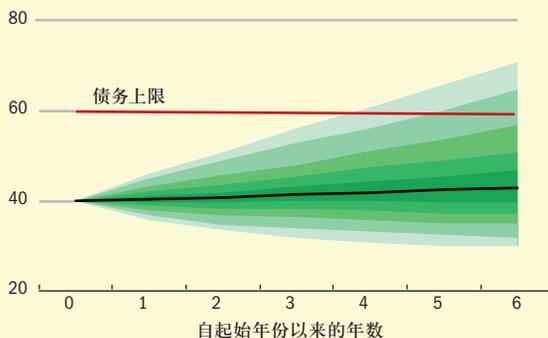
大多数财政预测从基准情形开始，基准情形运用特定的宏观经济假设，如经济增长。如果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与该假设不同，公共财政就会受到影响。为更好地理解债务水平变化的潜在结果，构造扇形图会有所帮助——扇形图可以显示从同一起点出发的债务对GDP比率变化趋势的各种概率。估算债务水平变化潜在趋势的基础是不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经济计量估计，以及过去的财政政策中应对宏观经济变化的方法。一般来说，经历过宏观经济和财政变量大幅波动的国家，其债务水平变化的潜在范围会更广，不确定性更高。

上述结论有助于政府管理财政风险。例如，在右图中，某个国家的财政制度规定要将其债务规模限制在GDP的60%，初始的债务对GDP的比率为40%左右。基准预测中，假设债务对GDP的比率在其后六年基本不变。那么，根据这个基准预测，该国债务对GDP的比率能够处于60%这一上限之下，而这似乎是确定无疑的。但是，鉴于过去的总体经济环境反复多变，及其对财政预算结果的影响，其后六年，债务对GDP的比率超过60%这一上限的可能性为15%。政策制定者可以运用此结论，综合考虑政府的优先事项及政策制定者

债务展望

对于经历过宏观经济变量（如经济增长）及财政政策大幅波动的国家，其未来债务水平的潜在范围会更大。

（债务，占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

注：本示例中，某新兴市场的公共债务上限为其GDP的60%，其起始年份的债务相当于其GDP的40%。但是，鉴于总体经济环境和财政政策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其后第六年债务水平的范围可能会很广（超过60%的债务水平）。

突破债务上限的意愿，来决定是否降低当前为40%的债务对GDP比率，以确保有足够的边际使该比率低于上限。

作用，以及与政府资产流动性、可持续性、偿债能力有关的或有负债变成现实债务的情况。例如，财政压力测试将涉及全球金融危机时所遇到的情景，当时，公共财政受到房地产危机、金融危机、经济急剧减速等综合效应的冲击。在这些冲击之下，社会保障支出急剧增加，同时国民收入及税收急速下降。

制定管理财政风险策略时，政府还应考虑降低风险的成本。此类分析可以通过数据了解风险发生的概率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社会偏好等情况。例如，有些政府可能偏好投资项目，创造近期效益（比如公共投资），而不是设立基金来应对潜在的自然灾害影响。在有些情况下，消除所有风险并不可行。例如，清除金融系统的全部风险可能需要相当大的存款保险及资本要求，从而过度抑制贷款及经济增长。

优先性不同

加强风险分析与管理，应考虑各国政府对其财政风险进行精密监控和数量分析的能力差异。

例如，在这方面能力不足的国家，首先应该编制基本的财政资产负债表，建立公共财政对宏观经济变量敏感性的经验法则，更好地理解并披露主要或有负债。而有能力

的国家，则可以专注于披露其或有负债的规模及发生概率，并定期进行压力测试，以评估其对极端事件风险敞口的情况。

财政风险降低策略也应量力而行。能力不足的国家可以专注于通过直接控制和设置上限，来限制其担保、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及其他明显或有负债的风险敞口。有能力的国家可以更有效地发挥法规、激励机制、风险转移工具的作用，识别其预算或财政计划中遗留的风险敞口，并做好应对准备。■

本尼迪克特·克莱门茨（Benedict Clements）是IMF非洲部处长；泽维尔·德布兰（Xavier Debrun）是IMF研究部处长；布莱恩·奥尔登（Brian Olden）是IMF财政事务部副处长，阿曼达·萨伊格（Amanda Sayegh）是该部技术助理顾问。

参考文献：

Bova, Elva, Marta Ruiz-Arranz, Frederik Toscani, and H. Elif Ture, 2016, "The Fiscal Costs of Contingent Liabilities: A New Dataset," IMF Working Paper 16/14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16, "Analyzing and Managing Fiscal Risks—Best Practices," IMF Policy Paper (Washington).

设定高层基调

阿什拉夫·克汉

当被问到索马里中央银行董事会的优势时，贝希尔 (Bashir) 行长既感到惊讶，又觉得有趣。这是因为，作为索马里资深的政府官员，这位七旬老人以前还从未被问到过这个问题。于是，他指着同事们说，“他们想要重建中央银行，所以都想参加本次会议。”

2016年5月，IMF为索马里中央银行董事会组织了指导课程，也就是贝希尔行

长所提到的会议。现在，这个饱经战乱国家的中央银行正努力打造其核心职能，其所面临的极为严峻的挑战之一就是本国货币几乎全是伪钞。因此，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召开董事会评审会议是最不应该关心的事。但是，包括行长在内，所有七名董事会成员都急切地想要参加这次评审该央行及其董事会优劣势的会议。这次会议可以帮助明确董事会执行与非执行成员的作用

与公司董事会一样，中央银行董事会同样也能从关键评审中获益



与责任，集思广益，制定策略，确定内部报告要求（即报告的时间、地点、对象），根除效率低下的行为，从而让董事会将宝贵的时间花在必须高度重视的事情上。

尽管索马里央行可能看似是个例外，但全球的央行都将见证其高层自身的变革。一般来说，央行董事会成员都是一些国内重要人物，因为央行的有效决策要仰赖他们的优势。因此也不难想象，他们的招聘与选拔都受到了严密地监控。

但是，2012年9月，英国央行迈出了勇敢一步，他们在《经济学家》杂志上公开招聘行长，这件事仍然让人记忆犹新。招聘广告上说，应聘者必须“沟通能力强，有高超的人际沟通与交流技能，为人正直，声誉卓著”。尽管英国央行在招聘高管方面非常开放，但是在高效决策方面，还是要比商业银行落后很多。要想高效决策，董事会成员的素质就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但并不是唯一因素。为保证董事会成员的高素质，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银行监管机构除了对董事会成员提出了现有的工作经验、背景、技能等要求外（所谓的适当人选准则），还推动了对商业银行董事会的强制评审。这些评审通常定期进行（比如，每年进行一次），可自行开展或借助于外部专家。评审的对象包括全体董事会、各委员会及成员个人。评审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关键决策者的决策效率和质量。为此，作为商业银行全球标准制定者，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2015年发布了修改的《强化银行公司治理指导原则》，其中就包括董事会评审部分。

实施案例

与商业银行一样，中央银行也不例外，其董事会也需要评审，主要有以下四大理由。首先，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表明，群体首先是由人组成的，无论这些人的名声或背景如何，都会受到小集团思想、傲慢、支配欲等强迫性因素的危害。然而，大多数研究还没有涉及央行的主要决策过程，但行为经济学是个例外。行为经济学专家，如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丹·艾瑞里（Dan Ariely）、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瑞秋·克兰顿（Rachel Kranton）等，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对诸如货币政策决策产生影响进行了研究。在过去20年间，货币政策集体决策机制——例如，货币政策委员会——已逐渐取代了原先由行长一手包办的作法。IMF 2016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足够重视成员多元化及观点多样化，设计合理的委员会可以提高决策效能（Vandenbussche, 2006）。国际清算银行指出，“由董事会或委员会作出决策……目前已成为普遍的做法，同时也成为研究领域越来越关注的焦点。”（BIS, 2009）

然而，还有改进的空间。尽管可能并不会像好莱坞经典名片《十二怒汉》（该片描述了美国陪审团评议中达成

一致意见的复杂性）中那样极端，但如果时间紧迫，要处理的问题又很复杂，比如作出影响深远、公平公正的决策，那么就会受到各种影响。2014年，荷兰央行推动实施了世界上首个央行董事会评审项目。央行行长和执行董事会成员对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绩效进行了独立评估。他们聘请了两位有社会学、群体动力学和传统公司治理等方面背景的外部专家来进行评估。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专家们帮助董事会思考其战略和愿景，并开发出能提高董事会会议效率且切实可行的方法。其中一项具体成果就是以特定主题的战略会议取代原先的常规董事会会议。

董事会评审可以更好地促进性别均衡，这比简单设定董事会中女性成员比例的做法更好。

其次，央行的复杂性使得需要对其进行评估。央行要执行多种不同的任务，包括价格和金融稳定，以及金融诚信（有时要保护消费者），还包括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包罗万象且不明朗的“发展目标”。由于央行运行的环境快速多变，因此，重视对其进行持续评审并强化其高层决策者的能力也就尤为重要。

再次，央行需要以身作则。央行要求商业银行遵循最高公司治理标准，包括对其董事会进行年度评审，那么，央行自己也应该遵守同样的标准。例如，塞舌尔央行正在努力，确保自己能够以身作则，包括在董事会评审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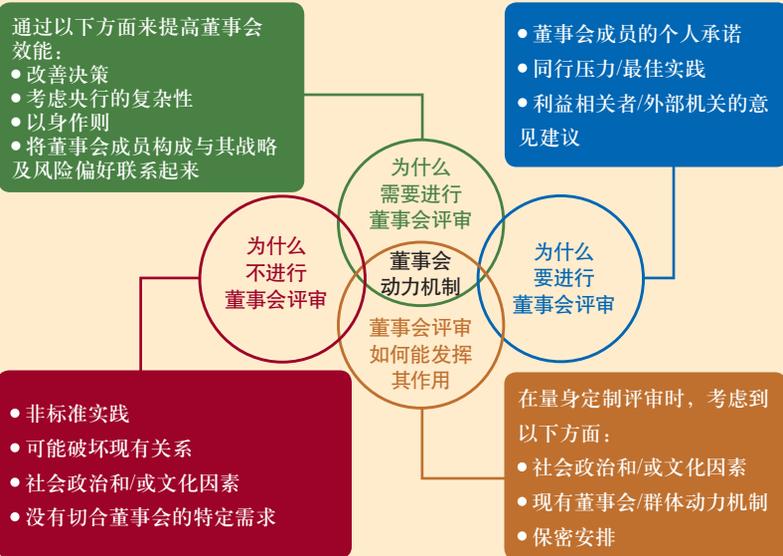
最后，董事会评审可以更好地促进性别均衡，这比简单设定董事会中女性成员比例的作法更好。例如，最近的研究发现，央行女性董事会成员与较低风险的货币政策决策有关联（参见，如 Masciandaro、Profeta 和 Romelli, 2016）。董事会评审重视分析董事会优劣势，能够确定董事会成员的能力或背景等要求，以及符合央行愿景、政策、风险偏好的资质——而不是设定其构成比例。董事会必须确定可接受的风险规模，确保所有成员都契合其战略、政策、风险偏好要求。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是选对人。

提示、诀窍和陷阱

然而，董事会评审也可能会适得其反。由于群体动力机制和人际互动通常都非常敏感。如果强行让董事会对自身进行评审，可能会导致些许的个人偏好、个人主张，甚至偏见，这都会让人感到不舒服。假如行长与董事会其他成员之间关系紧张，那么，即使明知评审内容通常不会外传，他们也不愿意在评审中进行讨论。此外，央行董事

让董事会成员做主

进行董事会评审是有必要的，但通常都没有开展。



资料来源：基于Ingley和Ivan der Walt (2002)。

会成员可能来自不同群体和地区，这就突显了社会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因为这些因素可能对群体动力机制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妨碍合理评审。就具体实施而言，负责内部审计的董事会成员、审计委员会主席或首席非执行董事是担任董事会评审者的合适人选。鉴于其独立地位，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也可能合适，不过具体要看他们相对于董事会成员而言的个人声誉和地位情况。内部评审者不能被视为下级，或当作下级对待。

另外，董事会也可以选择外部评审者。虽然董事会成员必须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并跟进评审，不过实际评审过程（以及评审前分析）都由外部专家实施。这些评审者需要赢得所有董事会成员的信任，同时又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并具备能够起到真正促进作用的技能——举例来说，退休政治家、知名学者、国际组织高级职员，甚至另一央行的同行，都是合适的评审者。

有些央行董事会成员认为自身已有内部监督。央行通常都有非执行董事或者独立监督机构，并且大多数都有内部和外部审计人员。有些央行还受其他形式的外部监管，比如审计长或独立评估办公室。但是，正式监管与董事会评审不一样，董事会评审是董事会自己评审自己。具体来说，正式监管是为了确保央行的执行管理层合理施政，担负起对其利益相关者（政府、金融部门、国际机构等）的责任。而董事会评审则是自我反省，巩固董事会成员之间的联系，提高集体决策效能。所以，尽管正式监管可以提供意见建议，但董事会评审能够促使董事会成员自己担负责任（见图）。

未来发展

目前，在一些国家，通过明确其角色与责任（如索马里）或者强化内部组织（如荷兰），董事会评审已经明显地改善了其决策效能。在另外一些国家，董事会评审已成为金融部门的模范（如塞舌尔）。已经实施了董事会评审的央行，可以向其他央行的同事传经送宝，尤其是关系密切的同行。国际机构和标准制定者也应该将央行董事会评审当作额外的公司治理工具。董事会成员的适当人选准则、透明度以及披露安排都是有益的。

董事会评审需要央行行长们认识到，此类评审并不是简单地在检查表上打打勾，也不是面子工程，更不能当作董事会的年度聚餐郊游活动。相反，这是强有力的工具，运用正确的话，可以提高央行的决策效能，从而真正赢得公众的尊敬。正如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 1973）所说，“长远规划并非处理未来的决策，却事关当前决策的未来。”因此，中央银行董事会评审活动可以确保央行决策有的放矢，直达目标。■

阿什拉夫·克汉（Ashraf Khan）是IMF货币与资本市场部的金融部门专家。

参考文献：

-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IS), 2009, "Issues in the Governance of Central Bank" (Basel).
- Drucker, Peter F., 1973, *Management: Tasks, Responsibilities, Practices* (New York: Truman Talley Books/E.P. Dutton).
- Ingley, Coral, and Nick van der Walt, 2002, "Board Dynamics and the Politics of Appraisal," *Corporate Governance*, Vol. 10, No. 3, pp. 163-74.
- Masciandaro, Donato, Paola Profeta, and Davide Romelli, 2016, "Gender and Monetary Policymaking: Trends, Drivers and Effects," BAFI CAREFIN Centre Research Paper 2015-12 (Milan).
- Vandenbussche, Jérôme, 2006, "Elements of Optimal Monetary Policy Committee Design," IMF Working Paper 06/277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节日好书



乔纳森·泰珀曼

修复

国家如何在如今的衰退中生存与繁荣

Tim Duggan Books/Crown, 纽约, 2016年, 320页, 28美元(精装)。

我们生活在全球恐慌时代, 面临着各种无法克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难题。严重的不平等现象随处可见, 并且不断恶化; 各种极端分子层出不穷, 非常危险; 经济可持续发展机会渺茫, 另人沮丧。

乔纳森·泰珀曼(Jonathan Tepperman)及时指出上述问题并非无法克服, 这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他回顾了十个案例, 通过大范围详尽的分析, 表明卓越领袖能够解决具体问题——如新加坡的腐败问题、加拿大的移民问题、巴西的贫困问题等——并产生持久良好的效果。

这些案例都很重要, 泰珀曼也诠释得很好。作为《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的主编, 作者既能接触很多高层人物, 又能深入研究新闻报道和理论文章(充分披露: 他引用了本人的某些著作)。本书虽通俗易懂, 但每一章都发人深省。我自己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未

来全球经济课程, 打算在未来的教学中运用这本书中的材料。如果你想成为社交圈中既鼓舞人心又面对现实的那个, 那么本书也是节日期间馈赠亲友的佳品。

作为书评的一部分, 我想提三个问题——并不是轻视泰珀曼的研究和文才, 而是因为这些问题与大家更息息相关。

第一,《修复》(The Fix)一书重点讲述了新加坡、韩国、博茨瓦纳三国持续取得经济上的成功的故事——过去50年里, 这三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得到极大的提高。这些都是突出的例子, 很有指导意义。但是, 别的国家学习这些模式的效果会如何呢? 新加坡可以实现高薪公务员与基本没有腐败的统一, 其他国家能否做到呢? 韩国政府鼓励组建几家强大的家族控股财团, 并向其提供有争议的补贴, 你真的推荐别国也加以仿效吗? 博茨瓦纳政府处理钻石矿藏的模式, 能否作为所有国家处理自然资源宝藏的政策指路明灯, 还是仅仅作为规则的例外?

第二, 鉴于泰珀曼的全球阅历, 他却只能举出有限几个明确的成功案例, 这令人警醒。巴西政府推出“家庭津贴”减贫项目令人信服; 当其他国家打算关上移民大门时, 加拿大政府保持开放移民政策, 也同样如此。但是, 其他有些例子虽更新颖, 但说服力也稍弱。比如, 纽约市建立了自己的国防系统——国防难道不是只能由国家层面处理的事务吗? 墨西哥的政治和经济状况真的好转了吗? 印度尼西亚已经找到了如何处理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方法吗? 卢旺达是否已经实现了经济和社会和平, 现任领导卸任后和平仍会保持下去吗?

第三, 或许我们应该后退一步,

来看看本书的大前提。诚然, 当前有很多关于全球化及其影响的焦虑情绪和政治阴霾。但是, 大趋势并非如此, 而是更加积极——这也是阿尔温德·苏布拉马尼安(Arvind Subramanian)所强调的, 他曾在IMF任职, 现任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回顾历史, 在19世纪早期和中期的工业革命时代, 世界各地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条件差别巨大。到了20世纪, 在战争、去殖民化、繁荣与萧条循环期间, 富国与穷国之间的鸿沟也并未缩小。但是, 在过去二三十年中, 也就是在最近的全球化时期, 中国以及很多其他国家都从经济改革和国际贸易中受益。因此, 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不断接近发达国家。所以, 虽然全球化的确引发了不满, 但在很多地方, 全球化也造福了数亿(或许数十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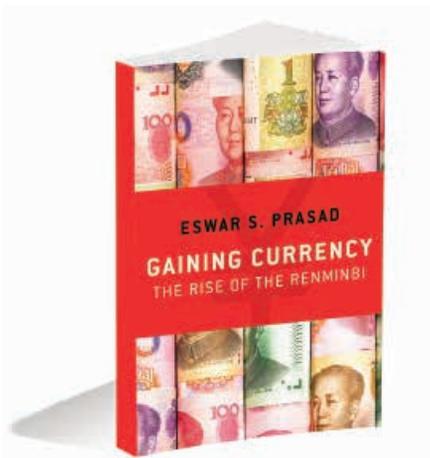
严重的的不平等现象随处可见。

泰珀曼聚焦于领袖人物及其贡献是正确的。因为这增加了本书的可读性, 引人入胜。但是, 全球化不仅是大人物的故事(本书只提及了大人物), 更应该是历史进程和经济发展, 或者说, 全球化基本上是形成中等收入阶层的更广阔进程, 让民主生根, 鼓励更强、更具保护性和包容性的人类权利发展, 难道不是吗?

西蒙·约翰逊
(Simon Johnson)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罗纳德·库尔茨创业学教授;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长期观点



埃斯瓦尔·S. 普拉萨德

获利的货币

人民币的崛起

牛津大学出版社，2016年，344页，29.95美元（精装）。

如果有一本书，其内容涵盖广泛，从忽必烈到毛泽东，到唐纳德·特朗普均有涉及，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喜欢它呢？

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的新书《获利的货币：人民币的崛起》（Gaining Currency: The Rise of the Renminbi）就是这样一部内容丰富的著作。在该书中，作者选择了当前人们所热衷的有关中国的话题，讲述了人民币是如何上升至全球领先地位，以及随着中国不断发展成为完全融入全球体系的市场经济国家，该国在未来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迄今为止，中国为了使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已经打造出一条令人瞩目的独特道路。普拉萨德清晰地描述了中国避开资本项目自由化这一常规性路径，在其资本控制措施中留了一些分散但在控制范围内的出路，允许货币流入和流出。最近人民币加入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国努力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

新的国际金融合作机构并通过跨境金融支持扩大政治和经济利益，这些都再次体现了其独特的发展路径。最后，普拉萨德描述了中国试图实施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并同时保留“既无公开政治体系也无独立司法的一党统治制度”这一空前的创举，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触及了中国例外论。

普拉萨德全面地引领我们去了解中国在全球体系中不断上升、到达与其经济规模相衬地位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迂回曲折的经历。他描述了中国领导层在从长远考虑、智慧地利用各种机会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功以及一些失误。这本书小心翼翼地绕过有关改革的各种纷繁复杂的理论说法，直接接触及实际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书本上的东西。

本书一个特别的亮点是，普拉萨德耐心地引导读者了解有关储备货币意义的各种观点，什么是人民币国际化，以及这些概念与资本账户开放有着怎样的关联。也许，这符合我本人作为一个书呆子型经济学家的偏好，不过在普拉萨德描述这一路径轨迹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能够采用更多的图表来阐明文字叙述，那就更加理想了。

这本书最具吸引力和启迪性的部分，是在作者试图从云遮雾绕的纷杂事实中梳理出主要思路并反映各种不同政策选择背后的政策动机。绑定美元或者解除与美元绑定的政策是如何作出的？为什么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事件？经济、司法和政治改革的可能前景如何？普拉萨德着重指出了中国政界精英所面临的冲突和两难选择，他们一方面想要获得市场经济所固有的选择自由，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极大的风险规避，这一次

又一次地使他们重拾中央计划的思维模式并维护政府对结果的控制（尤其是在增长出现低迷的情况下）。作者还分析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所采取各种举措的反映的本质意义，藉此来提供相关背景，尤其是与美国在美元兑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这一复杂关系上。

作为局外人，我们永远无法得知事情的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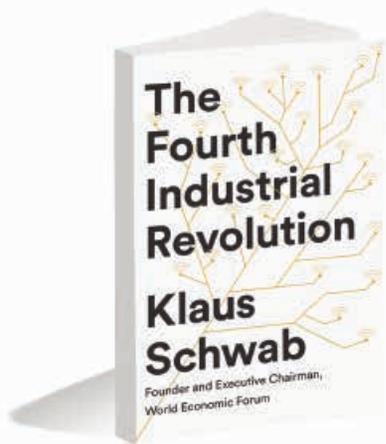
我对本书有一点小小的不同意见，就是该书在呈现上述有关国内政治动机的幕后观点方面稍微有一些过于确定了。事实上有些异议和争论总是隐藏在表象之下。在管理层内部存在活跃的理念竞争，而内部联盟的格局也在持续发生转变。所有上述因素使得诊断、分析、解释以及外推支撑政策选择的政治动机尤为困难。任何有关驱动上述幕后运筹帷幄的真正力量的揣度均应谦逊地承认这一点，即作为局外人，我们永远无法得知事情的真相。

中国有一句格言，“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无疑也是适用于这本书的。普拉萨德没有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或国家利益的约束，他能够引导读者了解与人民币相关的复杂地缘政治和经济挑战，而且他的叙述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文笔优美，引人入胜。

奈吉尔·乔克
(Nigel Chalk)

IMF西半球部副主任

革命的进化



克劳斯·施瓦布

第四次工业革命

Crown Business, 纽约, 2017年, 192页, 28美元(精装)。

在这本短小而雅致的书中,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带领我们经历了一段扣人心弦的技术、经济和社会革命之旅。1760—1840年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将人类从人力时代带进机械动力时代; 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大规模生产技术; 截至20世纪90年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先后推出了大型机、个人电脑、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产品。在施瓦布看来, 第四次工业革命虽然是建立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 但创新范围更广、力度更大。比如, 机器变得更加智能化, 并且可以互联互通, 同时还促进了物理技术、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的动态融合, 产生“人类从未经历过的”变革。

虽然所有关于当前技术革命的社会经济影响的讨论都大同小异, 但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提出了“达沃斯精神”。施瓦布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办人和主席, 世界经济论坛是一家独立的非政府国际组织, 致力于改善世界, 因每年在达沃斯召开的

年会而闻名, 因为很多“商界、政界、民间团体、宗教界、学术界、青年组织”领导人都出席这一年会。依靠世界经济论坛的人脉和大量高质量报告, 施瓦布力求找出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企业、政府、个人、社会的影响。

在本书开头, 作者描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趋势”: 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无人驾驶汽车、3D打印、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等, 令人目不暇接。施瓦布不仅强调单个技术进步, 还强调了整体的变化: 空中民宿(Airbnb)、苹果手机及现在的无人驾驶汽车等“破坏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问世; 以及工人作用减小的趋势。例如, 2014年硅谷“三巨头”的营业收入与1990年的底特律三大汽车厂相同, 但前者的市值是后者的三倍, 前者雇佣的职工人数却是后者的1/10。

我们将迎来巨大的经济增长。虽然自1970年以来, 至少在美国, 除20世纪90年代短暂的互联网泡沫时期外, 生产力增长并没有加速, 反而减速。但施瓦布认为, 这就是过去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所说的紧缩。他认为现在还未到收获的时节, 因为世界经济论坛的嘉宾们告诉他, 第四次工业革命才刚刚开始, 因为领导者们正在制定政策, 规范经济和组织结构中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范畴, 以便从中获益。

本书的其余部分回顾了企业、国内及国际组织、政府、社会、个人所面临的大量挑战与机会。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带来新的繁荣, 给工人带来生产型工作, 还是带来大规模失业? 在施瓦布看来, “历史表明, 最终结果可能在两者之间”, 关键是要促成积极的结果, 并帮助进退两难的人。

类似优步(Uber)的按需经济,

以及全球数字经济的灵活性与机动性, 是让人们从中受益, 还是引发恶性竞争? 在施瓦布看来,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找到新型社会合同和就业合同……可以限制负面作用……既不会削弱劳动力市场的增长, 也不会阻止人们选择自己的工作方式……一切都由我们自己选择。”

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提出了“达沃斯精神”。

因为施瓦布发挥了世界经济论坛的人脉和背景优势, 强调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给组织中的个人带来的挑战, 所以本书可能是此类书中最好的。读后令人振奋, 感到我们必须不断学习, 必须变革, 就像众所周知的鲨鱼必须不断游动, 才能生存。“变化只会越来越快, 未来发展要求组织以快速敏捷的方式运行, 我们必须硬下心肠, 诚实地评估组织这方面能力。”

这些观点令人目不暇接, 让我花费不少时间仔细阅读; 其实我也许是想找到具体的政策建议。然而, 要理解本书的目的, 我们必须回到达沃斯, 重拾合作能够“全面了解所发生的一切……并对制定和实施能实现可持续性变革的整体观念和解决方案来说非常关键”。虽然本书力求全面理解第四次工业革命, 但令我担心的是, 全球精英们的集体理解并不足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我相信施瓦布也会有同感。

安德鲁·伯格
(Andrew Berg)

IMF能力发展学院副主任

收益大于损失

《金融与发展》2016年6月号刊登了一些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关于国际贸易更加自由化所带来收益与损失的评论(“叛逆者”一文)。文章引述罗德里克的话,国际贸易理论“表明,国际贸易净收益越大,(需要的)再分配也越大。在再分配很小的情况下讨论国际贸易收益很大是没有意义的。”我想指出的是,上述观点总体上不能成立,原因如下所述。而且,由于上述观点可能会被用来延迟贸易自由化进程,因此对上述观点加以证实是很重要的。

假设某个特定市场开放贸易,因此其国内价格下降,商品进口。由于价格下降,生产者受损,而消费者受益。用专业术语说,就是“生产者剩余”损失,而“消费者剩余”增加。其中,消费者剩余增加和生产者剩余损失的数量,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价格弹性等因素,而且没有理由相信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是系统性相关的。因此,对于给定的价格下降,如果供给和需求价格弹性都很大,那么,消费者剩余的增加量将非常大,而生产者剩余的损失将很小。所以,不同群体因对国际贸易开放带来的收益与损失,取决于供求价格弹性数值等因素,至于其具体数值大小,只是实证问题。而且,上述价格弹性数值很可能会出现这

样一种情况,即收益很大,而损失,也就是“再分配”很小。

另外,与消费有关的国内生产水平以及进口量也对收益与损失的大小产生影响。假设当地不生产某种商品,只能通过进口来满足这一消费。在这种情况下,降低贸易壁垒将增加消费者剩余,而没有生产者剩余的损失。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国际贸易开放市场并不会引起再分配。这是否符合实际呢?非常符合。

仅举一例,很多发展中国家并不生产汽车,但对汽车进口施加了各种限制。因此,取消汽车进口限制将让消费者受益,并且没有生产者受损,也就没有再分配。同理,如果国内生产量与国内消费量相比非常小,进口量就会非常大,消费者收益也会非常大,生产者损失非常小。而且,这也是各国之间的实证性问题。另外,电脑和智能手机也是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进口的收益很大,而损失很小。

总之,对国际贸易开放带来的收益与损失,取决于供给与需求价格弹性,以及国内生产量相对于消费量的大小。以上就是修正罗德里克观点的关键因素。若运用各国的实际数据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可能会非常有趣。

斯蒂芬·托卡里克(Stephen Tokarick)

IMF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



喜欢你所读到的内容吗?

喜欢就来Facebook为我们点赞吧!

www.facebook.com/financeanddevelopment



Statement of Ownership, Management, and Circulation required by 39 USC 3685

1. Title: *Finance & Development*. 2. Publication No. 123-250. 3. Date of filing: October 24, 2016. 4. Frequency: Quarterly. 5. Number of issues published annually: four. 6. Annual subscription price: \$27. 7/8. Complete mailing address of known office of publication/publisher: *Finance &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700 19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1. 9. Full names and complete mailing address of publisher, editor, and managing editor: Jeffrey Hayden, Camilla Lund

Andersen, Marina Primora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20431. 10. Owne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700 19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1. 11. Known bondholders, mortgagees, and other security holders owning or holding 1 percent or more of the total amount of bonds, mortgages, or other securities: None. 12. Tax status: has not changed during preceding 12 months. 13. Publication title: *Finance & Development*. 14. Issue date for circulation data below: September 2016.

15. Extent and nature of circulation	Average no. of copies each issue in preceding 12 months	Actual no. of copies of single issue published nearest to filing date (September 2016)
A. Total number of copies	16,770	17,000
B. Paid distribution through the USPS	171	99
C. Total paid distribution	177	105
D. (4) Free or nominal rate distribution outside the mail	12,349	12,286
E. Total free or nominal rate distribution	14,432	14,308
F. Total distribution	14,609	14,413
G. Copies not distributed	2,161	2,587
H. Total	16,770	17,000
I. Percent paid and/or requested circulation	1.21	0.73

I certify that the statements made by me above are correct and complete.
Jeffrey Hayden, Publish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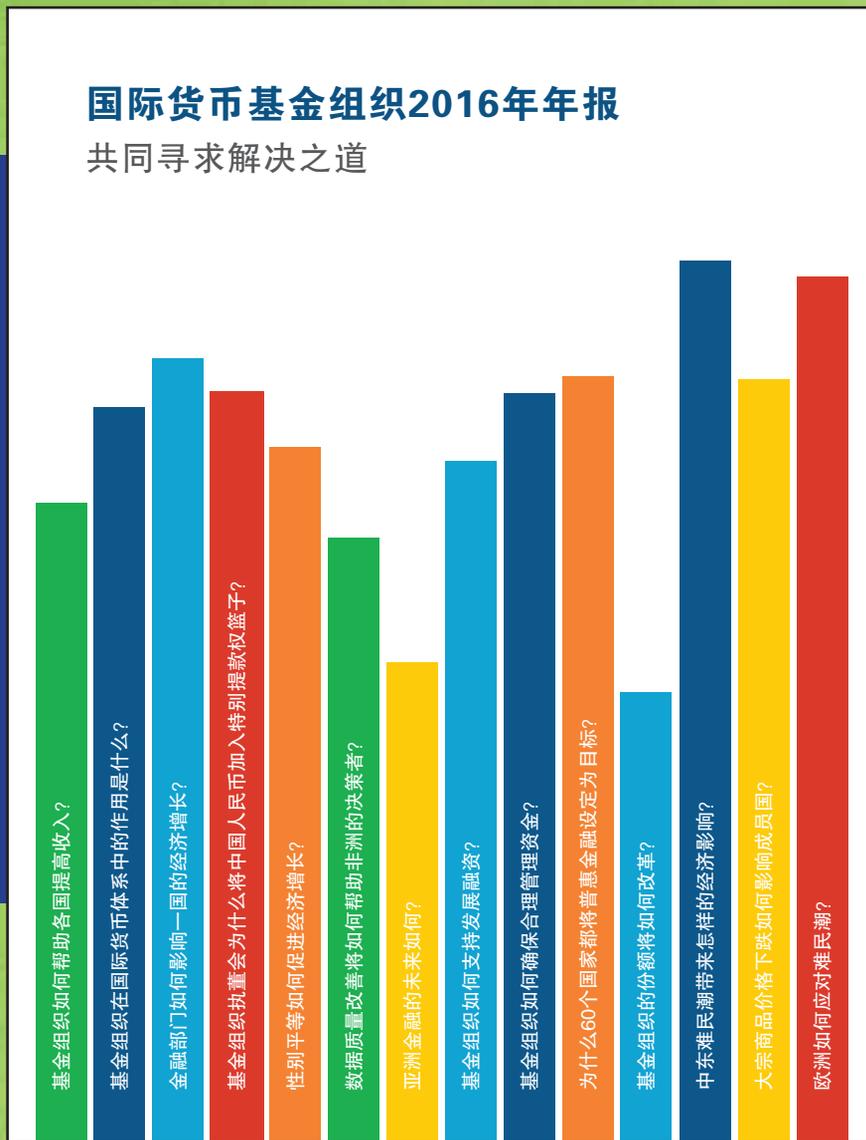
新书发布!

IMF2016年年报

共同寻求解决之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年报

共同寻求解决之道



- 深度解读IMF的政策建议、金融和能力建设发展
- 聚焦重要活动，包括配额改革和新的SDR货币篮子
 - 通过电脑和手机进行在线互动

在线浏览年报: imf.prg/ar2016

Finance & Development, December 2016



MFICA2016004